

斯大林死之谜

[苏] 阿·阿夫托尔哈诺夫著

新华出版社

封面设计：王师颉

斯大林死之谜

（苏）阿·阿夫托尔哈诺夫 著

寒 薇 程 益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出版社发行

新华社印刷厂排版 京安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75印张 130,000字

1981年5月第一版 1981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3203·007 定价：0.73元

（内部发行）

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他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一种。

出版说明

《斯大林死之谜》是研究苏联内部情况的一部书。作者阿卜杜拉赫曼·阿夫托尔哈诺夫通过大量的史料，分析得出了“斯大林的死并非自然死亡，而是被人谋杀”的看法。

本书原为俄文版，一九七六年在德国出版发行。书一问世，曾受到世界各国读者的关注，一时间争相研读。

为了满足研究苏联问题的需要，根据多方面的要求，《斯大林死之谜》的中文版与读者见面了。

本书共分十三章，涉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历史，而尤以斯大林晚年的最后五年更为详尽。作者用丰富的材料揭露了贝利亚、赫鲁晓夫等人的频繁活动和勾结。斯大林正是在这一斗争的背景中死去的。后来贝利亚也被处决。

值得说明的是，因为作者曾被指控为苏联人民的敌人，住过监狱，获释后流亡在国外，《斯大林死之谜》就是他流亡在外期间发表的著作之一，这就不能不影响

作者观察问题的立场。对于思想观点上的某些问题，相信读者自会辨识清楚。

本书出版时，我们删去了原书的前言与结束语。

目　录

第一章

“最高层”的临阵脱逃者

布尔什维克在格鲁吉亚的征服者——列宁的战友、斯大林的仇敌——布杜·米吉万1937年被枪决时，在梅切赫城堡的回廊上高声喊道：“让斯大林不要忘记，在丹东[①]之后，轮到的是罗伯斯庇尔[②]”。为了不被格鲁吉亚丹东的预言所证实，后来，斯大林做到了他所需要做的一切。

战前，斯大林吸取了罗伯斯庇尔的教训，干的很出色。罗伯斯庇尔仅仅是把国民公会中的个别人送上了断头台，而国民公会本身受到了保护。但是，国民公会最后同样把罗伯斯庇尔送上了断头台。斯大林这个独裁者

---

① 丹东·若尔日·雅克(1759—1794年)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雅各宾派的右翼领袖。——译注

② 罗伯斯庇尔·马克西米林（1758——1794年）；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杰出活动家。雅各宾派专政的革命政府首脑。罗伯斯庇尔在进行革命时，具有英勇果断精神，因而促进了资产阶级革命对内外敌人的胜利。后来反革命资产阶级分子利用雅各宾派专政力量的削弱而发动了政变。罗伯斯庇尔于1794年7月27日被捕，次日被处死。——译注

做的比较明智：他在布尔什维克的"国民公会"帮助下，清算了那些极左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丹东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布哈林分子），最后把这个盲目忠于他的国民公会——1934年的中央委员会也送上了断头台。

如果谈到斯大林的个人安全，那么，他是没有敌人的，因为他杀掉了所有潜藏的敌人：整个组织、阶级甚至整个民族。他认为，当他们真正成了敌人时，再杀他们就困难了，也许就不可能了。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在党内的天空上又看到了更为浓密的、威胁性更大的阴云。他认为，在忠实奴仆的假面具下，到处都是叛徒和阴谋家。在1949年12月庆祝他七十寿辰的一次招待会上，当他家乡有人来看他时，斯大林又回忆起米吉万的话来了。他一般不喜欢宠爱自己的老乡，他对强加给他的事情特别感到烦恼。

这个理由是无关紧要的，斯大林随着岁月的增加不但成为一个多疑的人，而且还是个迷信的人。比如，在来自格鲁吉亚的老乡当中，有一个人既不是舞蹈家，也不是作家，而是姓米吉万或米吉万的亲戚，或者是同姓，他就感到有一种不祥的预兆。他心想："贝利亚这个恶魔故意把他找来，让布杜的幽灵来破坏我的情绪"。

不就是因为这个，这一天他对待格鲁吉亚人特别冷淡吗？大家不是都看到了：他是怎样粗暴地对待一个梯比利斯诗人的，这位诗人是被召唤去用格鲁吉亚文为斯大林写颂扬诗的，诗人希望他长寿，象许多高加索人那

样活的那么长久——活到一百岁！据传说，斯大林当时把诗人训斥了一顿，并重复说了几遍罗马红衣主教说过的一句话："为什么要有这种限制？"

在斯大林的反驳中感觉出一种明显的责难，因为上帝早就向他宣布过：凡是神都是永生的，而这位诗人却向他预告死期。第二年在选举苏维埃代表时，诗人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在《真理报》的巨幅画像前他写了一首新诗：

我们欢乐，敌人恐惧，
永生，父亲！

这也是衰老的斯大林所表现出的怪癖之一。根据他的命令，死了成千上万的人，但是，在他面前，通常是禁止谈死的问题。甚至战前被他枪毙的敌人也是一样，他喜欢用古罗马的方式比喻枪毙的人："他活过了"——季诺维耶夫"活过了"，布哈林"活过了"，托洛茨基"活过了"，甚至列宁也"活过了"……但是他希望自己长生不老，永远活下去。虽然斯大林对任何上帝也不信，但是，甚至圣经上关于古代长生不老的人的传说，也会引起他近似荒谬的幻想。

曾在全世界轰动一时的苏联科学院院士亚历山大·鲍戈莫列兹有一天颂扬斯大林说，他是阅读他那本书《延年益寿》的最内行的读者。斯大林之所以对自己的长寿从内心里产生了信心，是从鲍戈莫列兹那里寻找到了科学根据的。这就是为什么斯大林允许这位院士无限

制地使用国家资金进一步研究人的长寿问题的原因，并把他封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但是，这位可怜的院士允诺斯大林活一百岁，而他自己却只活到六十五岁。显然，这位鲍戈莫列兹之死，使斯大林陷入更深的忧郁症之中。斯大林对长生不老的奇迹失去信心，由此产生了苦闷。

斯大林越是苦闷，越是仇视人民，无一例外，不管是近的，还是远的；不管是朋友，还是敌人。不过，他从来也没有过朋友——只有一些有用的人、无用的人和有害的人。有用的人被他剥削，无用的人被他抛至脑后，而有害的人统统被杀掉，他却没有表露出个人的丝毫仇恨。

当然，斯大林想到死的问题。但是，非常奇怪，他常想到的是凶杀，甚至有一次他决定用这种死恐吓自己的“朋友”。每一个人在他眼里都可能是凶手。从赫鲁晓夫的话里我们知道了这是斯大林对潜藏在政治局中的敌人的严重警告。斯大林问他们：“你们这些瞎子，象新生的小猫崽，没有我，看你们怎么办？”

从二十年代末起，党的宣传逐渐确定：斯大林不仅是各学科的泰斗，不仅在政治上是预见者，而且是各时代各民族举世无双的统帅。但在斯大林听到希特勒进攻苏联时大为震惊，竟然不知所措。

希特勒的进攻是斯大林引起的。他组织反对各民族的巨大的酷刑，杀掉党、国家和红军整个的领导成员，与

希特勒订立了反对西方国家的公约，斯大林简直是请他来进攻苏联的。在党内积极分子当中斯大林为这个公约辩解，证明它是进一步瞄准的政策，说什么让希特勒和西方互相厮杀，两败俱伤，在那时，在欧洲强令执行“新秩序”的不是希特勒，而是我们。但是，这个如意算盘落空了，希特勒向俄国发动了全面进攻。

1941年6月22日晚，斯大林钻进苏联国防部大楼，并破口大骂，骂苏联红军全体人员是叛徒，是胆小鬼。对国防部这一短促的“袭击”之后，他在惊慌中逃往莫斯科郊区的城堡，也就是他的别墅。1941年6月22日，在战争爆发几小时之后召开了政治局、部长会议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紧急联席会议，斯大林拒绝出席。

斯大林这些“忠实的战友和学生”全都束手无策，只好和总参谋部的同志一同去孔策沃别墅。在仓猝召开的政治局和政府的会议上，他们建议要斯大林号召全体人民、全党和全军组织防御，反对希特勒的侵略。斯大林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当时把这一任务委托给了莫洛托夫）。大家建议斯大林作为政府首脑，指挥红军最高统帅部（斯大林又拒绝了，这一任务又委托给铁木辛克元帅）。

当政治局委员开始提醒斯大林在剧变中应负的责任时，斯大林反而攻击和埋怨莫洛托夫背叛了，因为莫洛托夫与里宾特洛甫签订了条约；他还指责伏罗希洛夫和日丹诺夫在同先于里宾特洛甫到达莫斯科的英法军事代

表团谈判中消极怠工。但是，他们辩解说，这一切都是根据他的直接旨意去做的。斯大林从座位上暴跳起来，拼命狂叫并立即消失在一个秘密通道里，甚至斯大林的贴身警卫也不知道秘密通道准确的入口、出口处。“战友们”甚至不敢去寻找他，没有等他回来，就赶回莫斯科，采取了最紧急的措施。

驻在盟国首都的苏联大使没有接到任何指示，而这些国家驻莫斯科的使节们任何一个人也没有被接见。驻伦敦的苏联大使马依斯基在赫鲁晓夫下台之后，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战争开始的第二天，莫斯科没有任何动静，到了战争的第三天、第四天——莫斯科仍无动静。我以焦急的心情等待着政府下达什么命令，我不知道是否要在伦敦为签订英—苏军事联盟做好准备。但是，无论是莫洛托夫，还是斯大林，都没有给我任何指示。当时，我不知道从希特勒进攻一开始，斯大林就躲藏起来了，没有召见任何一个人，也没有参加任何一次决定国家大事的会议。在6月22日这一天的广播中，正式讲话的是莫洛托夫，而不是斯大林。苏联驻国外的大使们在危急的时刻，没有收到任何来自中央的命令。”①

当前线的情况有些好转时，斯大林开始以英雄姿态装腔作势。赫鲁晓夫说：“我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英雄，我看到他时，他象一只家兔被蟒蛇吓住了一样，在

① 《新时代》，1965年，第2期。

希特勒面前吓瘫了。在战争第一阶段，情况对我们来说是不妙的，我没有见到一份斯大林签署过的文件或命令。在以‘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部’的名义签署的这种文件和命令上，从来没有斯大林自己的签名，甚至在我们把德国人从莫斯科近郊击退之后，斯大林才开始恢复原状，但在签发文件上仍没有变化。这不是偶然的……”①

在苏共“二十大”会议上，赫鲁晓夫代表党中央作了报告，报告证实说：“忘记这件事是不对的，在前线初期处于严重失败时刻，斯大林认为是完蛋了，他那时在一次讲话中说：‘列宁所建立的一切，我们将永远失掉了’。后来，在较长时间内，斯大林实际上不再指挥军事活动，也停止了其他一切活动。他重新积极领导是在几个政治局委员拜访了他并对他说，为了改变前线状况，需要立即采取坚定的步伐时才开始的。”②他们要斯大林相信：希特勒的“闪击战”在没有后方的国家能发生作用，但在苏联这样国土辽阔的国家，是不会起作

---

①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180—181页。

② 在斯大林的家庭纪事中也记载着，当时斯大林惊慌失措的情况。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的姨妈叶美根尼娅·阿利卢耶娃在1941年8月曾见过斯大林（战争开始后两个月），她回忆当时的情形说：我从未看到约瑟夫那样失望和惊慌，我到他那里本想得到点支持，希望他能给我鼓鼓劲……当我看到他也是和我一样慌张，我更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了”（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仅仅一年》，1969年，纽约哈伯和罗出版社出版，第324页。

用的。

苏联元帅和将军们在评价斯大林在战争初期的行为时产生一种非常惊人的变态。当赫鲁晓夫在台上时，他们都一致写过斯大林在军事上的"英明"是虚伪的和他惊慌失措的行为。但是，这些元帅和将军们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又把斯大林捧到天上。有时在新的总书记面前，透过对最高领导的阿谀逢迎的浓烟，仍可闪耀出真理的火花。在斯大林的大信徒恰科夫斯基的《围困》中就有这样一段描写："莫洛托夫压低嗓门说：'德国政府向我们宣战了'，说这句话时，正值斯大林在房间远处的角落里，听到这句话他立即转过身来。此时此刻，大家都看到了，在他身上有一种难以捉摸的，但又无疑义的变化，好象斯大林迷了路，他迷糊了，失去了视觉，终于说：下命令，为了使我们的军队摧毁敌人的进攻，命令他们暂时不要越过国境……大家（政治局委员们）痛苦地、甚至恐怖地感到：这一次他的声音好象非常不自然。大家明白了，斯大林是由于受到压力而失望。"①

根据恰科夫斯基讲述的，在德国进攻前夕，人民委员部的铁木辛克元帅和总参谋长朱可夫将军到斯大林那里汇报面临德国进攻的一切有关情况时，斯大林埋怨他们所提供的情况是带有挑拨性的情报，散布恐慌情绪。之后，他很不客气地把他们赶出了自己的办公室，并禁

① 《旗帜》，1968年，第11期，第46页。

止他们调动军队处于“一级战斗准备”（这意味着军队已处于最高战斗准备状态）。但是，现在确实证明了铁木辛克和朱可夫所说的下边这段话：

“深夜，斯大林和几个政治局委员突然出现在国防人民委员部的大楼……往常斯大林表面很镇静，谈话和行动都是慢腾腾的，而这次斯大林却控制不住了，以愤怒的语气猛击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总参谋部这些领导人，然后他惊慌地驼着背离开了大楼，径直回到孔策沃别墅。谁也没有看见他，他并没有去克里姆林宫，没有一个人从电话里听到过他的声音，而他谁也不召见。在那些日子里每时每刻等待着他召唤的人，谁也不敢没有他的电话而擅自决定去他那里。有关国内、前线以及军事措施的成千上万件的大大小小的事立刻向政治局委员们、人民委员部委员们、国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们、总参谋部和军队政治部的领导们拥来。但是，从早晨到深夜，他们忙于这些事情，不时地问自己：斯大林究竟在哪里？”①

斯大林擅离职守，置国家与军队于不顾，听任希特勒的摆布。但是，如果恰科夫斯基最终相信历史的真实，他会补充说：“敢于到斯大林那里并建议他从恶梦中回到现实中来指挥战斗的唯一的一个人是贝利亚。如果贝利亚也做不到这一点，可以想象到斯大林当时惊慌的程度”。赫鲁晓夫回忆说：“这是贝利亚见过斯大林之后向我说的。”在贝利亚坚决提议要斯大林把战争的

① 《旗帜》，1968年，第11期，第51页。

方向盘掌握在自己手里时，斯大林回答说："一切都完了，我认输了！①

斯大林简直要丢掉了自己的脑袋，如果他没有从肉体上丢掉它，那只是因为军队上层中没有人把国家利益置于自己的官职之上。年轻的指挥官，象朱可夫、戈瓦洛夫、叶罗缅科、崔可夫，甚至那些刚从监狱出来直接送到作战部队的人，如戈尔巴托夫、米列茨克夫、罗科索夫斯基等，都非常迷信斯大林的权威，他们很少知道斯大林罪恶的权力机构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他们是以传统的公式想象："我们是军人，而不是政治家"，因而他们不过问"最高政治"。但是，在许多战斗、战役和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是他们，而不是斯大林。可战争胜利后，一切战果，甚至战略、战术上的成绩也都写在这位"最高统帅"名下（如关于"斯大林十次打击"的神话）。战时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证明（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斯大林比较熟练地指挥战争也只是从1943年春季开始，是在库尔斯克战役中。他指挥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是电影导演的神话题材。这就证明了这样一句话："看来，斯大林完全掌握武装斗争的新方法只是在库尔斯克战役中才开始的。"②

但是，不管斯大林怎样，苏联各民族付出了多大代

---

①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7页。

② 《共青团真理报》，1974年9月17日巴拉班诺夫教授撰写的文章。

价才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在斯大林七十寿辰时，米高扬写道："由于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保证了我国各民族以极小的损失取得了伟大胜利"（《真理报》1949年12月21日）。这"最小的损失"就使得俄罗斯在这次战争中仅死亡的就有两千万人，而变成残废归来的也有这么多。

斯大林明白了，遭到这样的牺牲之后，人民希望过真正人的生活，他们将期待着改变这种状况。斯大林知道战争教育了人民，使他们不怕死亡。在四年当中，每一个苏联战士都多次地和死亡打过交道，有两千万战士和死神相遇之后没有能够回来，而能回来的幸存者也是身、心受伤者。回来的人在无声的期待中令人生畏，在战争开始时，斯大林害怕自己的战士远远超过害怕希特勒的军队。"这些人攻下了柏林，他们也会攻下莫斯科"——直到他在孔策沃别墅最后一息之前，这个思想没有离开过他。

在战争当中，令人难以置信地增加了对斯大林和对国家命运的影响的人有两个（五人中）：国防委员会委员——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他们成为政治局的真正领导者，虽然形式上他们还没有进入政治局（国防委员会是在1941年6月30日建立的，置政治局、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领导之上，首先进入委员会的是：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伏罗希洛夫），实际上不仅是战争的命运，就连斯大林自己的命运也操纵在他们手里。

这已经很清楚了，在反对德国的各条战线崩溃的情况下，斯大林由恐慌而又变为悲观失望，他直截了当地承认：苏联的灭亡已经注定了，这两个人不仅有思想，而且具有巨大的组织能力。他们在政治警察（贝利亚）和党的机关（马林科夫）的协助下，恢复了国防。在他们的建议下，成立了最高统帅部。

形式上最高统帅是斯大林，而实际上它的主要领导人，军队是朱可夫，内务人民委员部是贝利亚，统帅部政治上掌握在贝利亚和马林科夫两人之手。没有他们的许可，不仅是前线总司令员，而且，包括参加前线军事委员会的政治局委员们（赫鲁晓夫、日丹诺夫、布尔加宁）也无权直接与斯大林联系。

应当很好地了解斯大林的心理，了解为什么战争胜利后，斯大林首先打击的正是这三个胜利的组织者——贝利亚（解除了他直接领导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职务）、马林科夫（派往土尔克斯坦）、朱可夫（调任军区）。因为他们目睹和了解斯大林在战争中的表现，所以他们在斯大林面前经常触动他那肮脏的良心。

但是，更重要的理由是：斯大林如果不把他们从警察、党、军队的直接领导中清除出去，那么斯大林的命运在战后几年就会完全掌握在战争年代的“三巨头”手中（贝利亚、马林科夫、朱可夫）。要解开后来所发生的复杂事件的内情，我们必须考虑这个情况。

第二章

斯大林"内部办公室"

斯大林暴政的基础之一，是他有一套不寻常的自卫本领，表现在他善于精心挑选自己的工作人员和个人的"警卫员"上。如果有人向斯大林推荐某人作为工作人员，而斯大林对此从来不加理睬，甚至是警察局机关或者中央委员会机关作后台的也不行。斯大林总是个人决定自己司令部的人员编制，按标准被挑选的工作人员必须是斯大林个人熟悉的人，按着他的指示，并在他的直接观察下，经过试用期。如果谁经住了这种考验，那么他就永远成了斯大林内部办公室的活工具，依靠它，斯大林占有了"无限的权力"，这一点列宁曾在他的"遗嘱"中说过。

"内部办公室"在党内文献中被称为"斯大林同志秘书处"，开始是由老革命者伊万·彼得罗维奇·托夫斯图哈领导。1905年革命前，他经常在各种彼此角逐的社会民主党，主要是孟什维克中间鬼混，而革命失败后，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来了一个极左转弯，后侨居法

国，1913年被编入巴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主义小组”。他是一个机敏而又勇敢的人，在政治斗争中他不承认有“侠义的偏见”，布拉格代表会议（1912年）上的列宁路线正符合他的意愿，因此，他宣布与孟什维克彻底决裂。托夫斯图哈把自己革命的前途与列宁事业结合在一起，他曾参加了列宁各种著述的编辑工作，并在这项工作中表现得特别出色。列宁认为，他的“侦察能力”不仅表现在政治上，而且表现在文学上。托夫斯图哈参加了莫斯科的十月革命，成为一个著名的苏维埃工作人员，1919年斯大林把他选到俄罗斯联邦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成为斯大林办公室的领导人，人民委员部部务会议委员。

在1921年3月第十次党代会上，列宁宣布了“戒严”（提出禁止小组和派别存在，禁止批评中央委员会机关和政治局的路线），中央委员会整个书记处的老班子（克列斯廷斯基、普列奥布拉仁斯基，塞列布利亚科夫）在讨论工会问题时，因支持托洛茨基、布哈林反对列宁、季诺维耶夫和斯大林，都被撤换。书记处由斯大林提升的莫洛托夫来领导，斯大林推荐他的秘书托夫斯图哈作为莫洛托夫的助手。因此，在斯大林当上总书记一年之前，莫洛托夫和托夫斯图哈领导了作为斯大林“侦察队”的中央机关。

关于托夫斯图哈有这样一段佳话，即他非常了解列宁的著作，远远超过列宁本人。因此，他被任命为加米

涅夫的助手，筹备出版列宁全集（根据1920年第九次党代会上的决议），不仅是发表过的列宁的全部著作，而且还包括列宁个人的全部档案材料，按着“党内材料国有化”的权限，也一齐交到托夫斯图哈手中。当斯大林成为总书记一年之后，落在托夫斯图哈手中的材料，又落入斯大林手中。斯大林利用自己的地位，唆使托夫斯图哈犯了违反党和国家利益的罪行。如果列宁还活着，他俩都会受到审判。问题涉及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列宁从德国人那里获得的那笔钱的问题。那时的临时政府责怪列宁不该通过给德国作间谍的戈涅茨基弄到这笔钱，列宁回避了审问，他声称：他与戈涅茨基过去、现在都没有任何联系，但在检察机关的通报中说到戈涅茨基是列宁与德国驻斯德哥尔摩主要间谍帕尔乌斯博士之间的联系人。1917年7月22日—26日在回答检察长时，列宁写道：“检察长证明：帕尔乌斯与戈涅茨基有关系，而戈涅茨基又与列宁有关系。但是，这简直是骗人的手段，因为众所周知：戈涅茨基与帕尔乌斯有金钱事务关系，而我们与戈涅茨基没有任何关系”。①全党都支持列宁的观点，临时政府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中伤列宁。是的，党内上层少数人知道：现在由于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公布了德国外交部档案，整个世界都已知道了②。正是列宁，确实获得了为组织俄国革命

① 《列宁全集》，第34卷，第31页。

② 《1915—1918年德国与俄国的革命》，Z·A·泽门。

而需要的几百万巨款，从而在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1917年8月）讨论了这一问题。为了推翻这种"诬告"，列宁和季诺维耶夫是否出席受审？

斯大林代替列宁出席了会议，并做出决议说："如果审问是民主的、真诚的，列宁与季诺维耶夫将出席会议"①。但是，布哈林知道，为什么列宁回避审问，他断然驳斥了斯大林所做出的决议，他说："资产阶级真诚的审问意味着什么？在这次审问中将有一些与戈涅茨基建立关系的文件，戈涅茨基和帕尔乌斯的文件，而在这些文件中，又有帕尔乌斯写的关于列宁的材料，请你证明帕尔乌斯不是间谍"②。因此，党认为：列宁是正确的，否定了与戈涅茨基的任何关系，虽然党内最高层知道确有此事（季诺维耶夫、拉迪克、戈涅茨基、布哈林在国外，而斯大林与加米涅夫在俄国，他们使用过这笔钱出版《真理报》）。但是，自1922年末，斯大林开始从身患重病的列宁那里得到坏消息：在各民族共和国要求"自治化"的文章内，列宁称斯大林为"大俄罗斯的警察长"，在列宁的遗嘱中断言："斯大林集中了庞大的权力在自己手中，并将滥用这些权力"。1923年1月4日列宁又向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建议，解除斯大林"总书记"职务，最后，列宁又给斯大林一封信（1923年3

① 《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58年出版，第27—28页。

② 同上，第34页。

月），表明和他断绝个人关系①。现在，斯大林已经明确地知道：列宁痊愈的第一天，也就是他当总书记职务的最后一天。但是，斯大林完全不想在列宁面前投降。斯大林决定以攻为守，这时正需要托夫斯图哈，他在列宁个人档案中找到一些文件，以此破坏布尔什维克领袖的名誉，把列宁诬为德国间谍的领袖。当然，这些材料很多，而斯大林正好决定利用揭露列宁的谎言的材料，即列宁曾说，不但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甚至从戈涅茨基那里什么钱也没有拿到。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托夫斯图哈公布了下列两封信：一，1917年4月12日列宁自彼得堡寄往斯德哥尔摩给戈涅茨基和拉迪克的信，信中说："亲爱的朋友，到目前为止，什么也没有收到，既无信，也无公文，更没有从你那儿收到钱……望保持最密切和最审慎的联系。"二，1917年4月21日列宁给戈涅茨基的信，说道："从科兹罗夫斯基那儿收到了钱（科兹罗夫斯基是彼得格勒的律师，布尔什维克，是斯德哥尔摩与彼得格勒之间的秘密谍报工作的联系人）……一共出版将近15种布尔什维克报纸（这是给赠款人的报告）"。当然，这两封信发表列宁预先不知道，它们发表在由托夫斯图哈亲自主编的《无产阶级革命》杂志，1923年9月第9期上。发表这两封信的意图是：长期流亡德国的谎言者——列宁未得到党设在俄罗斯的党中央的同意，从德国获取一笔钱，并想消灭俄罗斯党中央委员

① 这些材料在二十大以后都发表在《列宁全集》，第46卷上。

会布尔什维克地下领导人和组织者，柯巴一斯大林。

当然，这两封信的发表引起了列宁以及与列宁亲近的人的极端愤怒，一致反对托夫斯图哈。为了不使反对列宁的这一阴谋败露，斯大林不得不牺牲托夫斯图哈，把他开除了中央委员会，由波斯科列贝舍夫接替了他的位置。

斯大林认为托夫斯图哈过去的助手——波斯科列贝舍夫是一个更为称职的继承人。亚历山大·尼古拉耶夫·波斯科列贝舍夫几乎在三十年之中一直是斯大林的第二个"我"。这个斯大林"办公室工作人员"的权限之大仅从一件事就可以看出：要接近斯大林必须通过第二个"我"——波斯科列贝舍夫才行。问题不在于进入斯大林的办公室（虽然，这也需要波斯科列贝舍夫的监督），而在于进入斯大林的大脑试验室。中央委员们，甚至政治局的委员们，当他们想知道：斯大林在想些什么，或将要想些什么时，只要从波斯科列贝舍夫所想的一切就可以知道了。斯大林称他为"总管"不是没有道理的。这并不是说，波斯科列贝舍夫向斯大林提示：在这种和那种局势下应如何采取行动，而是，他几乎毫无错误地完全猜到了这些行动，并施加以影响。

波斯科列贝舍夫进入中央委员会时正是在斯大林成为"总书记"时，他参加了清洗老的、托洛茨基的中央机关，并开始建立新的斯大林中央机关。他比斯大林年轻十二岁，但是，他已具有相当大的"功勋"了，他曾

担任过巴兰岑斯基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主席和叶卡捷琳娜布尔斯基省工农代表苏维埃委员，1918年7月16日签署过枪决尼古拉二世、他的夫人及其几个幼年子女的判决书，通过了第一次革命洗礼——杀死了沙皇一家人。开始，波斯科列贝舍夫做为一个土尔克斯坦特别军队政治部的领导人之一，从事消灭土尔克斯坦"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工作，之后，在兹拉托乌斯特做过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和在乌佛担任省革命委员会的主席——从肉体上消灭了那些支持高尔察克将军的西伯利亚的农民们。

很快证明了：波斯科列贝舍夫不仅是一个刽子手，而且是一个具有较高素质的党的组织能力的刽子手，因此，他被任命为乌佛省党委会的组织部长，斯大林正是从那里把他选上来的，选进了中央办公室。这位年轻的，有一头油亮卷发的西伯利亚杀人强盗，在"主人"眼里，最后成了一个秃顶的、面皮松弛的、易怒的独裁的老头。

在"二十大"会议上，赫鲁晓夫宣布："在斯大林周围，他仅能容忍一个人，就是他最忠实的心腹——波斯科列贝舍夫"，赫鲁晓夫明确地指出这一点：波斯科列贝舍夫是"斯大林最忠实的走卒"。"他并不愚蠢，他在自己手中集中了很大权力，从而他开始自高自大。他对待任何一个人的态度都是傲慢不逊的，公然蔑视主席团（政治局）内没有博得斯大林好感的任何一个委员。比如，他恶意地向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吼叫，当他们这些

人在斯大林面前失宠之后。波斯科列贝舍夫通常是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侵略成性的人。由于靠近斯大林，比我们大家都早知道斯大林怀疑的阴影或者不满会落到谁身上，所以波斯科列贝舍夫所反对的那个人，就被认为该轮到他倒霉了”①。为什么一个既不是政治局委员，又不是中央书记处成员的人能起到这么大的作用，只有分析斯大林个人政权机构才能了解清楚。

斯大林的传记作者没有把自己的分析重点放在由斯大林秘书处或“特别部”所组成的“内部办公室”上，因此，对斯大林的生平，对斯大林个人独裁的根源以及他能获得如此非凡的成功的秘密不太清楚。“内部办公室”——这是斯大林还在列宁在世时的惊人创作。那时，政治局被公认是集体领导，不是个人独裁，而斯大林这种独一无二的发明创造表明：他的个人专政是很隐蔽的，从外表看不出任何现象。不仅是中央委员，甚至是政治局委员也看不出斯大林还有一个“办公室”，只把它看做是一个事务性的办公室而已，是由最普通的官员们组成，处理日常事务的。但是，列宁看出了斯大林的“办公室”的本质，斯大林成为总书记之后，把很大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②。列宁考虑到斯大林将会利用这个“庞大”的权力，因此1923年1月4日在他的“遗嘱”中曾提醒并建议撤消斯大林总书记的职务。那时就

①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292页。

② 《列宁全集》，第45卷，第345—346页。

已暴露出：斯大林是个大两面派，而政治局委员们对不学无术的斯大林那样地信服（托洛茨基就曾说过：斯大林是卓越的庸碌者），却把列宁的要求看做是他脑子里出现的病态性幻觉。

斯大林"个人办公室"的做法，当然是借用于沙皇尼古拉时代。尼古拉一世在十二月党人起义后，农奴制的主要基础被瓦解了，从而决定依靠官僚政治。第一步就是建立"皇帝陛下"四个直属部门的"个人办公室"，最重要的部门是"第一"和"第三"。第三部门是集中领导政治警察与宪兵。斯大林对布尔什维克这个支柱——老布尔什维克分子很失望，他决定不仅从政治上，而且从肉体上消灭它，从新的党僚中建立新的政治支柱，这些人后来被称为党的机关工作人员。列宁有一个著名的公式："换上革命者的组织，我们要把俄罗斯翻过来"。而斯大林采取的是苏维埃俄罗斯"干部决定一切"的公式。

这些新干部的选定，委任给"内部办公室"的两个成员：叶若夫和马林科夫。

要了解"内部办公室"的作用，首先必须了解两个主要部门，一是斯大林的秘书处，一是中央委员会的"特别部"。

书记处、组织部、政治局以及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任何一个决定，部长会议的任何一项决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任何一道命令，没有不通过"斯大林同志的秘书

处”讨论和预先决定的。因此，它是斯大林“内部办公室”的一部分，是由一些内政外交方面训练有素的官僚和专家组成，这就是斯大林办公室第一个组成部分。

斯大林的第三个部门是中央委员会的“特别部”，直接由波斯科列贝舍夫管辖。这可以说是世界专制独裁史上未曾有过的一个机构（回忆一下从“特别部”内出现的三位国家保安部未来的部长——阿巴库莫夫、米尔库罗夫、谢洛夫以及内务部的科鲁戈洛夫就足以看清了）。“特别部”——换句话说就是斯大林个人的政治警察服务系统。

“特别部”在1934年党的文献上第一次出现时，没有解释它的职责，但是，间接地指出：它就是过去的中央委员会“机要处”，现改名为“特别部”。但是，过去的“机要处”完全是为党内某些干部个人需要服务和保管党与政府的秘密文件的。这些职责确实转交给了这个部。过去党的机关系统“机要处”改名为州委、边区和共和国中央“特别部”，仍然被认为：仅是简单地改换名称而已。

在1935年3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主席盖利赫·雅戈达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秘书阿维尔·耶奴基泽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的一些事情，其意义他们自己当时未必知道。情况是这样：由于基洛夫被谋杀，党和政府的上层机关开始了秘密清洗，还谈不上逮捕，而是把政

府机关中的“阶级异己分子”撤职。党中央的专门委员会对克里姆林宫的成员都进行了审查。在克里姆林宫居住和工作过的有各种各样的人——党、政领导人及其家属，被称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学校的学员”（事实上就是换了名称的斯大林的卫兵），党、政最高机关和克里姆林宫博物馆中许多技术服务人员。在中央五月全会上，委员会宣布：克里姆林宫中大部分技术服务人员是“阶级异己分子”，其中有许多人还是在尼古拉二世时期护守宫殿和古迹的人。委员会已觉察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审查这些人时的粗心大意和负责任免这些人职务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所反映出的形式主义。

耶奴基泽提出驳斥说：在克里姆林宫服务的这些人是根据列宁的指示，做为“资产阶级专家”留下来的（因为只有他们熟悉如何组织护理克里姆林宫内的古迹）。新人到克里姆林宫来工作是由“中央委员会特别部”指派，而雅戈达和耶奴基泽只是为之办理手续而已。

这项声明对中央委员会全会来讲完全是新的消息：克里姆林宫的服务人员不是由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审查，而是由克里姆林宫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它的司令部来审查，这方面不由雅戈达主管，而是由“特别部”主管。这样，中央全会也就第一次知道了：斯大林成立了自己的政治警察，他们不属于国家整个的警察系统。

“特别部”的一般职责逐渐明确了，它是为斯大林

个人安全组织服务（保护克里姆林宫，保护斯大林通往别墅，负责管理斯大林医务护理和饮食以及对斯大林医疗服务的监督等），并负责中央政治局和政府成员的安全组织工作。

“特别部”的重要职责与其说是保护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府成员，防止“人民敌人”行凶（我们知道斯大林是怎样保护基洛夫的），不如说是保护斯大林本人，使他不要受到潜伏敌人的暗害。因为，这些“党政领导人”不仅失去了选择个人警卫的权力，而且他们的服务人员、医生、园丁和理发师都要由“特别部”委派。

在这次中央全会上才开始知道：原来还在“特别部”之下进行“暗中检查”，由它审查中央委员会和政府成员的书信，这种严酷的检查制度远远超过了奥匈帝国梅特涅进行秘密检查的著名的“黑暗办公室”。

我已经说过，“特别部”有它自己的系统，下设州委、边区、共和国中央“特别部”。“特别部”的领导人均由中央委员会“特别部”直接任命和领导，表面上由同级第一书记们正式领导。在党委大楼内“特别部”设有隔离的办公室，只有第一书记和组织部部长才有权进去。每一个“特别部”的领导人都有专门编制，经常变化联系的暗号，专线与中央委员会联系；还设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信使，将特别秘密的指示和情报送进或送出莫斯科。

“特别部”的领导人指导谍报机关，而“特别部”

的谍报人员用党内语言叫着"党内情报员",从事特务活动,反对本州和共和国的领导人;还有一件小事,即在州委会议上负责记录的永远是"特别部"的领导人①。

由此可见,"中央特别部"的情报工作得到了地方"特别部"情报工作的配合。包括州委的"大人物们"也都受到监视。当然,地方内务人民委员部也从事这样的工作,1925年开始坚持在党内建立秘密情报网(列宁反对,他认为:每一个共产党员不应是专职肃反人员)。但是,斯大林提出:地方肃反人员与地方党的领导人在日常工作中关系太密切,因此,他们不能向中央预报地方出现的"分裂主义",而"特别部"的人员与谁都无联系,仅与中央莫斯科"特别部"有联系。实际上,军队中的情报系统也属于"特别部"管辖("特别部"、"政治部"甚至内务人民委员部"秘密政治部"的领导人也受中央"特别部"的领导)。

这种精心组织起来的党内情报集团,使斯大林有可能做到:无论他在那里,他都可以准确无误地知道:他在中央以及地方的任何一个"同事"在想些什么和干些什么。斯大林从来不可能象1964年10月13日在索契发生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事。安上这样一个钉子,斯大林就可以随

---

① 当我在切禅州委担任组织处处长时,我无比惊奇的是:在一次偶然机会下我读了一份用密电码译好的情报资料,内容是我们"特别部"部长索科夫反对州委第一书记、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哈斯曼的。

时知道，尚未串通一气的潜藏的阴谋家将要爆发的叛乱。

斯大林认为：在安全保卫制度上最重要的意义是组织政治警察。这是斯大林根据马基阿维利① 聪明的建议：“只有这种安全的方法是最好的、有把握的，而且是持久的，它主要依赖于你个人和个人的能力”。布尔什维主义的任何一位领袖，包括列宁在内，也没有象斯大林这样实际研究过世界上最好的政治警察——沙皇警察的长处与弱点。斯大林在革命前的三十八年历史中，有二十年是他做为被逮捕者，或者说是被管制者在政治警察的活动范围内度过的（他被捕七次，五次流放）。

根据列宁的说法，斯大林是“职业革命家”，列宁在《怎么办？》一书（1902年）中谈到，职业革命家为了在俄国警察制度下能成功地进行活动，“应当而且要超过敌人进行秘密活动的伎俩——俄罗斯秘密警察的伎俩”。而斯大林正是这样的“职业革命家”。事实证明他已超过俄国警察，他曾是高加索武装暴动的直接组织者以及死伤多人的白天武装抢劫梯比利斯国库的有名的组织者（1907年）。斯大林完成这次暴动之后，寄往国外列宁金库约三十万卢布。甚至斯大林的直接助手亚美尼亚人卡莫在这次抢劫中也象其他参加者一样被逮捕了，而唯独斯大林一个人躲过了他们的视线，被留下了。这说明：斯大林掌握的警察技术远远超过俄国的警

① 意大利政治家，以玩弄权术著称，主张为了达到目的可不择手段。 ——译注

察。

当然，自1912年起，作为中央委员，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党进行地下秘密活动的是斯大林。自然，斯大林也是十月革命变革前夜秘密起义中心“军事革命中心”的成员，是唯一的一位政治局委员。革命成功之后，这个中心改名为全俄肃反委员会，斯大林作为中央委员会代表成为它的领导成员之一。而名义主席捷尔仁斯基和他的助手——明仁斯基、雅戈达、拉兹伊斯和鲍基——都是斯大林的傀儡。从这个可怕的机构建立之日起，斯大林就一直把它抓在手中。斯大林比布尔什维主义的领袖们最早，也是最清楚地知道：肃反主义是共产主义制度的躯体与灵魂。

斯大林既然把自己个人安全与国家安全等同起来，他就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苏维埃管理制度的巩固与失败会导致他个人权势的巩固与失败。所以，产生组织“斯大林办公室”的思想，作为中央机构的合法组织，无可非议地称为“斯大林同志秘书处”。斯大林政治领导中心的合法机构逐渐变成不合法，首先在党章上，其次在表面上，又是以党中央的技术部门出现；但事实上，它已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甚至是国家之上。这并非一日趋成，这一过程已持续十五年之久（自1922年至1937年）。

战时，当斯大林陷入混乱之中，拒绝行使任何权力时，“内部办公室”也处于无力状态。而当时政治局和

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已重新获得了过去所规定的一切权力。在战争转折和结束时，斯大林又决定恢复过去的管理权。然而，他很快意识到：完全恢复过去那种规模，这恐怕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因为，首先有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其次是战后的气氛和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新人参加了进来。斯大林也远非当年的斯大林了。如果决定不这样做，就要采取另一种形式，或者是迂回的道路。

斯大林临时将"内部办公室"重心转向个人。他解除了国家一些"政治家"和一流统帅们的领导职务（虽然这些人忠实于他，但他们亲眼看到斯大林在战时的惊慌与临阵脱逃的表现），换上一批"非个人心腹"，但没有任何政治与复辟野心的人。这些失去了权力的军事领袖们对斯大林是如何想的呢？斯大林经常担心，为使这些"政治家们"不起来"造反"，任何权力也不能集中到他们手中。斯大林把他们任命为政府的助手（换句话说，就是让他们做不管部的部长）。就这样，斯大林开始逐渐恢复了"内部办公室"的权力。有两个人又恢复了他们过去的权力：即波斯科列贝舍夫中将和伏拉西克中将。任何人要见斯大林，甚至政治局委员，如不通过这两个人，就不能接近。也有例外情况，如斯大林个人想召见某人，通常是在宴会上。斯大林不但通过这两个人管理日常事务，而且他个人的安全也完全信赖这两个人。局外力量要想悄然走近斯大林，只能是在他的个人警卫员发生事故时才行。换言之，任何一个人也

不能在没有收拾这两人之前，就更早地收拾斯大林；但收拾他俩，除斯大林个人之外，谁也办不到。

对于波斯科列贝舍夫的特点，我在上边已描写过了。斯大林另一宠臣伏拉西克将军又是怎样的人呢？他和阿拉克切耶夫和拉斯普京是一路货色，都是冷酷无情的丘八和狡猾而又粗野的家伙。在俄国和苏联军队里，当然，象这样的情况也是仅有的，一个没有文化的普通士兵，没有经过任何学习和训练，就爬上了将军的高位。不仅如此，他还把自己打扮成文化问题的解释者。伏拉西克为斯大林服务的时间打破了记录，他是唯一的一个能从1919年坚持到几乎是斯大林逝世为止的人。

最有意思的是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对伏拉西克的特点的描写，她说：“另一个将军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伏拉西克，从1919年起一直在父亲身边，为时最久。最早他是担任警卫的一名红军战士，之后成了幕后的权威人物。他领导父亲的全体警卫人员，自认为是父亲的亲信。由于他极无文化，粗暴、愚蠢到难以想象的程度，又身为显贵，以至于最后那些年他居然向一些艺术活动家们讲授‘斯大林同志的审美观’……而这些艺术活动家们都听从他的劝告……他的厚颜无耻真是无以复加……实在不值得为他浪费笔墨，这个人毁坏了许多人的生活，但是他是一个如此五光十色的人物，所以也就非提他不可。……母亲在世时，他不过是个没有什么地位的最普通的警卫员……后来他常去父亲孔策沃别

墅，从这里向父亲的其它官邸发号施令，官邸年复一年越建越多了……而伏拉西克却拥有为所欲为的权力……”①

切禅族人们有一句谚语：“狼要想爬到山顶上，就得豁出自己的性命”。许多“狼”都死于斯大林之手。但是，波斯科列贝舍夫和伏拉西克这两只狼的牺牲，斯大林根本不知道，在他的生活中，他第一次成了执行他人意志的工具。事情是如何发生的，下章可以看到。

---

①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伦敦1967年出版，第121——122页。

第三章

宪兵元帅——贝利亚

从历史上看，有些教师对于学生前途的预言令人惊奇地应验了。在这方面，苏胡米中等技校的历史教师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他对自己的一个学生说：

“你是拉甫连季，你将成为一个有名的高加索好汉，象泽里姆汉那样或者象富歇[1]那样成为有名的俄国警察。”

贝利亚一一都做到了。开始他曾是巴库地下党的红色好汉，1920—1921年是格鲁吉亚孟什维克的好汉，之后，在十五年当中，他又成为斯大林时期的富歇。

1915年贝利亚从中学毕业时是十六岁，人们给他起一个外号叫“密探”，他感到很骄傲。这个外号很鲜明地描绘出一位未来的苏联秘密警察的长官形象。当时在学校里经常发生各种盗窃事件，不是教员丢失了钱包、卷夹，就是学生丢失了一些小玩意儿，而拉甫连季受到

---

① 富歇是法国拿破仑和路易十八时代的警察头子，以搞恐怖活动和阴谋著称。——译注

贿赂后便开始搜寻，并经常都能找到失物，这并不奇怪，因为在很多情况下都是贝利亚偷的。

贝利亚两次盗窃行为在苏胡米区内所有学校里引起骚动。

负责管理学生品行的班主任，差一点失去了他的工作，因为贝利亚偷去了全部学生“档案”，通过冒名的人把“品德鉴定”交给了学生们，这样一来就调查不出肇事者了。

第二件事是与校长有直接关系。校长是一位凶狠而刻薄的兵营式人物，以宾肯道夫①和乌瓦罗夫②的圣约遗训——“专制政体、东正教、民族性”为生活准则。当他听到某个学生犯了什么过错，他并不“教训”他，而是立即开除。

有一天，贝利亚决定教训校长一顿。一位区的学校视导员来校查访，他的一个装有很多钱的皮夹子被偷走了，当时猜疑到学生头上，学生们无一例外地都被搜查了。但是，最后没有查出来。此时警察局收到一封匿名

---

① 宾肯道夫（1783——1844年）尼古拉一世军警专政制度的反动分子之一，将军，参预了审讯十二月党人。他从1826年起任宪兵司令与第三厅厅长。——译注

② 乌瓦罗夫（1786——1855年）俄国反动国务活动家，科学院院长和国民教育部部长，提出所谓“正式民族性理论”，“专制政体、东正教和民族性”是为巩固俄国农奴制度和专制政体服务的反动思想理论。——译注

信，指出了皮夹子被偷的地点。警察局长来了，要求校长打开写字台抽屉，啊！多么可怕！在抽屉里发现了这个装满钱的皮夹子。校长受到打击后，匆匆离去。虽然，传说这是贝利亚干的，但是谁也不能证明它。这仅是在革命后，当贝利亚讲述他是如何组织这次“战役”时，才使人们知道的。

尚在儿童时期，贝利亚就知道了警察这个职业：“喜欢告密！——但他蔑视告密者”，他从来没有自己告过密，但是，如果他想报复谁，或者想整整谁，他就把常常是他自己想出来的行为，告诉另一个学生，而这个学生知道怎样去告密。

贝利亚永远是班上的第一名，特别是在数学等方面，他的成绩是非常优秀的。贝利亚喜欢引逗教师出错误，他经常提出一些诡辩的难题。历史老师是一个具有非常激进观点的人，但是，他是按着正式教学大纲讲课的。有一天，贝利亚提出一个带挑拨性的问题：“老师，应当更热爱谁？沙皇、俄罗斯、还是格鲁吉亚？”这一问题引起了学生们对老师的嘲笑。

但是，贝利亚这种“秘密警察”的本领在转移到巴库之后，又进一步发展了。他进了巴库技术学校，并以优秀成绩毕了业，领取了建筑学技术员的证书。这时，在俄国正接连地发生了两次革命，而俄国本身已退出了战争。贝利亚当时活动的历史，任何传记作者也没有办法挖掘出来。如果谁想这样做，肃反人员就会把他杀

掉。

关于这一时期枯燥的正式档案材料不仅是不完整的，而且有一部分是伪造的。比如说，1917年3月贝利亚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问题。（实际上他是1919年入党的，而斯大林想以此证明他是革命前的干部。叶若夫参加党的时间也被改动过，1918年被改为1917年）。又比如说，1917年6月贝利亚去罗马尼亚前线，1917年末回到巴库（事实上贝利亚是逃回巴库），由于他行了贿，所以得到了“因残废而免除军事职务”的证书。1918—1919年，贝利亚在巴库从事地下工作（但是，具体到底怎样做的，从未宣布过）。在巴库的年代里，贝利亚早就确定了他那令人惊奇的警察生涯。他曾参加了四个谍报组——苏联、木沙瓦特、土耳其和英国（后来，为此他正式被称为“国际帝国主义间谍”）。他在这些谍报组工作（有时是直线领导，有时是通过驻外秘密间谍头子领导），没有引起怀疑，但还是没弄清主要问题：贝利亚是否在里边工作过，由于他热爱这行，还是根据契卡的指示？（在这些年代里，巴库已成为协约国和四国联盟各谍报组的活动中心）。

贝利亚与木沙瓦特谍报组建立了联系，并通过它与土耳其谍报组取得联系，土耳其谍报组首先与德国谍报组联系，这些均应受到审查。贝利亚在巴库技校的朋友米尔扎·巴拉把他介绍给木沙瓦特谍报组，巴拉后来成为阿塞拜疆独立共和国的卓越活动家。米尔扎·巴拉还

把贝利亚介绍给巴库市警察局长米尔—德热阿法尔·巴基洛夫——一个苏联间谍。从此，贝利亚和巴基洛夫在警察生涯中再也没有离开过，甚至他们被枪毙也是因为同一案件（虽然，巴基洛夫晚一年）。贝利亚将情报复制品交给巴基洛夫，让他给木沙瓦特谍报组，巴基洛夫又把情报送交察里津红军第十司令部。军队司令部十分重视这种特别珍贵的情报，巴基洛夫建议让贝利亚专搞军事情报。

具有较高暗探本领的贝利亚深知：要想结识谁，就要“擒牛先抓角”。于是，他用格鲁吉亚文写了一篇政治论文，说在巴库如何组织苏联军事侦察工作，把它送到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的格鲁吉亚人斯大林—朱加什维里那里，当时他正在察里津。不久，贝利亚就被叫到肃反委员会机构和巴库中央委员会——米高扬那里。

同类型的人相聚是很不妙的，很快就显露出来了。米高扬与贝利亚的结合，其共同点是：他们都具有不可理解的当警察的天生的嗅觉和具有政治上的密探的才能。而其他方面他们是相反的：米高扬是亚美尼亚人，贝利亚是格鲁吉亚人（根据高加索的看法，这个区别不是无关紧要，因为米吉万曾建议解除梯比利斯的亚美尼亚化，他宣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完全不意味着“所有亚美尼亚人都到梯比利斯来！”）。米高扬受过高等神学院的教育，而贝利亚是中等技校毕业。青年时代米高扬的确信仰过马克思主义；而贝利亚既不

信神，也不信仰马克思。米高扬基本上是政治家，后来从事警察工作；而贝利亚则基本上是警察出身，后来成为政治家。米高扬是一个忠实的丈夫、模范的父亲；而贝利亚凡是他看中的每一个女人都要成为他的情妇，所以他的私生子是无计其数的。最后，只有米高扬能有权签署枪决人的命令，但他自己一个人也没有枪决；而贝利亚却经常在他枪毙人（包括对老布尔什维克）之后签署命令。关于这一点，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党代会上已说过。

贝利亚做为米高扬的助手，在巴库从事地下工作，进行侦察外国间谍时，他不仅无视米高扬，而且无视捷尔仁斯基，直接与斯大林联系。他逐渐地成为斯大林最知心的通风报信的人，工作于高加索的老布尔什维克——斯大林的一些对手当中。米高扬最清楚：关于他，贝利亚向斯大林告过密。但是，米高扬比狐狸更狡猾，他决定防备贝利亚的警察伎俩，并想到了一个办法。米高扬送给莫斯科、党中央或者肃反委员会的每一份政治报告，都“十分信任”地证明贝利亚的工作，贝利亚从这些报告中可以估计到米高扬对他工作的估价是很高的。米高扬的打算完全应验了，贝利亚开始在斯大林面前把米高扬的政治活动吹捧到了天上，以此向他证明自己的份量。

1919年在巴库，贝利亚第一次与英国人建立联系。关于这件事，在二十年代末，贝利亚被任命为苏联人民

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部外高加索分部部长之前，在高加索就公开谈论了。如果说到贝利亚与英国的间谍，那还仅是个别人说的，而关于他在木沙瓦特的谍报工作，还保存有文件档案。在1937年中央委员会全会上，联共（布）党中央委员、阿塞拜疆过去的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卫生委员部部长卡明斯基谈过此事。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会议上说："中央委员会全会刚一结束，卡明斯基就被逮捕和枪决了"。如果贝利亚在外国间谍组织中工作是契卡和中央委员会委派的，被认为"从事地下革命工作"，那么，毫无疑问，斯大林在全会上会提出相应的问题，象在其他同样情况下一样。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因此，全会认为贝利亚的日子屈指可数了。但是，没想到揭露他的人却到了末日。

巴库被红军占领之后，1920年5月，贝利亚开始做国家政治保安部巴库分部部长的助手，而这位部长是他以前的保护者、假的木沙瓦特谍报员——巴基洛夫。

1921年1月，奥尔忠尼启则巴库司令部的布杜·米吉万号召他的同乡参加红军队伍，去"解放"格鲁吉亚，在居住在格鲁吉亚以外的成千人当中只有二十人响应，其中就有年轻的契卡人员拉甫连季·贝利亚。

1921年2月末，独立的格鲁吉亚陷落了，布尔什维克在"解放"了的国家里首先组织起来的就是肃反委员会，而格鲁吉亚的第一名侦察员就是拉甫连季·贝利亚。贝利亚当了将近两年契卡的普通侦察员。虽然他是

那样地殷勤，而他却没有晋升的特别机遇。但是，他以契卡人员和布尔什维克的身份开始了他那巨大的警察职业。

“解放了”的格鲁吉亚试图从自己的“解放者”手中再解放出来，可以说是枉费心机的。1921年和1922年秋发生了两起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暴动，两次都遭到了镇压，但是他们也没有真正地被平息下去，小战斗和骚乱定期出现。苏联政府建议格鲁吉亚人的斯大林去高加索向自己的同乡们说明他们在玩火。斯大林完成了这一任务，临走之前契卡人员和朋友们为他举行了宴会。象往常一样，大家坐在一起吃烤羊肉串，喝着酒，并谈论关于再次“纯洁格鲁吉亚”问题。宴会上完全按着高加索的礼节：选出宴会司仪人——提议干杯的人——提出干杯和执行宴会程序。通常，斟酒者是由参加宴会的人当中最年轻的客人担任，他沉默地站在桌子旁边，恭恭敬敬地斟满了酒，殷勤地完成司仪的指示；而他只有在主席示意之后，才能喝酒。当斟满最后一杯羊角制成的酒时（按格鲁吉亚的旧风俗，人们要喝羊角制成的酒），司仪人喝的最少，虽然很愿意听，但他也只是应付几句，最后，用格鲁吉亚文简单地说几句宴会结束的话。

——格鲁吉亚长满了许多杂草，应当重新耕耘！——这就是司仪最后的几句话。格鲁吉亚的老布尔什维克米吉万、马哈拉泽低头不语，大口地喝着酒，频频举杯。

但是，这位年轻的斟酒者却破坏了高加索的礼节，他自己回答司仪说："杂草要除掉，格鲁吉亚要重新耕耘"——这次也没有司仪的建议，他一杯酒一口喝下，在座的人惊奇地互相巡视着，而司仪对他回敬了一杯酒很高兴。

司仪就是斯大林，而斟酒者就是拉甫连季·贝利亚。宴会之后，斯大林离去了，贝利亚第二天就被任命为肃反委员会副主任。这是在1922年末，贝利亚大概是二十三岁的时候。

但是，格鲁吉亚"重新耕耘"进行得十分艰难，1924年发生了新的、遍布格鲁吉亚的武装起义，由要求同等权力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民族民主主义者地下委员会所领导。这是最后一次试图解放格鲁吉亚。起义遭到了非人道的残酷镇压，起义领袖被枪决了，而参加者有将近五千人（据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正式统计）被消灭了（杂草铲除了）。这次战役的骨干是国家政治保安部的新首领拉甫连季·贝利亚。因此，贝利亚对斯大林坚守自己的诺言，而斯大林立即以相互的关系回答了他，贝利亚被提升为格鲁吉亚国家政治保安部部长，并授以国家最高军事"红星"奖章。此后，贝利亚的政治生涯就步步高升，节节胜利，没有一次失败。

当成立外高加索联邦时，贝利亚又获得了外高加索国家保安部副部长的职位。而部长老布尔什维克、中央监委帕夫卢诺夫斯基则完全被控制在年轻的、精力充沛

的、他的助手贝利亚的权势之下，因为他深知：唯一的一个不需要报告就可以直接进入斯大林办公室的外高加索人就是贝利亚。

由于莫斯科对他的无比的信任和各方面的信赖，在他们自己的圈子里日益增长了对贝利亚的仇恨。甚至在格鲁吉亚政府班子内，对贝利亚的行径也产生了怀疑。当梯比利斯的同志们知道，贝利亚是斯大林和明仁斯基的私人密探（明仁斯基是当时的国家保安总部部长），甚至还探听格鲁吉亚政府成员的家庭隐私，这种怀疑就直接变为仇恨。

但是，政府成员与贝利亚之间的斗争，如果归于他去莫斯科制造奇闻和怨恨（提升他做为克里姆林宫的眼睛），那么，人们就会按着自己的意志去惩治他。大家都知道，有好几次，人们想要干掉他。1930年贝利亚免除了一次死亡，那简直是奇迹。格鲁吉亚恐怖分子知道贝利亚要去高加索东部，他们在格鲁吉亚军事要道的山路上做好埋伏，当三辆“毕尤卡”牌汽车通过偏僻的山地时，恐怖分子藏在山里面，他们开了火，朝第一辆汽车扔了一枚手榴弹。手榴弹在空中爆炸了。经过激烈的战斗之后，第二辆和第三辆汽车狂暴地吼叫几声，抛掉了第一辆汽车就跑了。恐怖分子走近灼热的第一辆汽车旁，看到里边的乘客——一个高个子红军司令部军官和三个契卡分子已经死了。几小时之后，贝利亚向莫斯科报告说，发生了一场和土匪的激烈战斗。活下来的契卡

分子中，有的受了伤（后背负伤），还受到了奖赏。为此，贝利亚自己还获得了“红旗”奖章（贝利亚在苏联是获得奖章最多的人，光是列宁勋章他就获得七个）。

甚至当斯大林在莫斯科成功地消灭了敌人——托洛茨基“左倾”分子和布哈林右派分子时，在格鲁吉亚他的故乡里，他也没有多大影响和多少威望，因为，正如大家所说：在他的故乡中没有这种预言。在格鲁吉亚的老布尔什维克中，有许多人是斯大林在高加索搞地下工作时的老师，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承认他是各民族的正确的父亲。在反对他们的斗争中，斯大林与奥尔忠尼启则有时走的很远，甚至将明显带挑拨性的关于格鲁吉亚苏维埃与俄罗斯共和国苏维埃边界实行关税制度决议方案强加给格鲁吉亚苏维埃政府，还做了禁止格鲁吉亚姑娘嫁给俄罗斯人的决定，格鲁吉亚人否定了这些决议，并向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做了报告。①

正是这些被斯大林贴上“民族主义分子”的犯罪标签的格鲁吉亚老布尔什维克们，有一次就制服了斯大林。列宁在逝世前的政治遗言中提出撤销斯大林的职务，列宁写了“论自治”的文章，给布杜·米吉万写了反对斯大林的信，并建议审判他和奥尔忠尼启泽，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接受了老布尔什维克们的要求。最后确

① 见俄罗斯联共（布）第十二次党代会总结记录，1923年出版，第472页。

信：如果在列宁同志的帮助下能够成功地审判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的话，那么他们也难免要被枪毙。斯大林与奥尔忠尼启则不仅政治上有罪，而且犯有刑事罪，如1922年杀害了1907年为支持列宁而进行梯比利斯国库抢劫案的领袖老布尔什维克卡莫（切尔—彼得罗相）一事就足以说明。

但是，列宁去世了，没有来得及惩治斯大林（一些格鲁吉亚的老布尔什维克们认为，斯大林败坏了列宁），而他们的朋友托洛茨基失宠了。斯大林不但具有很好的记忆力，而且具有罕见的耐性。十年之后，斯大林通过贝利亚之手消灭了所有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分子”，几乎政府的全体成员通过他所导演的审判都被枪毙了。而最后杂草也被铲除了，格鲁吉亚被重新耕耘了。这时贝利亚被任命为格鲁吉亚共产党的书记，之后又被任命为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书记。这是怎样发生的呢？十七年后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斯涅果夫说：“1931年10月30日在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组织局会议上，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书记卡尔特维里什威里做了一个报告，所有边区执委会委员们都参加了会议，其中只有我一个人还活着。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的最后建议涉及到外高加索区委会书记处组成问题，内容是：第一书记是卡尔特维里什威里，第二书记是贝利亚。卡尔特维里什威里回答说：‘我很了解贝利亚’，因此他拒绝与贝利亚共事。斯大林把这一问题暂放一边，并决定在工作过程

中解决这一问题。两天之后，接到一个决定，贝利亚同意担任党内这一职务，但必须从外高加索驱逐卡尔特维里什威里”。①

但是，甚至贝利亚被任命为格鲁吉亚和外高加索书记之后，他在高加索之外的地区也没有名气。全党第一次知道贝利亚还只是在1935年，但当时贝利亚就在格鲁吉亚党中央委员会紧急代表大会上做了三天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的报告。报告的实质是：列宁在彼得堡和莫斯科，而斯大林从1898年开始在梯比利斯和巴库，几乎是同时两人单独地建立了布尔什维主义的基础。这完全是臆想出来的伪造的历史。但是，为此，贝利亚政治上的成就是非常巨大的。一年之前，在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贝利亚第一次被选为联共（布）党中央委员。

然而，在1937年第一次大清洗时，贝利亚自己也差一点被消灭。1936年在内务人民委员部职务上代替雅戈达选出了两名成员——一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另一个是拉甫连季·巴甫罗维奇·贝利亚。老契卡分子贝利亚比崭露头角的叶若夫的机会要多得多。但是，斯大林宁愿选择叶若夫（大家这样认为：他完全是出于民族考虑），而叶若夫心里明白：贝利亚是暂时作为后备，因为他的地位还不巩固，所以，决定消灭“列宁近卫军”的同时，也消灭掉“斯大林近卫军”——拉甫连季·贝利亚。

①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秘密会议上的报告，第46页。

但是，这个叶若夫自己却犯了致命错误，贝利亚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自己朋友那里得知：叶若夫正在制造他的案件，他立即从梯比利斯飞赴莫斯科，向斯大林汇报，而由中央任命的以莫洛托夫为首的委员会所查明的情况超出了贝利亚的意料之外：在叶若夫的侦察员文件袋内查到了卡冈诺维奇、安德列耶夫、米高扬、伏罗希洛夫、加里宁、贝利亚和其他人从事敌对活动的证据。暂时在中央委员会内没有算作“人民敌人”圈内的只有两个人——莫洛托夫和斯大林本人。叶若夫的日子也屈指可数了，后来不声不响地被从岗位上撤掉，并于1940年被枪决。贝利亚是善于窥测反斯大林阴谋活动的信号员，因而他被任命为苏联国家保安部内务人民委员部委员（1938年）。

贝利亚在契卡队伍内进行彻底清洗是他做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新的领导人所进行的第一次战役，成千名称职的契卡人员被逮捕、枪决和流放。几百万监狱犯把贝利亚反对契卡分子的行动，看做是给这些监狱犯恢复名誉，甚至重新评价许多案件。除了对“人民敌人”审讯时用的肉体刑罚被废除，监狱和集中营制度也有所改变。

但是，清除叶若夫和叶若夫分子并不是为人民报仇，而是为了夺回几乎被他们攫取的权力。至于说贝利亚——他和叶若夫一样，就是比较更精干，更熟练而已，在战争中他施展的是新的恐怖手段。应当承认：斯大林

（甚至在西方盟友给予他支持的时候）也不可能保住他的宝座，如果没有贝利亚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的话。红军不愿打仗，人民盼望本国政府失败，认为这是唯一拯救自己和国家的办法。情况急剧地变化，但是，作为苏联国防委员会成员，负责后方与前线政治精神状态的贝利亚并没有惊慌失措。在战争进程中，恐怖武器又被使用了——又开始了群众性的大逮捕。在红军里边出现了“讨伐特工队”（消灭特务）和“阻击部队”（内务部所属部队，专门射击被敌人俘虏过的人）的行动，对这些人执行公开的死刑——吊死，不管是在前线还是后方。人们面临抉择：是让契卡人员的绳索把脖子套上，还是吃一颗德国人的子弹？人们选择后者，特别是吉米列尔和罗赞别尔地区的人们，他们宁愿铤而走险死在沦陷地区和战俘营中。

这样，贝利亚就拯救了斯大林。为此，斯大林对贝利亚的提升可以说在官吏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贝利亚成了苏维埃国家宪兵队的元帅。

战后，贝利亚不再担任内务部的领导职务，他被任命为国家安全系统中斯大林的副手，斯大林在部长会议中有十四位法定的副主席，只有贝利亚才是真正的一个。

与党内“老近卫军”相比，贝利亚的党龄较短，但无论在独立性方面，还是创造性方面，以及作为一位老练的职业警察，在整个苏联国家内没有人可与他相比。

1946年成立原子能委员会，任命契卡分子——贝利亚为主席决非偶然，因为他是苏联原子能与“氢弹”之父的父亲。连一种外语也不会的贝利亚，讲俄语也象斯大林那样带有浓重的格鲁吉亚口音，竟然成为政治局和外交事务上精通一切的委员，并通过国外情报网可以获得第一手情报材料。

第 四 章

两个宠臣——马林科夫和日丹诺夫

对聚集在克里姆林宫相互倾轧的巢穴当中的人物，我们得先评述一下马林科夫和日丹诺夫。对他们，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评论说：

“马林科夫的家庭在当时‘高水平’的家庭当中算是最有知识的家庭。他曾是电力工程师，而他妻子长时间从事水力学院院长工作……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也完全受的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家庭教育，不追求高官显贵的奢侈生活……屋内陈设很简单，马林科夫的两个儿子在英语专科学校学习……很显然，马林科夫自己是神志最健康的人……从政治局驱逐出来，……1953年3月他提出了一个发展轻工业的纲领，引起了最活跃的反应……他立即受到人们的欢迎——但，这一点也害了他。从政府被驱逐之后，他回到了哈萨克斯坦……一次莫斯科也没有去‘朝拜’过……这就激怒了政治局……马林科夫象小城镇的市民一样，等待领取面包，这是向政府发出‘大胆的挑战’……

"安德烈·日丹诺夫出身于一个中学训导员的家庭，日丹诺夫曾是莫斯科彼德罗夫斯科—拉祖莫夫农业学院的大学生，那时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又发生了革命，当时他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因为需要，日丹诺夫曾被委任负责讲对外政策、哲学史、国际工人运动……最后，大家都痛恨他，因为他是一个执行任务的副官，也可能成为'斯大林的继承人'。……说真的，对待艺术，日丹诺夫象党内流行的那样持一种清教徒式的虚伪的立场。有一天，日丹诺夫的妻子关于这点说的很妙，她说：'伊利雅·爱伦堡那样喜欢巴黎，因为那里有裸体的女人'。音乐、绘画、电影中形象思维的本质——对日丹诺夫来说象高等数学那样格格不入。但是，为了成为一个'比皇帝还要伟大的忠君者'，他不惜一切地、拚命地去战斗。政治局内部关系十分复杂、混乱，彼此不是善良相处。在日丹诺夫的家里，由于马林科夫长了一张女人般的圆脸，大家都蔑视地叫他'马兰妮娅'。"（《仅仅一年》，1969年版，第358—363页）

格奥尔基·马林科夫是斯大林党僚内的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他没有念完莫斯科高等技术学院。在二十年代他积极参加反对托洛茨基和季诺维耶夫分子的斗争，用自己精心制定的正统的决议"草案"在党的会议上反对反对派。但是，他的决议照例遭到了否定，因为几乎所有莫斯科各大学的党组织的成员都是托洛茨基分子，可是从此在斯大林周围的逊色的智囊人物当中出现了一

个新的明星：马林科夫在各大学党的会议上成了一名职业演说家。

老实说，马林科夫飞黄腾达的前途是由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开辟的。在“十月革命”十周年的前夜，托洛茨基分子决定在荣获列宁勋章和劳动红旗勋章的莫斯科巴乌曼高等技术学院召开一次全莫斯科反对斯大林的会议。正象雅罗斯拉夫斯基在《联共（布）党史》上所说的，没有允许莫斯科市党委会和中央委员会派正式代表参加。托洛茨基写道：

“反对派非常巧妙地在莫斯科巴乌曼高等技术学院召开一次两千人的大会，街上还拥挤着一大堆人群。我和加米涅夫谈了将近两个小时……中央委员会号召工人以武力驱赶会议上的反对派。号召仅是为了掩盖他们在国家政治保安部领导下发动战斗队，进一步袭击反对派。斯大林希望以流血来结束这场战斗”。① 于是把这场“流血的战斗”交给了莫斯科巴乌曼高等技术学院过去的毕业生、中央委员会的视导员主任格奥尔基·马科西米里安诺维奇·马林科夫去进行。他指挥“战斗队”、“工人志愿军”（实际上是一批穿便装的契卡分子），向着莫斯科巴乌曼高等技术学院大楼的方向冲去。马林科夫很熟悉所有的出入大门，和战斗队员们一举闯进了大楼，毫不客气地驱逐了1917年10月曾攻打过冬宫的人。

---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1930年版，第十一卷，第277—280页。

如果认为，马林科夫式党棍是一些具有思想信念的人，那是太幼稚了，这些人具有一颗善变的良心和无尽的权欲。斯大林的亲信们第一次在历史上找到了党的政治和刑事犯罪有机结合的处方。根据这一处方，一切道德范畴和公认的人类行为准则，是处于经常变化的辩证关系中：恶毒可以变成善良，不忠诚可以变为忠诚，信义成为偏见，卑鄙行为成为功勋。对这一切“共产党员的道德标准”，他们不仅在党外的对敌斗争中使用，而且在党内，在自己同志之间也使用。然而胜利属于那些最狡猾的、在政治上善于使用新的卑鄙手段的人。而马林科夫的历史就是这些卑鄙行为中的一部分。

看一眼他的简历，就可以知道他从起飞到降落的过程：马林科夫于1902年诞生于爱伦堡省一个官吏的家庭，1920年参加了党，1921年—1925年毕业于荣获列宁勋章和劳动红旗勋章的莫斯科巴乌曼高等技术学院，1925—1930年在党中央工作，开始在中央统计局，后来又成为“斯大林秘书处”的成员，同时兼任政治局记录员，1930—1934年曾任莫斯科市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和部长（当时莫斯科市委书记卡冈诺维奇与赫鲁晓夫是他的上级），1934—1939年任党中央干部部副部长，从1939年开始被选为中央委员，1939年又任苏共中央书记，管干部，1941—1945年任苏共中央书记、苏联人民委员部副主席，国防委员部成员，1946年7月垮台，在土尔克斯坦流放

一个时期，1948年夏季回到党中央，为“总书记”之后的第一书记，1953—1955年成为斯大林的继承人，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7年被开除党中央，1962年被开除出党。

总之，马林科夫虽然倒台了，但还活下来了，比起他的老朋友、老同事、同犯贝利亚来说，他是比较聪明的，为了后来自己不被出卖，他轻易地出卖了贝利亚。想在苏联公开材料中找到1946年马林科夫临时失掉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职务一事是徒劳的，但是，这方面有许多间接的材料。

共产主义的统治者们迫使自己的人民普遍处于无权的地位，但他们之间是不平等的。为了说明这种状况，斯大林曾在克里姆林宫采用“领袖排列”的制度，只要出现小小的变化，就意味着政权当中人员变动的情况。在消灭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分子之后，采用了这种制度，政治局、中央组织部、书记处的成员不是按姓名，而是按职位的重要性排列，从斯大林开始往下排。根据它就可以判定“谁担任什么”，更重要的是“谁超过了谁”。因为“领袖升降”的经常活动的秘密，从《真理报》、塔斯社、广播电台以及所有宣传机关里都不能知道，因为他们报道领袖的事，首先要由中央宣传部门同意。

从1947年末以来，在克里姆林宫的“领袖排列表”上马林科夫的位置从前边开始后移。在1948年2月最

高苏维埃例会上，马林科夫在政治局占第八位：1、斯大林，2、莫洛托夫，3、日丹诺夫，4、贝利亚，5、伏罗希洛夫，6、米高扬，7、卡冈诺维奇，8、马林科夫，9、沃兹涅先斯基（赫鲁晓夫没有参加这次会）。但是，他从土尔克斯坦回来，日丹诺夫开始失宠。从排列上看，对日丹诺夫有另一种看法，他好象因病不再露面，而马林科夫却占据了第四位①。1948年9月2日在日丹诺夫隆重的葬礼仪式上，在棺木旁，马林科夫站在斯大林身边，对面站的是贝利亚和莫洛托夫。②马林科夫经过差不多两年的中断，又重新占据了斯大林身旁的位置，日丹诺夫在九泉之下应当感觉到这一点！这说明在斯大林的学生当中充满了戏剧性的内部斗争。

在战争期间，经常直接领导党的工作，唯一能分配党内高级干部、警察和军队的人是马林科夫，他是斯大林之后的党中央实际上的第一书记。因此，他同时又凌驾于政治局委员之上，虽然他既不是政治局委员，又不是候补委员。日丹诺夫回到中央工作之后的1934年（当时马林科夫还没有成为中央委员），就已成为中央委员会的常务书记，自然，他是以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自居了。但是，1946年3月的中央全会确认了马林科夫这一职务，并把他弄进政治局当委员，所以他的名字在《领袖排列表》上被排在了斯大林之后。这就意味着马林科

① 《真理报》1948年7月26日。

② 1948年9月2日在《消息报》上刊登的照片。

夫是皇太子。

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是一丘之貉，受到斯大林同样的信任。日丹诺夫很清楚，他要想坐上第一书记这把交椅，他只能狡猾地而又不声不响地把马林科夫从椅子上推下来才行。这个任务并不轻，但日丹诺夫也没有白白地喜欢重复斯大林一句名言："布尔什维克没有攻不克的堡垒"。日丹诺夫开始沿着防御比较薄弱的要道包围这个堡垒，然后，又集中火力进攻，成功地采取了布尔什维克"道德"法典中最有效的办法。

密洛凡·德热拉斯对日丹诺夫的评论是很有意思的，他说："他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并且在政治局内被认为是个大知识分子，尽管人们都知道他这个人很狭隘，很书呆子气，我敢说，他的知识是很渊博的，尽管他在各方面都稍稍懂得一点，甚至音乐也懂一点，但我不认为，他在某一方面的知识是很深的。他是一个典型的通过马列主义著作，在各方面都积累一点材料的一知半解的人"。①

日丹诺夫最善于分析斯大林的心理，他责怪马林科夫的过份的轻率，由于从驻加拿大苏联使馆逃亡的工作人员古赞科，而使苏联的"原子间谍"活动遭到破坏（从报刊上对古赞科的揭露使大家知道了：原子间谍的所有通讯情报都是寄给马林科夫本人的，此外，那些从

① 俄文版《德热拉斯与斯大林的谈话》，1970年西德《播种》出版社出版，第140页。

事机密工作的人也是由马林科夫办公室直接挑选的）。反对马林科夫的第二次进攻是决定利用斯大林病态性的怀疑症，这一手段获得了更大的成功：日丹诺夫告密了斯大林在国防部的副手、陆军总指挥朱可夫元帅。因为他熟悉朱可夫的生活与观点（朱可夫在列宁格勒担任总指挥，日丹诺夫是西北战线军事委员会委员），日丹诺夫开始使斯大林确信：马林科夫的门徒——朱可夫元帅妄图当俄罗斯的波拿巴分子。这一告密深深地印入了斯大林心中，他一个人常思量着这个使他不理解的爱发脾气的元帅的品格，并注意阅读西方报刊上越来越多的登载关于未来波拿巴分子的预言。他自言自语地重复说："没有火，也就没有烟"，同时，他也没有忘记：朱可夫是唯一的一个不是他教育出的人，而朱可夫却教育了他。

为了描述一下上述的事情，我想暂时离开一下本题，讲一段插曲：1941年10月，当德国人逼近莫斯科，甚至在望远镜上都已看到了红场时，斯大林想迁往古比雪夫（以安德列耶夫为首的党中央和以沃兹涅先斯基为首的人民委员部已迁到那里），但是，朱可夫坚决地说，绝不能交出莫斯科。大家都知道，在很多情况下，朱可夫都是坚决反对斯大林的做法的。

现在，当你阅读赫鲁晓夫时期的文献和朱可夫的回忆录时，你会很惊讶，与其说朱可夫很勇敢，毋宁说他在对待苏联独裁者的心理上是那样惊人的无知。有许多

次，朱可夫的脑袋都在契卡人员的子弹下，就是斯大林没有下命令开枪。这为什么呢？因为斯大林很快而准确地熟悉了这位陆军将官，“做为一个士兵，他是一个巨人，做为政治家，他是个零！波拿巴分子绝不是这号人。”红军中的任何一位有政治头脑的将军，都会认为进行下列对话，会掉脑袋的：

“1941年7月29日在斯大林办公室讨论基辅问题——斯大林问：‘基辅怎么样？’，我知道，用四个字就可以表示：‘放弃基辅’。但是，做为一个军人，我不能忍受这种感情，我的看法，应尽一切可能解决已造成的形势，基辅就能得以保留——我回答说，在西线应当立即组织反击，以消灭叶列尼突出部的敌军，敌人可能利用这个桥头堡来进攻莫斯科——‘基辅那里正在反击，你胡说八道什么？’斯大林大发脾气，‘你怎么能想到把基辅送给敌人？’我不能自持，回答说：‘如果你认为总参谋长只会胡说八道，那么他在这里还有什么用，我请求免除我总参谋长的职务，派我到前线去，看来，在那里我可以为祖国多做一点贡献’。‘你不要发怒’，斯大林说，‘不过，如果你这样提出问题，我们没有你完全可以……走吧，我们这就商量一下，然后再叫你’。四十分钟过后，斯大林给我打个电话说：‘我们商量过了，决定免除你的职务。’‘命令我到何处去？’‘你想到哪儿去？’‘我可以从事任何工作，可以上前线指挥一个师、一个军、一个集团军。’‘不要发怒！不要

发怒！你不是说过要组织反击叶列尼突出部的敌军吗？那么去执行这一任务吧，我们任命你为前线后备总指挥，你何时动身？’‘一小时后’。”①

日丹诺夫完全不是对准朱可夫，而是对准马林科夫，斯大林看得很清楚，但这是他的性格，——他善于鼓励政治局委员们的告密行为，以便在他们之间进行挑拨。这位独裁者个人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筑在党内贵族之间的内讧上。这些党内贵族以告密手段在斯大林面前争宠，这样一来，斯大林知道，上层任何一个阴谋家要想反对他是不可能的。

日丹诺夫开始使斯大林确信：正是由于马林科夫这种犯罪的轻率思想，由于他庇护朱可夫，吹嘘朱可夫在战争中的假功劳，这种波拿巴分子的阴谋是可能发生的。日丹诺夫尽量破坏这位元帅朱可夫的威信，简直到了散布“谣言”的地步。

战后，斯大林开始说朱可夫的各种坏话，随便说一下下边这件事：“你赞扬朱可夫，但他不值得赞扬，人们说，在每次战役之前，他都抓一把土在手里，然后闻一闻说：‘我们可以开始进攻，或者相反，计划好的战役不可能实现’。”② 赫鲁晓夫非常清楚，这种谣传的作者就是日丹诺夫。但他对此却沉默不语，因为，不然

① 苏联元帅朱可夫《回忆与思考》，1969年版，第311—312页。

② 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秘密会议上的报告，第38页。

他就不得不说出关于斯大林的真实情况。

后来，“日丹诺夫主义”的得名不仅是因为在文化方面转向黑暗势力。日丹诺夫主义——意味着彻底恢复战前斯大林主义的对内、对外政策。日丹诺夫很容易地使斯大林确信：正是在战后，人民、党和军队摆脱这种顺从的危险性更加明显了，如果继续执行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及其同伙在解放了的地区鼓励私人积极性建设住房政策，破坏集体农庄章程，扩大自留地（马林科夫还领导过解放区新苏维埃化委员会），鼓励煽动某些党组织清算政治上可疑分子的方针的话。

但是，日丹诺夫所指出的马林科夫的最大缺点，恰好是斯大林所经常警惕的。

马林科夫失去革命警惕性，以致于使暗藏的“西方间谍”、“世界主义者”、“谄媚者”、马林科夫的走卒——假道学亚历山大罗夫（中央宣传鼓动部的头头）在国内开始抬头。在各民族加盟共和国内（特别是在赫鲁晓夫家乡乌克兰和在波诺马林科的家乡白俄罗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操纵着文学，“匪徒们”控制着森林。在苏联军队里预先得到马林科夫的同意，实际上党的机构已取消，由朱可夫的个人走卒专横一切。

更为恶劣的是，马林科夫的对外政治主张是：支持共产党员与资产阶级民族分子相结合的“民族主义战线”，以代替东欧国家布尔什维化；在一定条件下接受马歇尔的援助，以代替揭露“马歇尔计划”的帝国主义

思想；鼓吹"世界和平运动"以及与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以代替世界革命。

日丹诺夫并不是一个人在活动，他根据斯大林的方法把政治局成员（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安德列耶夫）所有受马林科夫排斥的人都笼络在自己周围，很快使他们确信：他们的权力被马林科夫篡夺了，他不仅离间斯大林与政治局成员的关系，而且断绝他的国际、国内事件的情报来源。日丹诺夫认为：为了使政权机关正常地履行它的职责，必须赶走马林科夫和马林科夫分子。

尼古拉耶夫斯基特别细致地研究了这一阶段的党内斗争，他写道："此时，在政治局所形成的反对马林科夫的集团是一个'思想家'集团，他们关心的是恢复旧传统，恢复战前正统的斯大林主义……老一代党内'思想家'的愿望是恢复战前在党与国家生活中所起的作用。"① 以后的历史，尼古拉耶夫斯基在另一份考察报告中证实了："1946年春与夏，是这一阶段的决战时期，即解决国防部的政治部主任的任命问题和在军队中进行最后一次清洗问题。日丹诺夫介绍自己的亲密助手希金将军到这个岗位，这个任命遭到了朱可夫元帅的反对，他当时是国防部斯大林的副手。这场斗争是以日丹诺夫的胜利和朱可夫的失败而告终……希金在军队的指

① 苏联文化一历史研究所会议材料，1953年，第132页。

挥成员中开始了残酷的清洗”。① 日丹诺夫达到了目的：1946年7月，斯大林撤了马林科夫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职务，并将其派往土尔克斯坦，朱可夫元帅被调往州里领导军区。赫鲁晓夫也同样被撤去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务（1947年3月），但留在乌克兰，任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为了清洗乌克兰和监视赫鲁晓夫，任命朱可夫的同盟者卡冈诺维奇为乌克兰中央第一书记。同时，白俄罗斯中央第一书记、莫斯科中央委员会委员、马林科夫分子波诺马林科被任何人也不熟悉的中央委员会机关视导员、朱可夫的学生古萨罗夫所代替。

日丹诺夫占据了马林科夫的位置，并在苏联国内和国外开始了“冷战”政策。国内执行“冷战”政策的目的——从心理上造成准备进行新的大清洗的气氛。当然，这次战役的准备是根据斯大林的命令进行的，斯大林给予日丹诺夫在选择干部上以无限的权力。但是，为了安插新干部，必须清洗机关中的旧人员，就是这样办的，从列宁格勒调来一批日丹诺夫的嫡系，代替了被赶走的马林科夫分子。

特别是提高了日丹诺夫的两名助手的地位：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沃兹涅先斯基被任命为斯大林在政府里的第一代理人，代替了马林科夫，撇开了贝利亚。斯大林还将其拉进“七人委员会”成员之中，“七人委员会”是斯大林组成的，使之行使政治局的职责

① 同上，第132—133页。

(组成政治局所属的各种委员会，行使政治局的权力，但包括有非政治局委员参加，如果斯大林要采取反对某政治局委员的有效的措施，就避开政治局）。

这些次要角色的任命对日丹诺夫来说后果是严重的，由他推荐，由斯大林批准，确定日丹诺夫在列宁格勒州委时的助手库兹涅佐夫为中央委员会书记，主管国家安全与军队。由于日丹诺夫的庇护，他获得了高位。库兹涅佐夫认为：他现在不仅可以指挥麦尔库洛夫和阿巴库莫夫所领导的任何军队，而且能向贝利亚本人下达命令，甚至要从“机关”内清除贝利亚分子。与其说这是浅薄者库兹涅佐夫的悲剧性的谬误，毋宁说这是教条主义者日丹诺夫的悲剧性的谬误。从此他们开始走向灭亡的道路。

贝利亚意识到，由于对马林科夫失宠的政治意义估计不足，因而犯了大错误，他开始采取积极办法使他返回莫斯科。但是，恢复马林科夫的名誉要通过破坏日丹诺夫的名誉及其党羽才能做到。怎样办？对贝利亚与马林科夫，即党与警察方面的两个天才来说，没有问题。既然马林科夫没有被开除政治局，他还经常来莫斯科参加会议，就很容易与贝利亚商定消灭日丹诺夫走卒的详细计划。根据他的经验，他知道，对付日丹诺夫本人是很容易的。

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为自己和马林科夫辩护，那时马林科夫还坐在苏共中央主席团里。把

"列宁格勒事件"归罪于贝利亚一个人，他说："提高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的地位，使贝利亚感到不安。……正是贝利亚向斯大林建议：他与自己的同谋者以申请书和匿名信的形式制造反对他们的材料……"。①只有在1957年从党中央委员会开除马林科夫之后，赫鲁晓夫才宣布，马林科夫是贝利亚的第一个同谋者；但没有宣布"第三个同谋者"，那是他自己。在某种意义上讲，以日丹诺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其他老布尔什维克们为一方，以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为另一方，他们之间的斗争，反映了十月革命前后两代人之间的冲突。

列宁喜欢重复这样一件事：狐狸的小心谨慎表现得更为狡猾。但是设下假圈套，让狐狸小心地绕过它，然后再落进隐蔽的圈套里。为了反对斯大林，贝利亚与马林科夫设下了许多这样的假圈套，从1948年开始，就使那个让马林科夫倒台，提拔"列宁格勒黑手党"的人——日丹诺夫陷入了真正的圈套。

日丹诺夫的晋升是神速的，但，也是动荡不定的。当斯大林策划暗杀基洛夫和最后一次在列宁格勒清洗基洛夫分子时，他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是斯大林的右手。战时，他和伏罗希洛夫在列宁格勒指挥西部战线上的军队，曾向斯大林报告说，他们完全处于无能为力的

① 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秘密会议上的报告，第41页。

状况，以致使德国人包围了列宁格勒。斯大林粗暴地免除了伏罗希洛夫的职务（在他的位置上任命了朱可夫），但不知为什么留下了日丹诺夫没予以处理。日丹诺夫从列宁格勒被召回并担任苏共中央（1945年）第一书记（“总书记”之后），斯大林让他进行战后新的“大清洗”，以此恢复自己的名誉。日丹诺夫以天生固有的走狗式的殷勤进行了这项工作。但是，由于贝利亚、马林科夫早已预谋好的奸计，斯大林开始怀疑日丹诺夫在他的权欲和虚荣心很强的妻子影响下，扮演着双重角色。

象往常一样，为了对抗和监视日丹诺夫，斯大林把苏斯洛夫拉进苏共中央委员会，当秘书（1947年）。苏斯洛夫很清楚，在斯大林面前，贝利亚具有什么样的份量（苏斯洛夫与斯大林只有在苏共中央书记处很少召开的会议上遇到，从不个别接触），苏斯洛夫一开始就在自己的前程中对他下了赌注。

苏斯洛夫战前曾在人民委员部和党内从事协调工作，开始在中央监察委员会机关工作，之后又在苏共中央党内监督委员会工作。他的官衔并不高，据他在监督委员会里的同事记载，他仅是一个视导员，但是这个等级使他成为苏共中央的专门人员。在“大清洗”时期，苏斯洛夫已经提到超过党内监督委员会副主席叶若夫的官衔，他与叶若夫一起参加起草有名的党内积极分子名单和被判处死刑的名单，呈报斯大林和政治局批准。

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说，在1937—

1938年，为斯大林制定了383个这种名单。①

1938年11月，在贝利亚占据了叶若夫的位置之后，苏斯洛夫已开始为贝利亚制定另一种“名单”，即完成党内清洗任务的人员名单——代替被消灭了的叶若夫分子的人民委员部党内监督网的职员名单。

在战争期间，在高加索战场上，贝利亚进一步认识了苏斯洛夫，当时他俩都是军事委员会成员，并领导了高加索人民的迁移工作。战后，由于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推荐，苏斯洛夫被任命为波罗的海沿岸的党中央特别代表，具有清洗“解放了的共和国”的无限权力。他很成功地把波罗的海沿岸居民的四分之一迁到西伯利亚。苏斯洛夫证明：把他放在任何岗位上都可以信赖。因此，他从一个中等的党与警察的监督员获得了党内“思想家”和“理论家”的称号。当然，他是与除“泰斗”之外僭称马列主义第二位的日丹诺夫相抗衡的。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网罗了这个苏斯洛夫，反对日丹诺夫分子，准备给以打击，这是一次有名的“列宁格勒事件”。

官方消息从未宣布过这件事情的真相。从赫鲁晓夫的部分言论中可以了解到，列宁格勒人没有策划任何阴谋，只是建议成立俄罗斯共产党及其中央委员会和列宁格勒中心，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从莫斯科迁往列宁格勒。康奎斯特也有一种说法（来自于别的渠道），他

① 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秘密会议上的报告，第28页。

说，日丹诺夫分子希望将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心迁往列宁格勒，而这就不能不引起斯大林的警觉。①问题是：在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俄罗斯共和国是唯一的一个没有俄罗斯共产党的联邦共和国。两个策略大师贝利亚与马林科夫立刻抓住了这个建议，利用它，通过中央委员会这条线上的人（苏斯洛夫），又通过国家保安部这条线上的人（阿巴库莫夫），并预先得到了在乌克兰受压的赫鲁晓夫的支持反对日丹诺夫分子的走卒。

贝利亚与马林科夫反对日丹诺夫分子的“行动计划”，放在中央的秘密档案中，党内官方历史学家，象我们这样的人也没有看到。但是，从集中营回来的老布尔什维克们还活着，他们在党中央设立的为由于“个人崇拜”而牺牲的人们恢复名誉的委员会里作为专员工作着，他们能看到这些档案材料。马林科夫周围许多显贵们还活着，也许，从他们那里能听到关于“列宁格勒事件”的真实情况。

据说，下边这些事是强加于日丹诺夫分子身上的：既然斯大林已经年迈，自己提出要求，战后免除他的一切重要职务，并指定继承人，那末，联共（布）党中央应当解除对俄罗斯联邦的直接领导，并建立自己的中央和以列宁格勒为中心的俄共（布）；同时应当改组

① 罗伯特·康奎斯特《苏联的权力与政治》，1961年，伦敦出版，第103页。

中央机构，建立有威信的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他们指定斯大林将总书记职务交给日丹诺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由沃兹涅先斯基担任，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第一书记由库兹涅佐夫担任，而库兹涅佐夫在联共（布）党中央的职位由罗吉昂诺夫接替，免除他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国家保安部和内务部又合并起来，由列宁格勒州委书记波普科夫领导。我们怀疑，这样的建议能否真正出自日丹诺夫分子之口。我们还应当注意到，如果斯大林本人没有挑唆日丹诺夫分子提出这种建议，那么这种传说的制造者就是斯大林自己。有一份苏联官方材料，关于这个问题透露了一点情况。下边是苏联海军上将库兹涅佐夫发表在列宁格勒出版的杂志《涅瓦》1965年第5期第161页上的一段回忆录：

“1947年6月24日举行了胜利检阅……检阅结束后，最高领导留在一所周围是克里姆林宫高墙的小楼内……举行临时宴会，当然，注意的中心是斯大林，一切成就和胜利只能都归功于他个人。同时，正是在这里，还建议授予斯大林大元帅的称号，给他颁发第二枚‘胜利勋章’，并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但是，在宴会结束时，斯大林作了一个声明，日丹诺夫的最忠实的学生完全有理由抓住斯大林的话，下边就是库兹涅佐夫所说的斯大林的一段声明：

“当大家为自己的事业多次干杯之后，情绪更加高

涨，斯大林开始说话了。记得，那时他快六十七岁了，他突然喋喋不休地说，他还有多少年可以留在他的岗位上，他说：‘看来，我还可以工作两、三年，然后我应当离职’。这就是当时斯大林说话的主要意思。我不想讨论，这是否是他的真实愿望，还是他就想看看：这一不寻常的声明会在周围引起什么样效果……我不知道，斯大林是否说过此话，比如什么时候在他们小圈子之内说过，为什么又矢口否认。”

他“矢口否认”的原因，最大的可能是：后来贝利亚、马林科夫与赫鲁晓夫把日丹诺夫分子建议成立俄罗斯（布）共产党一事向斯大林证明说，这是“反对党和国家”的，即反对斯大林本人的阴谋。

贝利亚与马林科夫的“这一着棋”进行得如此突然，令人感到震耳欲聋，以致使日丹诺夫死于克里姆林宫医院，而斯大林象往常一样，把这看做是他“坏良心”的结果。

日丹诺夫的儿子尤里·日丹诺夫把手中最大一张王牌交给了日丹诺夫的敌人（尤里·日丹诺夫是中央委员会科学部的领导人之一）：他公开宣布，李森科是大骗子，他在中央的委任下，在学术界横行霸道。为了达到挑拨离间的目的，日丹诺夫的儿子的发言是由苏斯洛夫根据贝利亚的指示组织的，然后，苏斯洛夫又向日丹诺夫的儿子建议，要他给斯大林写一封反省的信，这个遵守纪律的共产党员同意了，日丹诺夫的儿子承认：他反

对中央，表示改过。但是，老日丹诺夫的敌人的意图还在于让大家看到这封信中所没有的东西：即老日丹诺夫不但培养了斯大林的敌人，而且还把他拉进中央委员会机关内。这封信发表于1948年8月7日的《真理报》上，三周之后宣布：日丹诺夫“由于患严重肺气肿引起心脏麻痹”而死。①

日丹诺夫死后不久，日丹诺夫分子很快都被消灭了。在红场上举行日丹诺夫的葬礼时，站在列宁墓前斯大林旁边的还有三个日丹诺夫分子——国家保安部、内务部和军队的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列宁格勒州委书记波普科夫和政治局委员、斯大林主持政府事务的第一副手沃兹涅先斯基。还没过几个月，前两人就被投入卢边卡地窖，而沃兹涅先斯基在家中被逮捕。不久，又制造了“莫斯科黑手党”——逮捕了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罗吉昂诺夫，而党中央和莫斯科中央委员会书记波波夫在家中被逮捕，之后，又把他流放到伏尔加河流域的什么地方。

因此，1949年末，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成功地重新建立起进一步打击斯大林的阵地。

① 1948年9月1日《消息报》。

第五章

为东欧苏维埃化而斗争

战后，教条主义者日丹诺夫无论在发挥斯大林的意识形态机构的职能作用方面，还是在运用辩证法方面，显然都跟不上形势。特别令人惊讶的是，日丹诺夫与斯大林近在咫尺，竟然不知道斯大林对东欧国家的“长远政策”：否认这些共产主义国家的主权，由苏联吞并它们。当然，斯大林不能公开讲出这种意图，但他为实现这个目的，早已指示共产党情报局的思想家普·尤金和维·格里哥梁深入研究“人民民主是向社会主义民主过渡的形式”问题。普·尤金已在苏联的报刊上发表文章。不过，斯大林吞并东欧国家（东德除外）的计划有若干准备阶段。比如说，首先需要根据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建立一个类似不列颠的“联邦”。在呼吁书中甚至使用了“社会主义联邦”一类的词语。它和前者的差别仅仅表现在：通过不列颠“联邦”的道路，殖民地国家经过自治将成为独立的国家；通过斯大林设计的道路，恰恰相反，独立国家经过共产主义自治将沦为殖民地。

十分明显，这个针对日丹诺夫的计划，也是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暗示给斯大林的，并且由他们建立的苏联法学家专门小组（安·维辛斯基、德·切斯诺科夫）提供了理论根据。其实，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专家们大概引用了列宁主义的下述原则："苏维埃共和国……是更高类型的民主机构的形式，而且也是唯一形式。"①

对布尔什维主义说来，国家主权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不是主要的要求，而是从属性的要求。列宁写道："民主运动的个别要求，包括民族自决在内，并不是什么绝对的东西，而是世界整个民主主义（现在是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小部分。在个别的具体情况下，部分可能和总体相矛盾，那时就必须抛弃这一部分。"②怎样对待布尔什维主义这个似乎纯俄国的产物呢？它适用于其他国家吗？列宁的回答十分明确："布尔什维主义对所有的人都是策略的典范。"③其次，列宁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1919年）论述俄共（布）的纲领报告中说，新诞生的共产主义国家加入苏维埃俄国，并和它组成一个共同的、没有国界的"全世界苏维埃共和国"。列宁补充说："当建成全世界苏维埃共和国后，我们可能有一个共同纲领。"④

可是，日丹诺夫并没有推行苏维埃化政策。相反，

---

① 《列宁主义问题》，第39页。

② 《列宁全集》，第22卷，第335—336页。

③ 《列宁全集》，第18卷，第三版，第386页。

④ 《俄共（布）党第八次代表大会记录》，第101页。

他在维护东欧各国主权、反对西方的口号下推行了一种卫星国化政策。事实很快表明，这种政策使苏联也身受其害。马林科夫和贝利亚轻易地使斯大林相信，日丹诺夫的政策不仅加剧了东欧的离心倾向，并鼓励了那里的与其说是反对西方的，不如说是反对苏联的民族主义。日丹诺夫不理解由于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赢得胜利，西方盟国已经承认，东欧国家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我们既然已答应在那里恢复民主，就应当恢复民主，而且要采取最高的苏维埃形式。

这就是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推行的路线。苏联政治警察利用同一个共产党情报局推行这条路线，却把日丹诺夫一伙完全抛在了一边。捷克斯洛伐克人首先发现了这一情况，并决定退出共产党情报局。但由于贝利亚制造了1948年2月阴谋事件，事先制止了他们的意图。南斯拉夫人在政治上和地理政治上都处于有利地位，因而不受制裁地脱离了共产党情报局。这件事使日丹诺夫在斯大林面前跌了致命的一跤。斯大林惊慌万分，唯恐南斯拉夫事件成为其他国家仿效的先例，从而破坏他推行苏维埃化的整个战略，因此需要除掉这个“先例”。但怎样除掉呢？最初的方案可能是想发动军事进攻，反对铁托。斯大林对赫鲁晓夫说过：“我只要把小指头一弹，就不再会有铁托了。他就要垮台。”①

① 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秘密会议上的报告，第43页。

为制造"把小指一弹"的心理气氛，斯大林按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提出的计划，开始清除日丹诺夫在共产党情报局的朋友和同事。在各卫星国掀起了反对"铁托分子"的运动。这些戏剧性斗争的许多情节，至今仍然是莫斯科和东欧各首都警察档案库里的秘密。铁托甚至把德热拉斯投进了监狱，因为他泄露了其中某些情节（《同斯大林的谈话》）。尽管如此，部分历史的本来面貌还是可以恢复起来的。

首先，指责日丹诺夫是苏联三项失败行动的组织者：组织以希腊"马尔可斯将军"为首的游击战争；封锁柏林；要求土耳其同意苏联在海峡地区建立海军基地（包括"苏联的亚美尼亚人"和"苏联的格鲁吉亚人"为使位于东阿纳托利亚的原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地区重新并入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而开展的运动）。这些计划不仅可耻地遭到破产，反而促成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促成公开发表旨在保卫土耳其和希腊的"杜鲁门主义"。但更为严重的是，指责日丹诺夫轻举妄动，罪恶地勾结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和铁托，准备建立巴尔干联邦。诚然，这是季米特洛夫出的主意，但日丹诺夫也认为它符合列宁、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联邦的学说。季米特洛夫打算把"正在获得解放的"希腊并入这个联邦。这一前景很富有诱惑力。

《世界报导》（1947年6月）引用过季米特洛夫的一

段话："最初可能由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三国结成联邦，然后，罗马尼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还有匈牙利可能加入这个联邦。"①

1948年1月21日，季米特洛夫在索菲亚举行记者招待会，详细地论述了建立巴尔干联邦的优越性和必要性。直属日丹诺夫领导的《真理报》发表了季米特洛夫的讲话并明显地表示赞成讲话观点。那时，铁托已经发现南共中央委员阿·杰勃兰格是苏联情报机关的间谍，他不仅向苏联大使系统提供了中央委员会会议的情况，还可能提供了铁托与季米特洛夫互相联系的情况。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很容易向斯大林证明，建立巴尔干联邦的目的，是与苏联在东欧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优势分庭抗礼。1948年1月28日，《真理报》就联邦问题发表一项编辑部声明。熟悉斯大林的政论语体特点的人，一眼便能辨认出谁是"声明"的作者。声明的全文如下：

"《真理报》编辑部收到苏联各地读者提出的许多问题，其内容可概括如下：《真理报》登载季米特洛夫同志在索菲亚记者招待会上的声明，是否意味着编辑部同意季米特洛夫的立场，即认为建立巴尔干和多瑙河沿岸国家（包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希腊在内）的联邦或联盟是适宜的，它们之间建立关税联合是必要的。《真理报》编辑部认为有必要做以下声明：1，《真理报》不能不登载季米特洛夫已发表在其他国家机关报上的声

① 姆·埃邦恩著《马林科夫》，1953年版，第53页。

明，而且不言而喻，《真理报》对此声明不能敝任何改动；2，这并不意味着《真理报》同意季米特洛夫关于上述国家建立联邦和关税联合的立场。相反，《真理报》认为这些国家并不需要建立凭空臆造的和令人可疑的联邦或联盟，也不需要建立关税联合；他们需要象著名的九国共产党宣言正确指出的那样，通过动员和组织本国的人民民主力量来加强和维护自己的独立和主权。”

这是彻头彻尾的斯大林的逻辑：这些国家应当各自保持独立，以便更加依附于苏联。如果季米特洛夫提出巴尔干各国与苏联建立联邦的建议，斯大林自然不会有任何反对意见。

这里不能不引用密洛凡·德热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一书中的某些话，这本书是记载这一时期的极宝贵的第一手历史资料。1948年2月初，斯大林召见保加利亚人和南斯拉夫人。苏联方面出席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马林科夫、苏斯洛夫、佐林；保加利亚方面出席的有：季米特洛夫、柯拉洛夫、柯斯托夫（后被处决）；南斯拉夫方面出席的有：德热拉斯、卡德尔、巴卡里契。莫洛托夫首先说，苏联同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有严重分歧。莫洛托夫举出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签订的同盟条约（事先未同苏联协商）作为例子。当莫洛托夫开始批评季米特洛夫的联邦计划时，斯大林打断了他：

“季米特洛夫同志在记者招待会上可能忘其所以了，没注意到自己都说了些什么。他所说的和铁托所说

的那些话，外国还以为我们事先都知道了。譬如说，波兰人到我们这里来过，我问他们：你们认为季米特洛夫的声明怎么样？他们回答说：是很明智的见解。而我对他们说，不是明智的。于是他们说，如果苏联政府持这种看法，他们也认为不是明智的。他们以为季米特洛夫发表声明曾得到苏联政府的事先同意，所以表示了赞同。”①

莫洛托夫补充说，保加利亚竭力想同罗马尼亚结成联邦，“甚至事先不同苏联政府进行磋商”。②季米特洛夫辩解说，他只不过一般地提了一下联邦问题，斯大林打断说：“不，你们已经商定要建立关税同盟，协调工业计划。”③莫洛托夫接过斯大林的话，说：“关税同盟、协调经济不是建立一个国家又是什么呢？”④

季米特洛夫辩解说，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没有缔结任何条约，他们只是共同表明了这种意愿。斯大林又粗暴地打断了他：“不错，可是你们没有同我们磋商！我们从报纸上才了解到你们之间的关系。你们象站在街头的夸口婆娘一样信口胡说，可是新闻记者却抓住了你们的话。”⑤

---

① 《德热拉斯与斯大林的谈话》，第164—165页。

② 同上，第165页。

③ 同上，第165页。

④ 同上，第165页。

⑤ 同上，第166页。

季米特洛夫又一次试图辩解，他说："我们确实错了，可是我们在对外政策中一定吸取这个教训。"① 斯大林没有表示谅解。德热拉斯说："斯大林既尖刻又讽刺地说：'吸取教训！你们搞了五十年政治，还改正错误！这不是错误问题，而是你们的立场和我们不同'。"②

这时，共产主义运动的老战士、列宁的保加利亚战友柯拉洛夫出来为季米特洛夫辩护。这一段对话是很耐人寻味的。柯拉洛夫说："我不认为季米特洛夫有什么错误。我们不是已经事先把同罗马尼亚缔约的草案送给了苏联政府吗？而苏联政府并没有反对建立关税同盟……"③ 斯大林问莫洛托夫："给我们送来过条约草案吗？"莫洛托夫做了肯定的回答，于是季米特洛夫的胆子大了起来，说："草案送给了莫斯科，我没想到你们会有什么意见。"④ 这使斯大林勃然大怒。他不喜欢别人用事实推翻他的论点。对他来说，事实并不是不可改变的。他象训斥孩子似地训斥这位莱比锡英雄说："胡说！你简直象个共青团员，不自量力。你想让世界大吃一惊，你还是共产国际的书记呢！你和南斯拉夫人没有向我们报告过你们之间的任何事，我们全是道听途说来的。你

---

① 《德热拉斯与斯大林的谈话》，第167页。

② 同上，第167页。

③ 同上，第168页。

④ 同上，第169页。

们迫使我们面对既成的事实。”①

季米特洛夫每次取道贝尔格莱德去莫斯科“度假”和“会谈”，都劝告南斯拉夫，在和莫斯科争论时要保持坚定的立场。②可是这次，季米特洛夫却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既然知道斯大林怎样镇压那些不合他心意的共产党领袖，知道季米特洛夫怎样倡议并坚持建立巴尔干联邦，知道（通过密洛凡·德热拉斯证实）斯大林如何攻击季米特洛夫，那末，我们可以认为世界报刊关于季米特洛夫非正常死亡的评论，是有充分根据的。苏联官方报道（《真理报》1949年7月3日）说：“季米特洛夫在长期患重病（肝脏和糖尿病）后，1949年7月2日于莫斯科近郊‘巴尔维哈’疗养院逝世。”一年前，在瓦尔戴，日丹诺夫也于疗养院“逝世”。

直到1949年11月，斯大林才决定在布达佩斯召开共产党情报局会议（由苏斯洛夫主持）。会议上的主要报告是斯大林在罗马尼亚的代理人乔治乌—德治做的题为《在凶手和间谍控制下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报告。苏斯洛夫带来了会议决议，指控南斯拉夫反对共产主义，为美国效劳，犯下了大量政治罪和刑事罪。但令人奇怪的是，为什么斯大林不发动反对铁托的战争呢？看来，战争之所以没有发生，不是由于世界舆论同情南斯拉夫（斯大林向来无视这种同情），也不是出于他对国际法准则的

① 《德热拉斯与斯大林的谈话》，第169页。

② 南《战斗报》，1949年9月29日。

尊重（斯大林认为全是空洞之词），而是惧怕南斯拉夫人民进行解放战争，担心其他卫星国的人民，甚至美国都会卷入战争。鉴于这些情况，斯大林不得不设法通过内部阴谋手段搞掉铁托（前不久被揭露的南斯拉夫亲情报局分子搞的阴谋活动表明，克里姆林宫的现领导人依然采用斯大林的手法）。

斯大林惯于把自己的罪恶意图硬加给自己的敌人。在他争夺列宁之后的权力宝座的历史中，这种事例比比皆是；登上宝座之后，他依然如此。战争时期，斯大林曾给在政治上是个不可救药的上等兵的希特勒硬加上许多野蛮人的赤裸裸的政治哲学，这类的话在马基阿维里那儿都难以找到。斯大林说希特勒讲过这样的话："人生来就是有罪的，只能使用暴力统治他们。对他们可以不择手段。如果有政治需要，就应当撒谎，出卖别人，甚至进行屠杀。我把人从称做良心的不切实际的幻想的屈辱中解救出来。我有一个长处，即任何理论或道义观点都约束不了我。"① 希特勒可能是这样行动的，但他决不会这样说。如果他大言不惭地宣扬那种否认道德的哲学，就根本不可能在一个道德高尚、文化发达的德国上台执政。斯大林之所以给希特勒编造了这段话，而是因为他自己不但是这样想的，更主要的，是这样做的。现在斯大林又要把自己的制度和他本人犯下的罪行，硬加在铁托的头上。显然，斯大林心中牢记屠格涅夫散文诗中

① 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1952年版，第28—29页。

一位主人公的道德信条："如果你想狠狠地刺痛甚至伤害你的对手，"一个老奸巨猾的家伙对我说，"那么你就要指责他有你所有的那些短处。要义愤填膺，要振振有词。这样，第一，人们会认为你没有那些短处；第二，愤怒甚至是发自内心的……你可以利用自己的良心去责备他。比如，你是一个叛徒，那末，你就要指责对方没有信念。如果你本人是一个精神奴仆，那末，你就要指责他是奴仆，是文明的奴仆，欧洲的奴仆，社会主义的奴仆！""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奴仆行为的奴仆，"我补充说，"当然可以。"老奸巨猾的家伙附和我。

在研究斯大林和铁托的斗争史时，这些事自然地会在脑海中浮现。当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关系紧张到白热化的时刻，斯大林亲自给南斯拉夫政府发了"外交"照会。不仅文章风格，而且内容都证明照会是出自斯大林之手：照会中的语言，除斯大林之外，任何人也不敢用。因为人们读了照会不禁会产生一种印象：与其说照会所描绘的是南斯拉夫，倒不如说描绘的是斯大林的苏维埃制度和苏联共产党。

"马克思主义政党召开代表大会的目的，不在于歌颂领袖，而是为了以批判的态度审查现领导的活动，必要时要改组它，以新的领导代替它。凡拥有党内民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都认为以这种方式改变领导是自然的、完全正常的……（这也间接回答了为什么斯大林14年没有召开党代表大会的问题——作者注）南斯拉夫政权还

有什么民主可言呢？现在整个南斯拉夫都建立了盖世太保式的统治，镇压一切自由思想，践踏一切人权，南斯拉夫的监狱已有人满之患……南斯拉夫共产党已变成政治警察分局（与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一模一样）。”

接着斯大林描述了南斯拉夫监狱中的骇人听闻的情况，说那些被怀疑为苏联情报机关服务的俄国侨民怎样受到拷打。斯大林把白俄侨民（一直到现在被认为是“白匪”）称做“苏联公民”。他对在审讯时铁托对他们施加的暴行表示愤慨，指出有人被强迫站立20小时，不准活动，连续两昼夜不得睡眠（斯大林那里平均是十昼夜）；有人在夜间审讯时遭到棒击；有人被毒打，六次被关进单人囚房（这一切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所作所为相比都大为逊色）。斯大林问道：

“这种胡作非为、惨无人道地对待人的制度，能叫做人民民主制度吗？把犯有这种罪行的制度说是法西斯盖世太保制度不更为确切吗？”

最后，斯大林用赤裸裸的武装干涉的口气威胁说：

“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声明，它对这种局势不能袖手旁观，将被迫采取其他更为有效的措施……以便保护在南斯拉夫境内的苏联公民的权益，并教训一下那些狂妄的法西斯暴徒”。①

斯大林最终没有去占领南斯拉夫，也未能教训一下铁托。但是应该相信他的话：他是准备这样做的。他的

① 《真理报》1949年8月21日。

比较“自由主义的”继承人占领了匈牙利（1956年）和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这两次占领表明，如对苏联政府的帝国主义大国利益稍有触犯，那末，东欧各国的主权不过虚有其名而已。

季米特洛夫死(或被谋杀)后，斯大林开始清洗卫星国的联邦派分子。1949年底对季米特洛夫的支持者——特洛伊乔·柯斯托夫和保共中央以及政府其他人员的审讯完全证明，季米特洛夫关于建立巴尔干联邦的计划不但是他们而且也是东欧各国“铁托分子”的主要罪状。只有一点令人奇怪：从来特别谨慎的斯大林，为什么在审讯时公开指责保加利亚共产党人有建立巴尔干联邦的“罪恶企图”，而从前他曾在《真理报》上指责这是季米特洛夫的主意。斯大林应当料到，这种情况会引起人们对季米特洛夫在莫斯科近郊的突然死亡产生合理的怀疑。人们会认为，斯大林不敢公开审讯季米特洛夫这只“莱比锡虎”，而把他秘密地杀害了。此外，斯大林还表现出一种不合乎他本性的、近似轻浮的勇气。强迫柯斯托夫“供认”建立联邦的计划根本不是季米特洛夫的主意，而是铁托早在战争后期想出来的，其目的是使巴尔干脱离苏联。“供认”的内容如下：

“卡德尔强调说，现在是实现建立联邦理想的最好时机，因为世界各国还忙于战争，采用联邦的形式把保加利亚合并到南斯拉夫来会进行得顺利些。不过要马上采取果断的行动，使世界面对既成的事实……南斯拉夫

人搞联邦，只不过是想要吞并保加利亚，使它完全依附于南斯拉夫，从而轻易地使它和南斯拉夫一道脱离苏联。”①

“使巴尔干脱离苏联”——斯大林所担心的正是这个问题。因此需要日丹诺夫和季米特洛夫先死掉，现在轮到了柯斯托夫。

斯大林的伪善行为是举世无双的。根据克里姆林宫的规定，只能以机关或团体组织的名义，而决不允许以个人名义包括斯大林在内，在党的领袖的灵柩前献花圈，但斯大林首先破坏了这项规定。他献了花圈，并在题词中令人感动地写道：“献给敬爱的朋友和同志格奥尔吉·米哈依罗维奇·季米特洛夫。约·斯大林”。这使人们不禁想起斯大林在自己的著作《列宁主义问题》上的题词：“献给我的朋友和兄弟——谢尔盖·米洛诺维奇·基洛夫。约·斯大林”。斯大林的“朋友们”和“弟兄们”无论在哪里生活，都不象在斯大林帝国那里危险。

---

① 《真理报》1949年12月1日所载：“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最高检察院对特洛伊乔·柯斯托夫及其同伙的起诉书”。

第六章

准备新的“大清洗”

日丹诺夫死后，日丹诺夫理论改称做“苏斯洛夫理论”。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早已暗中支持苏斯洛夫反对日丹诺夫，现在，他们不但同苏斯洛夫公开往来，而且要斯大林相信苏斯洛夫是一个比日丹诺夫不知高明多少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日丹诺夫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切特权，合法地转到了苏斯洛夫手中。

斯大林指示苏斯洛夫把日丹诺夫理论提高到一个新阶段。这意味着从揭发“世界主义者”和“卑躬屈节分子”转到揭发新的“人民敌人”：各学术领域里的“学者——暗害分子”、全国各地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苏联的任何一个公民，从政治局委员到农庄庄员，都可能被加上任何一项罪名而遭到迫害。这意味着由恐吓“人民敌人”转到消灭“人民敌人”，意味着被消灭者必须象三十年代发生过的那样公开承认莫须有的罪行，最后还意味着所有的苏联成年公民必须遵照1937年党提出的口号

——“每个苏联公民都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合作者”①，与秘密警察合作。

针对这种合作，俄国哲学家兼评论家格·费道托夫说得极为深刻：“即使憎恨当局，你也要歌颂它。可是，斯大林走得更远。他发明了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制度，强迫每个公民去干卑鄙勾当，要他们丧失自尊心，成为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人……彻底摧毁人的意志，玷污人的良心，要人们成为叛徒、诬告者。这种人再也不敢直视别人的眼睛，完全按照我们的指令行事……要求被诽谤中伤和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的人痛自悔恨，放弃自己的思想。这样做仍然是想从精神上摧残作家和学者。他们过于狂妄，自以为献身于科学和艺术事业。其实，他们是为我们服务；他们是靠国家谋生的妓女。让他们不要忘记这一点。”②

斯大林所策划的新清洗，恰是要达到这种目的。《列宁格勒事件》揭开新的清洗的序幕，官方对此完全保持缄默。甚至1949年7月13日中央关于解散《布尔什维克》杂志（现名《共产党人》）编辑部、中央宣传部长德·谢皮洛夫因吹捧沃兹涅先斯基《卫国战争时期苏联的经济》一书（斯大林曾肯定此书并授以斯大林奖金）而受到谴责的决议也不为世人所知。《布尔什维

① 米高扬，《纪念内务人民委员部—契卡成立二十周年》，载1937年12月21日《真理报》。

② 《新志》，纽约，1949年第21期第249—250页。

克》杂志主编费道谢耶夫（日丹诺夫分子）被撤职，货真价实的马林科夫分子格·亚历山德洛夫和约弗楚克也因缺乏足够的警惕性被赶出编辑部。新编辑部由马林科夫的忠实门徒阿巴林（主编）、列·伊里切夫、克鲁热科夫、格里哥梁、布尔科夫、米亚斯尼科夫等人组成。直到1952年12月末，中央委员会内部的新斗争达到白热化，苏斯洛夫在他那篇对“软弱无能的”日丹诺夫分子大张挞伐的文章中才透露了这一决议。

1949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三月全会以后，全党才意识到上层正在进行大清洗，发现首批遭殃的全是列宁格勒的日丹诺夫的支持者。为维持徒有其表的合法性，全会似乎按照工作程序，宣布自1949年3月5日解除沃兹涅先斯基的职务。他的战友也同时被解除了职务。

柯西金原是日丹诺夫分子，由于他出卖了多年的庇护者转向马林科夫，不但留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在那次会议上还被任命为苏联轻工业部长。全会对库兹涅佐夫只字未提，因此无人料到库兹涅佐夫（曾短期担任过列宁格勒执委会主席）、波普科夫、罗吉昂诺夫正在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的地下室遭受轮番拷打。沃兹涅先斯基被软禁在家，由于他继续撰写《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使斯大林大为恼火。为欺骗全党和社会舆论，对被撤职的人仍然称呼“同志”，似乎一切和往常一样，未发生任何事情。在1949年1月22日纪念列宁的晚会上，人们最后一次见到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同政

治局委员们坐在一起。斯大林的罪行被揭发后，大家才知道沃兹涅先斯基于9月30日被处决，库兹涅佐夫等人也于1950年10月1日被处决。

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搞掉日丹诺夫及其门徒以后仍不放心，为了确保他们在斯大林面前的垄断地位，还需要打击日丹诺夫的老同盟者，换句话说，要把斯大林身边所有的“老近卫军”（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安德列耶夫）都搞掉。须知，多亏这些“老近卫军”——列宁亲手培育的学生、斯大林的多年战友，斯大林才得以在权力之争中顺利登上个人独裁的宝座。他们对斯大林绝对忠诚，斯大林对他们的信赖也从未动摇过。

乍一看，似乎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在干一桩毫无希望的蠢事，但他们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何况他们在运用“斯大林的辩证法”技巧方面已经达到娴熟的程度。他们很快就使斯大林产生了一种不该有的想法：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安德列耶夫可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阴谋反对他的工具，甚至可能是英美间谍。

斯大林有他自己的思维方式并且非常合乎逻辑——如果他为同自己的对手（例如与邵勉）做斗争而帮助过沙皇警察，列宁为推翻沙皇俄国曾接受过德国密探的钱，那末为什么列宁和斯大林的学生们现在不能干出同样的事情来呢！

斯大林的疑心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人为地制造了洛佐夫斯基、米赫尔斯等人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事件"。莫洛托夫、安德列耶夫的妻子、加里宁的遗孀因是犹太人而被捕。政治局其他委员的妻子因是莫洛托娃（波利娜·捷姆丘任娜）的友人而受到国家安全部的传讯。只有"两个霸王"——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的妻子未受到怀疑，尽管她们也一直是莫洛托娃的挚友。

他们开始对那些被捕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逼供用刑，要他(她)们"坦白交代"在战争期间成立的"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怎样根据美国间谍的指示与莫洛托夫、米高扬取得联系，企图在苏联发动反斯大林的政变。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强迫被捕者做这种荒诞无稽的"交代"，因为他们完全摸透了，主宰一切的独裁者有一个弱点：精心编造的关于有人要搞阴谋的谎言，总会使多疑的斯大林相信不疑。斯大林甚至怀疑象家犬一样效忠于他的伏罗希洛夫是英国间谍，并在他的住所安放了窃听器。

与此同时，苏斯洛夫的宣传机器开始制造关于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神话，说他们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体质上都是"列宁的学生"，似乎与政治局老委员一起，在列宁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过（列宁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两个人）。

令人惊奇的，与其说这是厚颜无耻地伪造历史，不如说是斯大林"宽容异教"的行为。他竟然允许自己的

学生不把他放在眼里，挑衅性地提到列宁。

尽管如此，在贝利亚和马林科夫五十诞辰时，苏共中央的贺词还是把新神话正式提到党的结论的高度："拉甫连季·巴甫洛维奇·贝利亚同志：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向您——列宁的忠实学生、斯大林同志的战友、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杰出活动家致以热烈祝贺……"；① "格奥尔吉·马克西密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同志：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向您——列宁的忠实学生、斯大林的战友致以热烈祝贺。"②

在布尔什维克的政权下，既没有永恒的事物，也没有偶然产生的现象。党和警察机构有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理论：既然斯大林的未来继承人将要跨过莫洛托夫和"老近卫军"登上王位，那末党和人民就应当知道，他们不是伪季米特里，不是"图希诺的盗贼"，而是列宁的合法继承人。尽管他们已经把斯大林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神，并凌驾于列宁之上，但仍借用列宁名义进行统治。

被称做"斯大林的战友"的意义，大大超过这个概念的本义：在斯大林身旁远比在列宁身旁能学到更多的统治本领。

饶有风趣的是，清除日丹诺夫分子未能导致为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的军界朋友恢复名誉：朱可夫和二次大战

---

① 《真理报》1949年8月29日。

② 《真理报》1952年1月8日。

中的主要军事首长——海军上将尤马谢夫、空军元帅维尔希宁、装甲兵元帅波格达诺夫、炮兵元帅沃罗诺夫，或在外地，或居闲职。空军司令诺维科夫元帅甚至因他的下级瓦西利·斯大林将军——斯大林的儿子的告密而被判罪。在军界头面人物中，除日丹诺夫的走卒希金（被免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由热托夫接任）外，没有人受害。在斯大林生前被“流放的”军人仍然杳无音信。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斯大林甚至对在中央工作过的人也加强了警察监视（军人都知道这种监视（战时也是这样），而且他们对此也没表示过愤慨。什捷缅克大将关于他和铁木辛哥元帅的对话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他曾在铁木辛哥的司令部任职。铁木辛哥说：“现在我才知道你不是我认为的那种人。”什捷缅克说：“您认为我是哪种人？”铁木辛哥说：“我过去以为你是斯大林安置在我身边的人。”①）。

斯大林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十分明智的。他有意让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同“老近卫军”相对抗，为此还让他们掌握党的机关和宣传部门。但是他深谋远虑，没有把控制军队和警察的大权交给他们。在党的机关里是一些饶舌者，在军队和警察局里却是掌握实权的人。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可以指挥饶舌者，但现政权的执政者一向由斯大林亲自驾驭。

---

① 什捷缅科《战时的总参谋部》，军事出版社，1968年出版，第277页。

到了后来，人们才看清斯大林另有考虑。他想重演他那众所周知的故技，即借次要敌人之手消灭首要敌人，然后再借助"被提拔上来的人"消灭次要敌人。斯大林说过，"为在政治上不犯错误，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

斯大林不忘过去。他翻阅"老近卫军"的档案，把他们直接和虚构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事件"联系起来（因为其夫人是犹太人）。这个事件是1948年—1952年8月间在极端保密情况下审理的，时间之长，非同一般。

据赫鲁晓夫说，事件是由一项普通建议引起的：以米赫尔斯（苏联人民演员）为首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直属苏联情报局）建议苏联政府在克里米亚建立一个犹太苏维埃自治共和国。斯大林断定，这是使克里米亚脱离苏联，并把它置于美国控制之下的一种企图。①

为避免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斯大林认为，与其逮捕米赫尔斯，不如制造车祸把他干掉（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1922年在梯比利斯曾用这种办法干掉了卡莫；1934年在列宁格勒用同样办法干掉了基洛夫的警卫员）。后来，米赫尔斯在明斯克近郊的公路上丧命。据赫鲁晓夫说，斯大林准备给前外长李维诺夫安排同样的命运：在李维诺夫去莫斯科近郊的别墅途中很容易把他搞死。②

---

①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275—276页。

②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275—276页。

1952年8月10日，中央委员、苏联副外长、苏联情报局主席洛佐夫斯基和二十位文艺界知名的犹太人活动家被处决，莫洛托夫的妻子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犹太复国主义者事件”就这样结束了。

赫鲁晓夫讲了许多有关斯大林排犹的事。托洛茨基也讲过这方面的事例。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还在书中写过这个问题。不过斯大林的排犹主义和希特勒不同，不是出自兽性，而是完全出自实用主义。爱因斯坦如果生在斯大林帝国，他就不可能在美国（是希特勒放他去的），而在斯大林那里发明原子弹（在这之后，斯大林很可能消灭他）。

与“犹太复国主义者事件”直接有关的事还有：1949年3月，莫洛托夫被解除苏联外长职务，米高扬被解除苏联贸易部长职务。与此事件毫无牵连的政治局委员布尔加宁也被解除了苏联武装力量部长的职务（他的后任是平庸无能、盲目效忠斯大林的军界官僚华西列夫斯基元帅）。1946年被任命为国家安全部长的亚美尼亚人阿巴库莫夫（阿尔马维尔市人，贝利亚的门徒）继续留任，看来是想利用他反对贝利亚；加之，阿巴库莫夫处理“列宁格勒事件”时干得很出色。日丹诺夫分子被清除后，中央机关进来一批新人，如波诺马林科、帕托利切夫、安德里亚诺夫、切斯诺科夫。

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解除一批人的职务，这不能不使布尔加宁产生恐惧，他不怕丢官，就怕丧命。在那些日

子里，布尔加宁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当你去见斯大林的时候，你不知道他会把你打发到哪里去，去监狱还是回家。"可是这种情况对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却有好处：一向中立的布尔加宁，后来被他的朋友赫鲁晓夫拉进了他们的圈子。

不久，赫鲁晓夫也激怒了斯大林。赫鲁晓夫自封为农业专家，时常就这些问题写些文章，发表些谈话。1950年4月25日《真理报》登载他的一篇题为《关于进一步从组织上巩固集体农庄的一些问题》的文章，他在文中提出了许多有关改善集体农庄的工作和提高庄员生活水平的重大新建议。这就是说，赫鲁晓夫在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支持下，竟然闯进了斯大林个人管辖的禁区。

这篇文章发表后平安无事。一年之后（1951年3月4日），赫鲁晓夫又重提旧话，说什么需要"扩大集体农庄"，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农业城"。他用"莫斯科市委书记和中央书记"名义发表文章，这次斯大林狠狠地训斥了赫鲁晓夫。1951年3月5日《真理报》第一版，在关于集体农庄工作的"社论"下面有这样一段话："编辑部更正：因编辑部工作疏忽，昨日《真理报》发表尼·谢·赫鲁晓夫同志的文章《关于集体农庄的建设和整顿》时，漏登了编辑部所加的注，其内容是：尼·谢·赫鲁晓夫同志的文章仅供讨论。特此更正。"

《真理报》竟然有权给政治局委员的文章加注，并且宣布仅供讨论！

赫鲁晓夫十分清楚斯大林公开加“注”意味着什么！这件事把他进一步推入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怀抱。

如果说清除党内的“人民敌人”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甚至禁止政治局委员向任何人透露他们的妻子被捕的事），那末在学者和作家中间清除思想上的危害分子则是公开进行的。在苏斯洛夫的直接指导下，不仅在文学、艺术和哲学领域继续进行日丹诺夫发起的“揭发”，而且不断扩大“战区”。一系列新的“讨论”开始了（其实参加讨论的只有一方——对虚构的危害分子进行抨击的党的正统派），讨论很快发展成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进行清洗：在生理学方面反对巴甫洛夫院士的学生；在语言学方面反对马尔院士的学生；在遗传学方面反对招摇撞骗分子李森科的敌人；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反对沃兹涅先斯基的支持者。

斯大林决定亲自参加其中两项讨论：语言学和政治经济学问题的讨论。当他在世时，把他的科学贡献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顶峰，其实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在政治上是凶多吉少的。

首先，“讨论”的方法可说是独出心裁。《真理报》编辑部委托意识形态部门的一个工作人员发表一篇文章，鞭挞几位迄今被党组织肯定的著名科学权威，随后又给后者为自己的立场做辩护的权利。他们没有料到这里会有什么圈套，十分热心地参加了讨论。可是不久，各种谴责劈头盖脑而来，所使用的语言与其说是学术辩

论，不如说更象检察官的控词。每次讨论都是以受谴责者向《真理报》编辑部呈交声明，表示认错和悔改，承认他们一直在罪恶地“伪造”马克思主义而告终。

斯大林参加“讨论”的政治意义那时还未被人们看清，只是到了后来，根据发生的事件才逐渐弄清了他的真实意图。他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谈谈他参加讨论语言学的问题。斯大林显然走进了他完全外行的领域。除了俄语，他只会格鲁吉亚语。在学校学过希腊语，后来还自学过德语，可是都没有学好。因为，斯大林无论怎样也不能利用比较语言学（“印欧系语言学”）观点反对马尔院士的雅弗语学说（斯大林熟练掌握了俄语政论语体，因此把他讲话时带有浓重的格鲁吉亚口音看成是缺乏文学素养，纯是幼稚的；认为他的《列宁主义基础》是出自别人之笔，更是毫无根据的推测），而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语言学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上。并不象当年许多文章所说的那样，他把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提高到了一个“崭新阶段”。他的讲话和文章的用词，陈旧、老一套，充分表现出他这个昔日宗教学校的学生按教义问答来解释圣经条文的风格。斯大林的《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问题》一文（载《真理报》1950年6月20日）通篇是老生常谈，其锋芒是指向马尔院士及其语言学派的。

斯大林本人对“语言学的贡献”可概括为以下一些

陈词旧调：语言“对社会是统一的、共同的，它同样地为社会一切成员服务”、“语言是工具，人们利用它来彼此交际”、“社会以外是没有语言的”、“词汇越丰富、越多方面，语言也就越丰富、越发达”、“语法规定词的变化规则、用词造句的规则”①。可是，文章也出现了马克思主义闻所未闻的荒诞离奇的观点。

马克斯、恩格斯、列宁都毫不含糊地认为语言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在各种教科书和参考书中都是这样写的。马尔也持这种观点。可是现在，斯大林宣称，语言既不属于“上层建筑，也不属于基础”；“语言既不能列入基础一类，也不能列入上层建筑一类。语言也不能列入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中间现象’一类，因为这种‘中间现象’是不存在的”。②

那末，“语言”是什么呢？是工具吗？它也不是工具。因为斯大林说：“生产工具，生产物质资料，而语言则什么也不生产，或者只是生产‘词’而已。……假如语言能够生产物质资料，那末夸夸其谈的人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富的人了。”③

斯大林为什么发动了这场“学术”讨论呢？在斯大林的战略中从来没有偶然发生的事情：他发出了在知识分子中间掀起新的大清洗浪潮的信号，并选定语言学界

① 《真理报》1950年6月26日。

② 《真理报》，1950年7月4日。

③ 《真理报》，1950年7月4日。

做为第一块试验田。

在总结讨论时，斯大林做了一个声明，如果别人做这样的声明，那末不管他是谁，斯大林一定会把他宣布为“科学中列宁主义党性”的敌人。他在声明中说：“谁都承认，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没有批评的自由，任何科学都不可能发展，不可能有成就。”①

斯大林写道：“这次讨论发现了在中央和各共和国的语言学机关中，有一种为科学……所不应有的制度统治着。……讨论所以非常有益，首先是因为它揭露了这种军阀式的统治制度，并且把它打得粉碎。”②

斯大林竟然批评起“军阀式的统治制度”来，这真是天下少有的新鲜事！

苏联科学院所属的马尔院士语言和思维研究所立即被关闭了，几乎它的全体成员（包括各共和国的分所在内）都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因为斯大林的“贡献”被宣布为一切科学的共同纲领，所以在科学院所属的其他各研究所也都展开了清洗，使用的手段和语言所一模一样：在巴甫洛夫生理学研究所、进化生理学和高级神经活动病理学研究所，以科学院士奥尔别利和斯彼兰斯基为首的领导人，或被驱逐，或被流放。自1948年在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法学研究所、哲学研究所进行的清洗，这时变得更加残酷无

① 《真理报》，1950年7月4日。

② 同上。

情了。甚至连遭三次洗劫的苏联农业科学院还不断有成批的人遭到诬陷（当时人们向该院狂妄自负的院长李森科院士问道，为什么西方的全部遗传学都是谎言，而他的每句外行话都是真理，谁给了他永不犯错误的特权？李森科竟然大言不惭地说："我回答你们：党中央审阅过，并且批准了我的报告。"①）。

然而对斯大林说来，最有趣也是最不幸的，却是关于经济学的讨论。

① 李森科《农业生物学》，1949年出版，第645页。

第七章

对贝利亚世袭领地的冲击

按血统和语言而言，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但是人们不能说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斯大林的儿子小瓦夏曾告诉他的妹妹斯维特兰娜一个不寻常的新闻，对斯大林的民族属性做了一个极好的说明："你可知道，咱们父亲从前是格鲁吉亚人！"斯大林不做格鲁吉亚人以后依旧有着一种非俄罗斯族人的自卑感，尽管他在民族问题上也装模作样地用超俄罗斯的说教竭力去克服这种自卑感。因此，当斯大林于1922年刚刚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便发生了上述斯大林制造的第一起"格鲁吉亚案件"。

他在格鲁吉亚一刻不停地搜寻尚未被粉碎的民族主义残余分子。格鲁吉亚的所有贵族、孟什维克和"民族主义分子"早已从肉体上被消灭殆尽（除流亡到国外的人），现在斯大林又开始在年轻的共产党员领导干部中寻找"民族主义分子"。他们都是另一个格鲁吉亚人贝利亚的门徒和走卒。这样做也是为将来与贝利亚摊牌积

累材料。

多亏贝利亚异常机警，至今还没有发生这件事。每当斯大林准备在格鲁吉亚进行新的清洗，贝利亚都抢先一步搞起来。他没有触动的人只有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忠实的克·恰科维阿尼。贝利亚撤掉了他的一批门徒，换上了更忠于他的另一批门徒，拯救了他的忠实走卒恰科维阿尼。当斯大林查问现在什么人在格鲁吉亚掌权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

1949年的领导班子也是这样组成的，其成员都是历次清洗的幸存者。共和国和各州的大多数领导人都是贝利亚从自己的同乡明格列尔人中挑选出来的，这是维持领导干部稳定的保证。与此同时，周期性的清洗——其主要受害者是格鲁吉亚的知识分子，也已告一段落。在各重要岗位上，贝利亚都安插上他绝对信任的人：不是他身边的契卡分子，就是他的朋友。关于这些人的情况，莫斯科和格鲁吉亚都知道得很少。不仅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书记，各州、市、区的书记也都是这样任命的。

据说有一次，贝利亚把一份中央委员会书记名单（格鲁吉亚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呈报中央组织局审批，斯大林挖苦地问道："他们都是党员吗？"在这种十分挖苦的语气里暗含着斯大林对多年来忠心耿耿的贝利亚的初次指责。贝利亚很了解斯大林，他知道这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发生恶化的凶兆。

事态进一步发展表明，斯大林认为贝利亚在格鲁吉

亚的所作所为对他不忠。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总是要翻阅档案的。他翻出贝利亚的旧“档案”来（斯大林虽然把一些人当做自己的“战友”和“学生”，但他从来不把中央档案馆里有损于他们名誉的材料销毁）。那里不仅保存着我们已经提到过的令人感兴趣的材料，而且收藏有斯·阿利卢耶娃讲到过的材料。

“他（指贝利亚）获得了我父亲的信任，在他的支持下很快地爬上了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书记的高位，而且名次排在前面。外高加索的老布尔什维克奥·沙图诺夫斯卡娅告诉我，格鲁吉亚的全体党员对这项任命都感到十分震惊，奥尔忠尼启则坚决反对……。她告诉我，内战时期，贝利亚在高加索的表现是很不光彩的。他生来是个奸细，在政权不断易手的时候，他作为一个侦探，时而为达什那克分子效劳，时而为红军服务。沙图诺夫斯卡娅证实，一次我们部队逮捕了贝利亚。他是在搞背叛活动时当场被捕的。他坐在那儿等待惩罚。基洛夫（当时他在指挥外高加索的战役）来电要求枪决这个叛徒。还未来得及执行，开始了军事行动，大家都顾不上这个微不足道的人了。但是外高加索的老布尔什维克都知道有过这么一个电报；贝利亚本人也知道。”①

由于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的支持，中央批准了贝利亚呈报的新的人事任命，而且派他去出席格鲁吉亚中央全会宣布这一任命。贝利亚现在才清楚，无论格鲁吉亚

① 《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130—131页。

发生什么麻烦事，他个人都得对斯大林负责。他想尽一切办法再一次把格鲁吉亚搞成斯大林眼中的“模范共和国”。（这是毫无希望的，因为斯大林对贝利亚的新走卒的“党性”已经产生了怀疑。）

贝利亚虽然了解斯大林的内心世界（或冷酷心肠），但他还是犯下了一个对他不可饶恕的心理错误：格鲁吉亚新领导人搞起“对贝利亚的崇拜”。须知，那时只有斯大林一人是大家崇拜的对象。

格鲁吉亚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1949年1月）是在崇拜贝利亚的气氛中召开的。大会期间，格鲁吉亚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东方曙光》两次（1月27日和29日）提醒格鲁吉亚人民，他们不是有一个而是有两个“父亲”：贝利亚和斯大林。斯大林离得远，而贝利亚本人或者他的门徒经常呆在格鲁吉亚，“关心”格鲁吉亚共和国的繁荣。可是，那些拍马屁的人为贝利亚大唱赞歌，显然搞得太过分了，结果反而帮了倒忙。

在中央委员会选举期间，这种情况表现得尤为突出。新领导人提议斯大林和贝利亚做中央委员会名誉委员候选人，可是不记名投票“一致”选出的却只有贝利亚一人，许多人未投斯大林的票。当时的情况很令人尴尬，监票委员会为摆脱窘境只公布斯大林和贝利亚当选为中央委员，而略去了通常使用的“一致”这个词。

贝利亚门徒们的这种前所未闻的放肆行为，甚至在《真理报》（1949年1月30日）关于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

党代会的报道中也有反映，令人注目。据巴库报道，当监票委员会宣布约·维·斯大林被一致选举为阿塞拜疆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委员时，场内响起欢呼声。旁边还刊登一条梯比利斯报道："监票委员会宣布约·维·斯大林同志当选为格鲁吉亚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委员时，代表们热烈欢呼。拉·巴·贝利亚也当选为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委员。""一致"一词既然没用于斯大林，也就不能用于贝利亚。那些深知中央委员会记录员办事精密、《真理报》工作人员都是教条主义者的人，都会发现这两则报道是对贝利亚和格鲁吉亚共产党的公开斥责。

所有这些情况，斯大林当然一清二楚，但是他表现出具有惊人的耐性。他认真地记下了每件事，听其自然地发展。有时他引导事件朝着有利于自己并把潜在敌人置于死地的方向发展。与人们对他的看法相反，斯大林允许他的工作人员用事实驳倒他对他们的批评意见。他不相信任何发誓，相反，发誓反而会引起他的不信任。他对人们，甚至对最亲近的人的信任系数都等于零，如果他在他们的行动中没有发现对自己直接有什么好处的话。斯大林也没有发现贝利亚在格鲁吉亚的所作所为给他什么好处，因而决定亲自抓格鲁吉亚的新清洗。他抛开贝利亚自己搞，因为这次清洗是针对贝利亚的。这就是斯大林制造的最后一次"格鲁吉亚案件"的缘起。

斯大林十分清楚，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不宜参

加这次战役。据赫鲁晓夫说，阿巴库莫夫把斯大林采取的任何措施、甚至他的直接指示，都首先讲给贝利亚。显然，他可能向贝利亚泄露斯大林的全部计划。斯大林用他的老党务干部斯·德·伊格纳提夫取代阿巴库莫夫，并授予全权，派他带领一批契卡人员去格鲁吉亚逮捕贝利亚的全部同伙。这些人有的担任共和国领导，有的在州里，有的甚至在与土耳其相毗邻的地区。

在格鲁吉亚进行的这次新清洗，到1951年11月，竟然超过了1937—38年的"大清洗"。四百二十七名党的州、市和区委会书记被做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撤职和逮捕（据1953年1月30日《真理报》报道的数字）。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政府的全体领导成员几乎无一幸免，都遭逮捕：中央书记巴拉米亚、江巴里泽、沙杜利亚、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高古阿、共和国总检察长热尼阿、司法部长拉巴瓦、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佐捷拉瓦。格鲁吉亚中央局十一人中有七人被捕。恰科维阿尼免遭被捕，因为他及时背叛贝利亚，投靠了斯大林派来搞清洗并取代他担任中央第一书记的阿·穆杰拉泽和格鲁吉亚国家安全部长鲁哈泽将军。

在这起"案件"中，不仅逮捕了贝利亚在格鲁吉亚的朋友，还逮捕了明格列尔地区党的全体积极分子。所以，在党的文献中，这起"案件"也称做"明格列尔案件"。

在一般党员和非党员中，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间也进行了大逮捕。究竟有多少人死于非命，很难查明。赫

鲁晓夫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说："数以千计的无辜的人成了刚愎自用和破坏法制的牺牲品。"

在党内进行这次清洗之后不到一年所召开的共和国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1952年9月），赞同逮捕自己的中央领导人，承认各市委、阿德热尔州委和明格列尔区的工作"不能令人满意"。这次代表大会不同于历次大会，不仅没有颂扬贝利亚，连他的名字也成了禁忌。

穆杰拉泽的报告含糊其辞地提到"原领导人犯了严重错误"以及格鲁吉亚作家在创作中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观点"，却只字未提为什么人们一犯"错误"就成批地遭到逮捕，不经审讯就被处决。

这次代表大会"一致"选举斯大林（没有贝利亚）为格鲁吉亚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他受到"全体代表经久不息的热烈欢呼"①，批准任命阿·穆杰拉泽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原任阿布哈兹州委书记），维·茨霍夫列巴什维列为第二书记，维·布热阿什维列为第三书记，兹·盖茨霍维列为部长会议主席。其实，格鲁吉亚的实际主人是中央局委员、格鲁吉亚国家安全部长鲁哈泽将军。

仿三十年代的作法，格鲁吉亚国家安全部成立了"三人非常小组"（其组成是：主席鲁哈泽，成员——中央第一书记穆杰拉泽和共和国总检察长），它有权缺席判处死刑或二十年徒刑。"三人小组"判处了数以千计的

① 《真理报》，1952年9月20日。

人，可是清洗并没有到此止步，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更重要的阶段，其任务是解决贝利亚本人的命运。

鲁哈泽和特派到这里工作的斯大林私人警察将军们，需要从政治上控告原中央领导人，企图建立“格鲁吉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革命中心”。按着导演们的想法，这个“中心”同流亡国外的平等党党员以及格鲁吉亚民族主义分子互相勾结，想使格鲁吉亚脱离苏联，并入土耳其。

斯大林为什么需要编造格鲁吉亚想并入土耳其的荒诞神话呢？格鲁吉亚和土耳其世代相仇，为摆脱土耳其的奴役，格鲁吉亚才在1801年自愿加入俄罗斯帝国。斯大林为什么需要编造格鲁吉亚民族主义分子和阿塞拜疆平等党党员结成同盟呢？无论在革命时期的高加索，或在革命流亡时期，他们都未结过同盟。

斯大林有一句口头禅：“无风不起浪”。这次斯大林决定自己刮起这股“风”，是有充分根据的：贝利亚于1918年在巴库平等党特务机关接受了间谍“洗礼”。洞察一切的斯大林已经获悉，而贝利亚还以为他不知道这件事：招募贝利亚参加平等党特务机关的人，现居住在土耳其，仍在领导平等党的活动。

斯大林还掌握贝利亚的最大隐秘：平等党领导人所以逃到土耳其，就是因为格鲁吉亚国家安全部长贝利亚非法地放他越过了格鲁吉亚—土耳其边界线。

后来发生的一件新的“怪事”，使斯大林所掌握的

贝利亚的“一系列罪证”更加充实了：贝利亚的“平等党”朋友们确实同格鲁吉亚侨民就建立“墨尼黑苏联问题研究所”问题建立了联系。克里姆林宫认为它是中央情报局反对苏联、进行政治破坏活动的分支机构。

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谈到这个“案件”，他不愿意而且不可能做一个十分坦率的人，否则他势必要说斯大林制造这起案件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消灭贝利亚。然而根据赫鲁晓夫对这起“案件”的下述说法，人们还会自然得出这种结论。

“所谓格鲁吉亚平等党民族主义组织的案件是非常典型的……众所周知，苏共中央于1951年11月和1952年3月曾就此案件做过决议。事先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是斯大林个人指使搞的。在这两个决议中，对许多忠诚的共产党员进行了严厉指控。当时根据伪造的文件，说格鲁吉亚存在一个民族主义组织，其宗旨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援助下推翻该共和国的苏维埃政权。因此在格鲁吉亚逮捕了党和苏维埃的许多工作人员。后来查明，这完全是诽谤……其实，格鲁吉亚不存在任何民族主义组织。数以千计的无辜的人成了刚愎自用和破坏法制的牺牲品。这一切都是在格鲁吉亚人民称颂的‘天才的’领导人斯大林、‘格鲁吉亚人民的慈父’领导下发生的。”①

后来赫鲁晓夫还是承认：“我感觉到斯大林害怕贝

---

① 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秘密会议上的报告，第42——43页。

利亚，这种感觉在斯大林编造明格列尔案件时，得到了证实。我绝对相信，这起案件是为了除掉贝利亚而虚构出来的，贝利亚自己是一个明格列尔人。”①

另一件事也可证明这个“案件”是针对贝利亚的：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还在举行葬礼以前，以贝利亚的老走卒杰卡诺佐夫（曾任外交部副部长）为首的一批契卡分子就来到梯比利斯，搞起了新逮捕。

这一次，十一名中央局委员中有八人被捕，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穆杰拉泽（梅茨胡拉瓦接任）、部长会议主席盖茨霍维列、国家安全部长鲁哈泽将军等都在其内，甚至连原中央书记恰科维阿尼也未能幸免（可能因为他背叛了贝利亚）。被捕的还有那些参与制造反对贝利亚案件的几十名负责官员。与此同时，从监狱中释放了那些幸存下来的原中央和政府的领导人。

四月，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举行会议，批准任命新政府的成员。部长会议新主席巴赫拉泽说：

“我敢保证，这里提出的各部领导人的候选人都是我们强大的共产党的党员（这是对斯大林提出的问题所做的过迟回答吗？——作者）。他们是格鲁吉亚的党组织培育的。格鲁吉亚的优秀儿子、伟大苏维埃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拉甫连季·巴甫洛维奇·贝利亚多年来领导过格鲁吉亚的党组织。”②（经久不息的掌声）

---

① 《赫鲁晓夫回忆录》，336页。

② 《东方曙光报》，1953年4月15日。

斯大林制造最后一起“格鲁吉亚案件”时，显然低估了贝利亚的特殊品质：没有止境的权欲、无以复加的伪善行为和凶手般的残忍。在这些方面，他完全可以同斯大林争相媲美。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就此写道：

“我认为，贝利亚的为人更狡猾，更背信弃义，更奸诈，更厚颜无耻，更死不回头，更顽固，也就说胜父亲一筹……”①

这种看法当然会引起强烈反对，但它包含着许多真理。斯大林异常狡猾，超过了他的前人和所有战友。唯有贝利亚超过了斯大林。在以后各章，我们还会讲到这种情况。

“格鲁吉亚案件”以后，贝利亚已十分清楚，斯大林给他安排了与明仁斯基、雅戈达、叶若夫同样的命运。斯大林很有天才，但到了垂暮之年，那罪恶的头脑也变得迟钝不灵了。他重复使用三十年代已过时的惩罚手段，而这些已被贝利亚完全摸透，甚至有的就是他本人提供的。赫拉克力士② 早已知道，不能两次进入同一条河。可是，斯大林却想证明这是可以的。

---

① 《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130页。

② 希腊神话中一个力气非凡的英雄。——译注

第八章

政治局同斯大林的分歧

战后时期管理國家的斯大林，如果说得形象些，就象驾驶一只破船的舵手，在狂风暴雨的海面轻率地把船驶向惊涛骇浪。船上的乘客——中央委员们，时而不停地抽出船底的积水，时而绝望地在左右舷之间跑来跑去，以便保持船的平衡。可是铁石心肠的舵手为保持平衡，却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抛出船外。

在近三年来发生的“列宁格勒事件”、“犹太复国主义者事件”、“格鲁吉亚事件”和前不久发生的“莫斯科事件”中究竟有多少人被抛出了船外呢？按斯大林的本意，船上的幸存者很可能都被列入了“莫斯科事件”。

舵手第一批应把哪些人抛出去，对乘客来说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都十分清楚，只要这位舵手掌舵，每个乘客迟早都要遭到同样的命运。而更为重要的是，现在贝利亚和马林科夫也感到岌岌可危了。

他们反对斯大林“老近卫军”的最新行动所射出的

毒箭，固然伤害了“老近卫军”，但飞来毒器也击伤了投掷手本人。第一，“老近卫军”采取了报复行动，告发了告密者；第二，斯大林已得出一条结论，即在当时情况下，最好消灭所有的人：按二十年代的做法，既消灭“老近卫军”，也消灭“青年近卫军”。

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练就一身揣测斯大林心思的功夫，猜出了他的全部战略计划。这时发生一件完全出乎斯大林意料之外的事：根据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倡议，政治局委员们为了自救而达成妥协，共同反对斯大林。例如政治局决定召开中央八月全会（1952年），并在这次全会上决定召开党代表大会，就是他们共同策划的。

按现行党章规定，党代表大会至少每三年召开一次。最后一次党代表大会是在战前的1939年3月召开的。斯大林情愿按期举行假议会苏维埃选举，也不愿意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因而放过了四次召开党代表大会的时机。在这期间，苏联进行了伟大的卫国战争，采取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关于国内和国外问题的决策。按规定，只有党代表大会才有权做出这些决策，可是斯大林根本不想召开党代表大会。不仅如此，战前的中央委员会已有五年之久未举行过全体会议（党章规定每三个月举行一次）。在战争时期，他们在前方和后方的政治机构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斯大林惧怕他的“学生们”按党章规定合法地剥夺他一人独揽的大权，除此之外，就难以找到不举行党代

表大会的其他原因。斯大林的忧虑并非毫无根据。

“列宁格勒事件”以后，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的影响不断扩大，斯大林开始失去了他对党的机构和警察的绝对控制。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第一卷）中关于召开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经过情况的描述（如果是真实的），是对事实的讽刺，而且从党和警察机构发挥的职能作用上看，可说是一种无知的讽刺。

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曾抱怨斯大林不召开党代表大会，可是现在又说什么斯大林把政治局委员叫到身边，提议召开党代表大会，但是他没有讲大会的日程。过了片刻，斯大林又说马林科夫、赫鲁晓夫、萨布洛夫要做报告。政治局委员们听后仍未讨论日程。

在既定的第二次“大清洗”没有进行以前，斯大林不想召开党代表大会，这是肯定无疑的（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就是在第一次“大清洗”之后于1939年召开的）。所以，他不可能提议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此外，赫鲁晓夫说什么政治局没有逐字逐句讨论过，也没有批准过拟向代表大会提出的报告草稿，更属荒谬（党代表大会开幕前数周，《真理报》曾发表赫鲁晓夫关于党章的报告，萨布洛夫关于五年计划的报告，供在报纸上和党的代表会议上讨论。这就证明上述说法是虚假的）。

当然，关于召开党代表大会的通告和大会日程，历来只有经中央总书记斯大林签署后才能发表。最使人感到震惊的、史无前例的一件事是，在斯大林掌权时期，

政治报告人破天荒第一次不是斯大林本人而是马林科夫。

这件事立即使人们迷惑不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莫非斯大林病了？或者斯大林有意把他挑选的“太子”推举为中央委员会的主要政治报告人？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两种猜测都是错误的。斯大林当时身体健康，他撰写了不少“讨论”文章，出席了代表大会，甚至在闭幕式上发表了简短的演说（未涉及代表大会本身的工作，他向各国共产党发出了呼吁。在以下几章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事的意义）。斯大林没有选定任何人做“太子”，他十分清楚这样做可能带来的全部危险。

还有两种猜测：一说斯大林拒绝在违反他的意志情况下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做报告；二说政治局因不同意斯大林提出的许多建议和措施，才决定委托马林科夫做报告、莫洛托夫致开幕词、伏罗希洛夫致闭幕词。

党的利益迫使失宠的赫鲁晓夫固守某些刻板公式，用谎言来掩盖部分真象。他要我们相信，斯大林曾委托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在会上致词，但他自己打了自己一记耳光。

其实，根据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正式发言，我们知道，在“十九大”第一次全会上，斯大林曾指控莫洛托夫给美国、伏罗希洛夫给英国做谍报工作。他们的妻子因同样原因被关在卢边卡监狱的地下室里。

根据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各种资料，我们知道，这

次代表大会是莫洛托夫主持隆重开幕、伏罗希洛夫主持隆重闭幕的。按党的传统，这项光荣任务以前是由列宁担任的，可是斯大林改变旧规，另立了新章：让两位德高望重的老政治局委员主持开幕和闭幕。

请问，斯大林怎么会把这种荣誉给予两位准备在代表大会之后指控为间谍的人呢？在斯大林帝国里从来没有过这种怪事。显然，他们致词不是根据斯大林的提名，而是政治局上述“历史性妥协”的产物。其次，同样明显的事实是，以马林科夫—贝利亚为首的党和警察机构拯救了他们，使他们免遭斯大林的迫害。

那些以为斯大林主宰一切、只要“弹一下小指头”就能把全部敌人变成齑粉的人，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斯大林政权是建立在对直接掌握统治机器的当权者的绝对服从之上的。现在他们已不再俯首贴耳，斯大林孑然一身，没有他们能做什么呢？难道他能走上红场去号召人民起来造反吗？

在分析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和中央全会的总结以前，需要再简略回顾一下前不久发生的事。

认为党和国家领导集团在政治上的沉浮只是斯大林分子互相施弄阴谋诡计的结果，或认为斯大林搞的似乎无意义的残酷镇压，只不过由于他的偏执狂，都未免失于天真和幼稚。阴谋家也好，斯大林也好，他们不仅争夺权力，还要控制克里姆林宫的国内外政策。斯大林没有出于凶杀癖而杀过任何人，他既不是虐待狂，也不是

偏执狂。

有人用“人类学”观点，对斯大林的行为做出不正确的评价。他们认为斯大林是人，他有人的一切特性，因而他的一切非人行为都源于精神病。其实，斯大林的一举一动和全部罪行，都有坚定明确的目的性，既符合逻辑，又严守原则。他没有精神病患者反复无常的病态，也不象真正病人伊万雷帝那样，忽而恍惚，忽而清醒，忽而兴奋，忽而忧郁，今天犯下暴行，明天又感到懊悔。斯大林是用惩罚手段实现自己目的的政治家。问题还不止于此。他是集政治学和惩罚艺术于一身的人，并在这方面超过了所有的政治家。斯大林搞残暴行为是一贯的。他十八岁时向宪兵队出卖了梯比利斯神学校的马克思主义小组（他辩解说，这使他们成了革命者）；他二十八岁时，在梯比利斯的埃利温广场利用武装抢劫地方金库的机会搞凶杀；他三十八岁时，在察里津亲自指挥大规模屠杀“白卫军”战俘；他四十八岁时，着手消灭农民；他五十八岁时，指使契卡分子在1937—1938年间消灭了数以万计的无辜的人；他七十岁时，不经审讯就处决了他最亲近的助手十二名中央委员。现在他下决心要对其他人下毒手了。

难道这是赫鲁晓夫所说的怪癖吗？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一切都是有明确目的、有充分理由和有天才预见的行为。如果斯大林能在1952年消灭政治局，说不定他会

多活几年，而在历史上也根本不会出现反斯大林的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

在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前夕，斯大林在许多国内外政策重大问题上已与政治局其他委员完全对立。只要粗略地分析一下争论的问题，就可以看出分歧的深度。

例如，在热核武器出现后形成的世界政治和外交中，斯大林错过了激进革命的机会。斯大林的苏联吹鼓手们曾写道，当杜鲁门在波茨坦会议上把一个划时代的新闻——美国发明了一种威力无比的原子弹武器告诉给斯大林时，斯大林却改变话题，谈起天气来。悲剧就在于这种炸弹没有给斯大林留下深刻印象。

斯大林任命贝利亚为苏联原子能委员会主席，他的任务，或是依靠苏联学者共同的努力制造出原子弹，或是盗窃美英两国的原子弹秘密。可是，即使在苏联制造出原子弹之前，斯大林也没有奉行爱好和平的政策。相反，他故意地、有时是挑衅性地挑起一次又一次的国际严重危机：违反各同盟国协定，在东欧国家加速推行布尔什维克化；企图吞并伊朗阿塞拜疆；向土耳其提出在海峡地区建立军事基地的要求；组织苏联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掀起要求土耳其归还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领土的运动；在希腊组织内战；要求意大利把利比亚交给苏联；封锁柏林；发动朝鲜战争。斯大林在制造这些事件的时候，苏联还不能成批生产原子弹。

可想而知，当贝利亚领导的机构能成批地生产原子

弹时，斯大林将使用什么样的语言讲话！

斯大林与政治局的根本分歧，恰恰表现在和平政策问题上。政治局采取与西方同样的立场，认为在热核武器时代，战争必将导致人类的自我毁灭。因此，政治局重新研究了列宁的下述原理：在帝国主义时代，世界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正如在这些战争的废墟上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世界共产主义革命一样。政治局认为，在原子时代，战争只能是原子战争，它不可能导致革命，因此，必须放弃列宁的这项原理以及根据它制定的对外政策。

政治局还提出另一种论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广大群众争取世界和平的运动，能够制止新的战争。分析党的文件就可发现斯大林与政治局的这一重大分歧。因此，我们需要详细谈谈斯大林在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之前发表的论战文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

斯大林在战后发表的其他著作，都没有象《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那样常被苏联问题专家引用，也唯有这一著作为西方所不理解。这毫不足怪。西方研究者只看到了文章的表面，未看到也未理解其中的底蕴，弄不清《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问世的背景。

在这一著作中，斯大林根本没有探讨什么理论问题，也没有打算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发现什么新的抽象规律，他和中央其他主要领导人就苏联国内外政策的进一步发展等重大问题展开了论战。斯大林和他们

争论的问题，只有这些中央领导人知道，至于苏联人民和党，更不必说西方研究者，当然无从知晓，而且也不可能知晓。

下述情况使问题更难于理解了：正是斯大林的矛头所指向的人，首先称赞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天才的贡献”，以便能在行动上反对这一著作提出的实际结论。

斯大林死后，我们才弄清了这一切。试比较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提出的要求和中央在他死后所采取的实际政策，我们就不难找到所有争论问题的奥秘。

首先分析一下党的文件所规定的方针。下面是斯大林的政治局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一段话：

“全世界亿万群众在问，新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吗？人类已经历过两次流血的世界战争，难道还得经受第三次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项原理认为，只要存在帝国主义，战争就不可避免……但现在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现在已有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拥有重要手段，可以制止帝国主义者发动战争。”①

斯大林反驳说：

“有人说，既然现今已经有强大的人民力量成长起

①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报告速记稿》，1956年版，第一集，第37—38页。

来，它们正在保卫和平，反对新的世界大战，所以列宁关于帝国主义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战争的论点，应该认为是已经过了时的。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要消灭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①斯大林在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未指名的对手（“有人说，……”），恰恰就是他的政治局委员们。

“和平共处”——这是给列宁的战略下的密码定义：要用苏俄的军事力量粉碎资本主义是根本办不到的，需要通过思想和人员的渗透以及不断组织革命破坏活动，从内部摧毁资本主义。因此《苏共纲领》（1961年）写道，和平共处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对斯大林的继承者们应给予应有的评价，在论战中，他们虽然改变了列宁主义的词句，但仍忠于它的精神。斯大林却不是这样。

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在帝国主义阶段，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他毕竟是富有现实感的人，他所做的附带说明又一笔勾销了他提出的结论，即使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却较以前发展得更迅速。

斯大林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论断已经过时，他写道：

“可不可以断言，列宁在1916年春天所提出的大家知道的论点，即资本主义虽然腐朽，但‘整个说来，资

①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第36页。

本主义却较以前发展得更迅速无比’的论点，仍旧有效呢？我认为不可以这样断言。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产生的新条件，（这个）论点都应该认为是已经失效了。”①

照这样说，西方的经济和技术已不能再向前发展，资本主义已经完全腐朽，由此得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给世界资本主义送终的时刻已经到来！不言而喻，政治局中的现实主义者们认为，这是一种最危险的幻想。

在同一著作中，斯大林与政治局不仅就对外政策，也就国内经济问题展开了争论。他写道：

“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取得利润，……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利润，而是人及其需要。”②

由于斯大林对人的这种“关心”，约有半数以上的苏联企业不上缴利润。赫鲁晓夫曾力图用彻头彻尾的“唯意志论”来改变这种情况，结果以失败告终。更为实用主义的柯西金和勃列日涅夫在中央九月全会（1965年）决议中直言不讳地写道：

“改善使用利润、价格、奖金、信贷等极为重要的经济杠杆。”③

政治局的多数委员认为，机器拖拉机站的全部机器应当交给集体农庄，可是斯大林写道：

①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第36页。

② 同上。

③ 《苏共决议》第八卷，1972年，第519页。

谁“建议把机器拖拉机站出售给集体农庄，……就是企图把历史车轮拉向后转。……（这）不是使我们接近共产主义，而是远离共产主义。”①

斯大林之后的领导人取消了机器拖拉机站，并把它的机器交给了集体农庄。

斯大林写道：

“为了把集体农庄所有制（这当然不是全民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必须采取些办法。有些同志以为，干脆把集体农庄财产收归国有，宣布它是全民的财产……这个建议是完全不正确的，是绝对不能采纳的。”②

在斯大林这一著作问世一年，即在他死后半年举行的中央九月全会（1953年）上，决定把集体农庄收归国有。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加速了国有化进程，把数量可观的集体农庄改为国营农场，使之成为“全民”所有制。根据中央三月全会，特别是从未公布的中央五月全会（1965年）的决议，被保留下来的集体农庄，实际上已变成了国家所有制。

斯大林写道：

“……商品流通是和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前途不相容的。……集体农庄生产的剩余品进入市场，从而列入商品流通系统……必须将集体农庄生产的剩

---

①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91页。

② 同上，第87页。

余品从商品流通系统中排除出去，把它们纳入国家工业和集体农庄之间的产品交换系统。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①

赫鲁晓夫领导集团，特别是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彻底地因而也更加有效地证明，问题的“实质”恰恰不在这里，而在于不仅在工业中，而且在农业中扩大和使用商品关系以及其他资本主义范畴（利润、价格、利息、奖金）。

不仅如此。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逐渐进入世界商品流通轨道，开始邀请资本家去苏联，以便向他们借款，利用他们的技术和工艺建设“共产主义”。

不管斯大林在九泉之下对此事如何不满，但是新政策使苏联得到的全是好处。在这方面，斯大林的学生们也比斯大林更象是列宁的信徒。因为列宁这样说过：

“战胜资产阶级是不够的，需要迫使它为我们工作……只有共产党人能够用别人的双手建设这种经济的时候，我们才能管理经济。”②

克里姆林宫的新领导人正是这样做的。

以上我们仅仅谈论了从党的文件中能容易发现的斯大林与政治局的争论问题。此外，还有一些暴露得不够明显的分歧。

---

①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92—93页。

②《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报告速记稿》，1961年出版，第31页。

在国内政治方面，这类分歧有：斯大林曾要求在党、军队和国家机关中进行新的“大清洗”，并仿效格鲁吉亚在各加盟共和国和各自治共和国继续大规模清洗“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的作法。继格鲁吉亚之后，轮到了乌克兰（在1952年6月初举行的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全会上主要讨论了乌克兰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问题）。

在国际政治方面，斯大林与政治局的主要分歧同后来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第一次正式提出的新理论有关，即与根据列宁的思想提出的“和平共处”问题有关。斯大林的学生和战友们认为，根据列宁的学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共处，应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斯大林说，“共处”这一口号实际是美帝国主义的思想家们臆造出来的，其目的在于掩盖他们准备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行径。

其实，斯大林完全同意列宁的观点，他认为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应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至于“共处”，列宁压根不知道这个词。

斯大林的另一个观点对苏联也起了消极的、甚至有害的作用：他错误地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事实上没有任何殖民地人民获得解放，殖民主义仅仅改变了形式而已；至于尼赫鲁、苏加诺之流，都不过是西方帝国雇佣的暴君。

斯大林的战友和学生们认为，这种观点妨碍苏联进

入正在获得解放的殖民地的后方，妨碍把它们置于苏联影响之下，使它们与原宗主国相对抗。在这方面，斯大林的学生们看到了苏联推行的全球扩张主义政策的宏伟远景，看到了苏联进入其他大陆和世界海洋的广阔道路。

斯大林的学生们遵照斯大林全盛时期的教导，认为不但需要而且可能从物资上参加在原殖民地建立特殊形式的统治和新型的社会生活。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谈谈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对某些纯粹的事实进行分析研究，尽管多半都根据记录材料，但有时也会触及到问题的实质。

我们曾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一个“间谍”（莫洛托夫）主持了代表大会的开幕式，另一个“间谍”（伏罗希洛夫）主持了闭幕式。

第二件出乎人们意料的事是，三名政治局委员没有被选入代表大会主席团：米高扬（他的两个当将军的儿子被投入监狱）、安德列耶夫（他的犹太人妻子被关押）、柯西金（受日丹诺夫分子案件牵连）。这种情况与斯大林的一贯作法背道而驰。

还有一件出乎人们意料的事：在“明格列尔事件”之前，贝利亚在政治局委员中的排列名次一直稳居第三位，排在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之后，现在突然降到了第五位（甚至居布尔加宁之后）。10月6日代表大会上午会议的记录是这样记载的，为使全党确信不疑，代表

大会晚上会议的记录又重复了这种排列。

贝利亚采取了报复行动。他在代表大会上发表了最长的演说，不仅长，而且极其尖锐。党的正统分子认为，这个演说在政治上极其成熟和令人信服，是唯一带有讲演者个性烙印的演说。

当然，贝利亚的演说如同其他人的演说一样，是一篇颂扬斯大林的赞辞，但他抱有一定目的。他歌颂斯大林的伟大，表白自己赤胆忠心，又十分巧妙地塞进了反对斯大林的邪说，把党置于斯大林之上。

"苏联人民赢得伟大胜利的鼓舞者和组织者（指战争时期）是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党"。[①] 直到现在，所有的报纸、杂志和书籍都说斯大林本人是"鼓舞者和组织者"，只是在次要地方提一下党。

贝利亚为表明自己不是失言，在结束演说时再次提到了党，说，"我国各族人民可以确信，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党……"，在句子的结尾处提到"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

贝利亚提出的另一个邪说，简直是带挑衅性的。贝利亚不合时宜地、却非常勇敢地提醒党注意它的民族政策，说它存在着背离民族政策的各种危险，第一是"大国沙文主义"（即俄罗斯沙文主义），第二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即地方民族主义），第三是"国际世界主义"（即"犹太复国主义"及其他"主义"）。

---

① 《真理报》1952年10月9日。

可以大胆地推测，除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外，代表大会上的任何人也不知道，贝利亚与斯大林进行针锋相对的争论。斯大林认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世界主义”是苏联的主要危险，他根本否认存在“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

还有一些细节也饶有趣味：贝利亚的演说多半讲到民族政策和苏联各民族共和国，却只字不提格鲁吉亚及其“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因为梯比利斯、苏胡米、巴统密等地的监狱关押着他的明格列尔同乡大有人满之患。贝利亚既不能为他们辩护，也不能按斯大林发动的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的要求，谴责他们。

贝利亚俨然一个胜利者走下讲台，这说明大会的参加者对党的上层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代表大会最后一次会议的记录① 又把贝利亚从第五位提到原第三位。

然而，在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时，斯大林从名单上勾掉了贝利亚的门徒——战前的中央委员麦尔库洛夫和杰卡诺佐夫（二人与贝利亚一同被处决）以及中央后补委员格维什阿尼。

还应当提到另一件出乎人们意料的事：格鲁吉亚共产党新的反贝利亚的中央委员会提出过一项建议：

“建议党章第一条这样开头：‘由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和斯大林缔造的苏联共产党……’，以下同意中

---

① 《真理报》，1952年10月15日。

央的条文”。①

政治局没有采纳这一建议。如果说这是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加以否决的，那就要高度评价斯大林的谦逊，因为斯大林自己曾说苏联共产党是“列宁—斯大林的党”。②据赫鲁晓夫说，斯大林在他那本略传里竟亲笔写进“斯大林的天才”这类词句！可见，斯大林绝不会有什么谦虚之举。

①《真理报》1952年10月15日所载格鲁吉亚中央书记茨霍夫莱巴什维列的发言。

②《伟大卫国战争》，第17页。

第九章

斯大林的历史性失败

只有深入研究斯大林的政治心理世界，按照他的观点去看苏联发展的现状和前景，才能够理解他。这时，我们在苏联这个独裁者的行动中所发现的，既不是迫害狂，也不是老人特有的怪癖和变化无常，而是现存制度缔造者的铁的逻辑，是他对这种制度的崩溃所感到的有理由的恐惧，是他对自己的学生和战友们的漫不经心所表示的极大关切，是他对未来充满悲观。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有人援引斯大林对他的学生们讲过的一句忧虑前景的话："你们都是瞎子，象刚出生的猫仔一样。将来我死了，看你们怎么办？"

对一个无论对内或对外都采取封闭性的社会来说，斯大林倒是一个理想的统治者。这种社会的活力和寿命，要靠从上到下不断地更新政治细胞，即需要经常清除使用过的干部，经常重建官僚主义者大军。斯大林的制度决不允许在上层随意显示力量，决不允许公民在社会上发挥主动精神，甚至忠心耿耿的主动精神也不允许

发挥。

“党的总路线”的力量就在于它的坚定明确、完美无瑕和绝对服从。在它的词汇中没有“思考”这个词，只有为大家所理解和所接受的一个词：“行动”！“思考”，这是斯大林一个人的特权，而“行动”，则是全党的义务。这样，既建立了良好的“秩序”，又实现了牢固的统治。但是，战争破坏了“总路线”的和谐，从伏尔加河到易北河，凡是经过战火洗礼的人，已判若两人。

在内心深处，斯大林同意西方的俏皮话：“斯大林在战争中只犯了两个错误：让伊万看到了欧洲，也让欧洲看到了伊万”。这些伊万回家时带回去了自由和社会正义的杆菌：“德国的牲畜都比我们这里的人过得好”，“美国士兵吃的巧克力比我们吃的马铃薯还多”，“西方的总统和部长都是普通人，而我们的首长都是爱发火的上帝”。需要使那些“说东道西”、患了重病的人民重新回到战前状态：需要打抗生素，也需要做一次新的有益的放血，而且做得越早，好得越快。沙皇部长斯托雷平说过：“要区别医生手上的血和刽子手手上的血。”斯大林也在思考这一问题。

党的上层人物无论如何也不同意上述观点。他们甚至不反对同西方对话（“共处”嘛！），也不反对在解决苏联国内经济问题（接受不接受“马歇尔计划”，一直举棋不定）和外贸问题（建议“经济技术合作”）时

向西方寻求援助。为此，他们决心冒犯神明，打破对外贸易的垄断，为西方生意人揭开铁幕的一角。可是这样一来，“总路线”将要崩溃。西方数以百万计的杆菌将沿着生意渠道涌入苏联。不仅西方的约翰们将带来杆菌，那些到过西方的俄国伊万们——工程师、经济工作人员、商人、旅游者、大学生、运动员……也将带回杆菌。“铁幕”将出现许多破洞，将开始另一种对话：受西方鼓舞和挑唆的人民同政府之间的对话。一种未曾有过、不可挽回的事情将要发生：人民开始想知道自己的过去，想议论自己的未来。将出现一批新的拉吉舍夫、别林斯基、赫尔岑。俄罗斯将从精神上恢复生机。继俄罗斯之后，反俄罗斯的边境地区和各卫星国将发生叛乱。斯大林认为，如果不恢复旧的、经过考验的“总路线”，就会出现上面描绘的情景。

预测是准确的。如果事情发生在他四五十岁的时候，他完全有力制止事态的发展，但现在他已年过七旬，况且政治局里又没有第二个斯大林，而这样的人物几百年才出现一个。斯大林的暮年与制度的衰朽赶到一起了。外科医生不能延长这种制度的寿命（它已经受不住任何大手术），只能依靠药物来维持。用政治术语说，这意味着要慢“刹车”，要与本国人民以及外部世界寻求“共处”。斯大林断然反对这样做，他错误地以为他的学生们不敢违抗他的意志。但是，解决组织问题的“十九大”一次中央全会表明，情况完全出乎他的意

料。

按着党的传统，新的中央委员会要在代表大会期间召开组织问题的全会并向代表大会最后一次会议报告结果（政治局，书记处、总书记的选举情况）。这条规则第一次遭到破坏。新中央委员会的全会在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闭幕后两天（1952年10月16日）才举行。仔细观察便不难发现，这个异乎寻常的现象，与中央委员会执行机关的难产有关系。后来才知道：斯大林曾示威式地轻视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会议（共八次会议，他只出席两次——第一次和最后一次，每次只参加几分钟），但在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却格外活跃。斯大林拟定了一个有关中央委员会以及其执行机构的新方案，他建议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名额增加一倍，结果选出中央委员一百二十五人、候补中央委员一百十一人。似乎为适应这种情况，他建议选举主席团（政治局）委员二十五人、候补委员十一人。但问题不在于保持比例，斯大林把老政治局委员中“渎犯神灵之徒”和从党的地方世袭领地扶摇直上的“开荒者”搀和在一起。党的开荒者在“慈父的英明”和神圣意志的感召下，应该充当消灭“渎犯神灵之徒”的工具。他们是否意识到，赋予他们的使命，这并无意义。重要的是，政治局的老委员们已经觉察到斯大林的意图，并采取了破坏这一计划的步骤。关于这些步骤，我们将在以后讲述，现在先援引一段中央委员会借赫鲁晓夫之口向第二

十次代表大会所做的声明：

“显而易见，斯大林想要干掉政治局的所有老委员。他经常说要用新人取代政治局的老人。”

需要扩大政治局（主席团）名额的原因就在于：

“他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之后提出的把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增至二十五人的建议，其目的是要清除政治局中的老委员，把那些缺乏经验的人提拔上来，他们将千方百计地为斯大林歌功颂德。还可以认为，这样做的目的也在于准备将来消灭政治局中的老委员。”①

这段话对了解老政治局委员的行动的内在动机具有决定性意义。他们在新选出的政治局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他们继贝利亚和马林科夫之后，已确信斯大林把争论提到“你死我活”的高度。斯大林要“活”，他们就得“死”，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肉体上。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铁石心肠的逻辑是从不含糊的。

怎样制止斯大林呢？

政治局的老委员们还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但是斯大林的所作所为却总是要把他们推上这一步。

上届政治局，除斯大林外，有委员十人。在选举新主席团时，斯大林对其中六人提出了异议。其中甚至包括宁愿死在契卡的子弹下也不肯对斯大林下毒手的人——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安德列耶夫。对

①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秘密会议上的报告，第58页。

斯大林拟排除的另外两个人——米高扬和柯西金，我没有什么把握。

斯大林以什么理由来排除这些忠心耿耿、功劳卓著的战友呢？

让历史学家翻阅当时的中央档案并对此做出回答，可能要在许多年之后。遗憾的是，爱饶舌的赫鲁晓夫也避而不谈斯大林的动机，只说了以下一些情况：

“由于斯大林异常的多疑，他甚至荒诞可笑地说伏罗希洛夫是英国间谍……他在伏罗希洛夫的家里甚至安上了窃听器。斯大林还一人决定解除安德列耶夫的政治局职务。这是一种肆无忌惮的专横行为。让我们回顾一下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后的第一次中央全会的情景吧！当时，斯大林在发言中毫无根据地指责我们党的两个老党员——维切斯拉夫·米海依洛维奇·莫洛托夫和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犯了莫须有的罪。如果斯大林再多掌权几个月，说不定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同志不能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发言了。”①

在刚刚结束对以洛佐夫斯基和莫洛托娃为首的美国“犹太复国主义间谍”案的审讯后，斯大林似乎感到处处都有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在他的心目中，每个犹太人，不管他是不是党员，都是阴谋分子。更有甚者，连讨了犹太妻子的俄共领导人也是阴谋分子。斯大林把他

①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秘密会议上的报告，第58页。

手中的"家谱表"扩大到共产党员的父辈和祖父辈，极力搜寻他们的犹太人祖母、祖父或孙子。例如，他查明赫鲁晓夫有一个犹太人生的孙女，贝利亚的母亲似乎是格鲁吉亚犹太人，马林科夫的女儿嫁给了犹太人。

斯大林提醒中央全会注意"列宁格勒事件"、"犹太复国主义事件"、"格鲁吉亚事件"，与此同时，他仔细地审查每个政治局委员。他审查委员们的祖宗三代，搜寻他们在历史上和政治上的问题。结果查明：十一人政治局委员中五人有犹太人亲属（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安德列耶夫），一人是犹太人（卡冈诺维奇），一人是半犹太人，二人与"列宁格勒事件"有关（柯西金和米高扬，后者的儿子娶了"事件"头子库兹涅佐夫的女儿为妻），只有不会造成危害的、平庸无能的布尔加宁是清白的。

当斯大林向他的战友们发动进攻的时候，他们之中无人知道斯大林给那个未在全会上提到的贝利亚设下了什么新圈套。

我们都知道，贝利亚在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期间，在"格鲁吉亚事件"上给自己平了反，但这只表明代表大会同意了，决不意味着斯大林也同意。

这时在布拉格和华沙正准备对这两个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进行政治审讯，而在与铁托发生冲突时是贝利亚拯救了他们。在保加利亚和匈牙利也准备审讯至今受到贝利亚支持的"铁托分子"。这些一度被贝利亚拯救过

的领导人现在都成了“犹太复国主义者”：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斯兰斯基（犹太人）、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哥穆尔卡（妻子是犹太人）。一个由美国、苏联和东欧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组成的庞大的国际反共阴谋圈，就这样形成了（斯大林的作法与当年侈谈“全世界犹太人阴谋”的希特勒的作法如出一辙）。

所谓“犹太人的阴谋”，以及查祖宗三代的作法，简直荒谬透顶。斯大林自己就有犹太人亲属（他的外孙子是犹太人，为纪念斯大林而取名约瑟夫）。

贝利亚传记的作者用下述几段意味深长的话记述了斯大林给贝利亚设下的圈套：“捷克斯洛伐克成了反对贝利亚的第一个靶子。贝利亚把自己的同盟者安置在那个政权的全部关键岗位上……在马萨利克被杀害以及贝奈斯死后，贝利亚通过他在捷克秘密警察里的代理人来管理这个工业高度发达的文明国家。怎样管理，要看他自己的利益有什么需要。伊格纳捷夫当了国家安全部的首脑后，立即向贝利亚在捷克的堡垒发动了进攻。逮捕的浪潮来得十分突然，席卷了苏联驻布拉格机构的官员。贝利亚领导下的捷克秘密警察的高级官员纷纷被捕。贝利亚的代理人成了清洗的主要牺牲者，他们被指控为搞间谍活动，搞破坏，背叛祖国。他们全是贝利亚的人，指控他们也就间接地打击了贝利亚。但是，整个行动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几乎所有被捕的高级人士，从

他们的头目鲁道夫·斯兰斯基（真实姓名是扎尔茨曼）开始，包括别德里赫·杰林德尔、鲁道夫·马尔戈里斯、安德列·西蒙内、阿图尔·伦敦以及贝利亚的九个走卒，全是犹太人。被捕的人还被指控为‘犹太复国主义者’……新清洗带有典型的反犹味道，它的策划者显然是斯大林。”①

斯大林在华沙事件中对贝利亚的疑心更大。哥穆尔卡本人提供了一些情况，说，如果制造“华沙事件”得逞的话，斯大林要给贝利亚加上何等罪名。（哥穆尔卡给他的一位亲密同事写了一份类似《赫鲁晓夫回忆录》的材料：《我的十四年》，此文发表在《波兰一加拿大信使》杂志1973年第47期上。）

从战后第一天起，波兰就由三个人统治着：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贝鲁特（哥穆尔卡说他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培养出来的人”），政治局委员、国家安全机关首脑雅库勃·别尔曼（也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培养出来的人”）和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战时他曾在敌后领导波兰共产党同德国人进行斗争）。前两个人是贝利亚的亲信，斯大林显然想通过逮捕别尔曼和哥穆尔卡并利用他们的口供来破坏贝鲁特和贝利亚的信誉。

斯大林需要什么样的口供呢？他只想知道一点：贝利亚阴谋反对斯大林，而且拉自己的波兰亲信参与这件

① 威特林，《政委》，伦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72年版，第366—367页。

事。听一听哥穆尔卡是怎么说的吧：

“贝鲁特非常担心别尔曼，怕他在被审讯时说出什么有损于他的名誉的事。例如，贝利亚曾阴谋反对斯大林啦，贝鲁特似乎参与这一事件啦，等等。我不完全相信这些，是别人对我这样讲的。不论怎么说，贝鲁特特别保护了别尔曼，也保护了我，因为我将被第一个交付法庭审判。可是后来事情却是这样发展的：贝鲁特极力拖延，向莫斯科做了假汇报，说我病得很重……贝鲁特极尽拖延之能事，直到最后斯大林去世才解救了我们”。（同上）

所有这些情况，无论是捷克的审讯也好，华沙的事态发展也好，都送到贝利亚那里，因为审讯者和被审讯者都是贝利亚的走卒。在这些问题上，斯大林却事与愿违，陷入了迷魂阵。贝利亚知道的事，马林科夫也一清二楚，两人的命运紧紧联在一起。斯大林对他们二人如此密切的关系始终感到不安。

我们的两个证人——赫鲁晓夫和阿利卢耶娃不约而同地指出过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密切关系。在一次宴会上，他们两人离开政治局的其他委员，引人注目地站在一边。据赫鲁晓夫说，斯大林当时把头朝向他们说：这两个滑头，两个形影不离的骗子！

他们每个人都清楚，斯大林如果杀掉他们中间的一个人，那末另一个人也不会幸免。他们之间保持密切关系是免遭斯大林杀害，保全性命的最好办法。这种密切

关系也拯救了老政治局委员的性命。他们在斯大林召集的最后一次会上，对这个问题更加深信不疑。

我们现在碰到一个最令人困惑费解的问题：斯大林至少想撤掉六名老政治局委员，可是为什么其中的重要成员（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仍然被选入新政治局（主席团）呢？

斯大林在有二百三十六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参加的中央全会上对他们提出了异议，其中只有二十至二十五人真正了解斯大林，其他人都把他看做是永不会犯错误的上帝。为什么他们没有同意斯大林的意见呢？

按规定，选举程序是这样的：中央委员会由秘密投票选举产生，代表大会选出的监票委员会负责统计票数并向代表大会报告选举结果。选举结束后，选票随同代表大会的其他记录材料一并交中央委员会秘密档案馆保存。

中央委员会的执行机构：政治局、书记处、总书记、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的选举，如果全会不要求秘密进行，可采取公开表决的方式。

在中央全会进行上述秘密投票和公开表决时，中央委员们拒绝了斯大林的建议，公然把他拟排除的人选入了主席团（政治局）。

根据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会报告，我们知道斯大林想排除他们，但根据中央全会的正式公告（《真理报》1952年10月16日），他们最后都当选了。这是斯

大林在他领导的党内遭到的首次历史性失败。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斯大林做何反应呢？

斯大林没有示弱。用象棋术语说，他决定“跳马”，吃“老近卫军”，这样就可立刻改变局面。他向主席团建议：鉴于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人过多（委员二十五人，候补委员十一人），应当选出一个负责日常工作的机构，其人选主要应是主席团中的年轻委员。这个机构相当于主席团的常委会，但在党章里没有这种规定。

显而易见，斯大林的意图是想排除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米高扬。可是，他的这一计划只实现了一部分：常委会由九人组成，其中老政治局委员占多数（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年轻委员”二人（别尔乌辛和萨布罗夫），还有斯大林本人。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没有进入常委会。据赫鲁晓夫说，由九人组成的常委会实际上没有发挥职能作用，一切问题都由“五人团”（斯大林、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决定。这样，斯大林最终还是排除了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

斯大林为什么未能合法地排除他厌弃的人？中央委员会为什么没有紧跟自己的“父亲和导师”？难道参加中央全会的中央委员们不知道，斯大林仅仅因为出席1934年中央全会的委员们反对审判布哈林和李可夫而把他们之中的百分之七十的人从肉体上消灭掉吗？

他们当然一清二楚，可是他们还知道另一个更为重

要的情况：至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斯大林已不掌握实权，现在以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为首的党和警察机构掌握着实权。斯大林已不能控制这些机构，相反，他在这些机构控制之下。

斯大林能一手控制党和警察机构时，他是上帝，而现在，中央委员们看到上帝实际已被推倒。

斯大林用尽一切办法，最后决定孤注一掷。这件事虽然记录在我们所能接触到的文献里，但关于斯大林的文献里却毫无记载。

斯大林向这次中央全会提出申请，要求解除他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职务：第一，他确信这个申请不会被采纳；第二，看看他的最亲密战友和学生们对此事的真实态度。

事情完全出乎所料，全会同意斯大林辞职！

这是斯大林的第二次历史性失败。

关于斯大林提出申请这件事，我们有两个消息来源：一是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一是战时原苏联海军部长恩·格·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

阿利卢耶娃在《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写道：

“可能是因为生病，他（斯大林——作者）在第十九次代表大会（1952年10月）之后，两次向中央表示愿意辞职。关于这件事，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是很清楚的。”①

---

① 《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191页。

在她的第二本书《仅仅一年》里，她也讲过这件事："据他从前的译员、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时选入中央委员会的维·恩·巴夫洛夫说，父亲在1952年末曾两次向新的中央委员会提出辞职。大家都不同意。他当时是否预料到他们会异口同声地做出另一种回答呢？或者他曾怀疑有人会同意撤换他？他真地想辞职吗？"①

在下面我们可以看到，阿利卢耶娃以为他的辞职未被采纳，这是把情况搞错了。

海军上将库兹涅佐夫谈到斯大林的申请问题时补充一个新情况，他说中央委员会部分同意了他辞职。显然，他没有说清"部分"的含义究竟意味什么。下面是他的话：

"关于部分解除他（斯大林——作者）的职务的正式请求，我是在第十九次代表会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听到的。斯大林被免除国防部长职务，但仍继续担任中央的和部长会议的主要职务。"②

库兹涅佐夫也把情况搞错了，而且是大错特错了。大家都知道，斯大林早在1947年就不担任国防部长，把这个职务交给了布尔加宁。

辞职问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根据书刊检查机关漏掉的两份材料，所谓"部分"解除斯大林的职务，是指解除总书记职务，保留中央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职

① 《仅仅一年》，第340页。

② 《涅瓦河》，1965年第5期，第161页。

务。

斯大林死后第一个“集体领导”时期出版的《百科辞典》，在斯大林的履历中直截了当地写道：“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之后，1922年4月3日，中央全会根据列宁的提议，选举斯大林任党中央总书记，斯大林担任这一职务直至1952年10月，而后任中央书记至逝世。”①

在勃列日涅夫“集体领导”时期出版的《列宁全集》参考资料中同样写道：“斯大林自1922年至1952年任党中央总书记，以后任中央书记。”②

这些材料不会有任何错误，它们确切无疑地表明：在1952年10月的中央全会之后，斯大林不再担任总书记，他不过是十个书记之一而已。

谁接替了他的职务？关于这一点，不论现已出版的回忆录，还是党的正式文件，都毫无记载。但这里并不存在什么秘密，当然是马林科夫接替了斯大林在中央书记处的职务。不过，他不叫“总书记”，而称做中央“第一书记”。斯大林握有的权力现在已合法地转移到他的学生们的手里。

当然，斯大林仍不失为党的领袖。在主席团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排列顺序中，他仍然排在第一位，而不是按字母的顺序排列在后。他现在虽然排在第一位，

① 《百科辞典》，百科全书出版社，1955年，第三卷，第310页。

② 《列宁全集》第44卷，第651页。

但已完全依附于第二位以及其他人。斯大林如果能容忍这种处境，他也就不成其为斯大林了。为恢复失去的主宰一切的权力，他准备挑起新的危机。

第 十 章

“内部办公室”的毁灭

分析一下下述事实就可以看出：国家保安部的新部长伊格纳捷夫曾起过双重作用，他勤奋地完成斯大林的指示，同时又详细地将指示告诉被指定反对的那些人：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这不是狡猾，而是伊格纳捷夫的一种自卫手段。他深知：任何一个根据斯大林命令而杀人的保安部部长都不是自己死的。完成斯大林的命令之后，他们同样也被消灭掉。苏联秘密警察头子、契卡分子明任斯基、雅戈达和叶若夫就是这样死的。现在坐等的是阿巴库莫夫，然后轮到贝利亚，贝利亚之后，斯大林也要消灭他——伊格纳捷夫。（斯大林不仅善于隐瞒自己的犯罪行为，而且在人民眼里，还捞取了“道德资本”。比如，关于叶若夫，他曾给飞机设计师雅科夫列夫说：“叶若夫是个坏蛋！他断送了我们最优秀的干部，他是个腐化的人。往人民委员部打电话，他们说，他去中央委员会了，往中央委员会打电话，又说他上班去了，派人到他家去找，一看，他喝的

酩酊大醉躺在床上。许多无辜的人被他断送了。为此，我们枪毙了他。”①

关于伊格纳捷夫的双重作用问题，比如，在“医生案件”上，赫鲁晓夫向苏共中央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宣布说：“过去的保安部部长伊格纳捷夫作为代表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斯大林曾在会上对他严厉地说过：‘如果你做不到让医生们认罪，我们就砍掉你的头’”。②

伊格纳捷夫知道，斯大林在任何条件下都可能“砍掉他的头”，所以他开始执行两种政策，否则他就不能参加赫鲁晓夫、布尔加宁、马林科夫主持的这次代表大会。本来他是斯大林周围唯一的一个还活着的契卡领导者，他的副手柳明被枪毙了；枪毙了保安部前任部长阿巴库莫夫和他的所有助手；枪毙了阿巴库莫夫的前任部长麦尔库洛夫和他的所有助手；又要枪毙贝利亚和他的所有助手；消灭了内务部和国家保安部部长科鲁戈洛夫和谢洛夫以及他的所有助手，现在只剩下伊格纳捷夫还活着（1974年在他七十寿辰时，他甚至还获得了奖章）。

斯大林死后，贝利亚将国家保安部和内务部合并为苏联内务部，由他自己领导。而伊格纳捷夫也立刻得到了提升——提升他为苏共中央书记，主管国家保安工作。

---

① 雅科夫列夫所著《生活的目的》，莫斯科，1970年版，第509页。

② 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秘密会议上的报告，第44页。

只有天才的党的工作者才能象斯大林那样善于玩火，又具备惊人的自卫能力，善于绕过暗礁和适应环境。而伊格纳捷夫正是这样的人。他在各级党的机关内部工作过四分之一世纪：在巴什基利亚州、乌兹别克斯坦和白俄罗斯共和国以及苏共中央。他比斯大林更忠实于党的机关工作。他不是一个投机分子，而是一个党的工作的狂热者，也许正是这一点成了挽救他的秘密所在。

当然，在保安部内他已感到自己不是一个专业的契卡人员，是党的机关的代表、党的意志的特使和执行者。如果秘密警察机关的利益与党的机关的利益发生冲突，伊格纳捷夫式的人们就站在党的一边，而党的机关就是党的化身。但是，斯大林个人专政要求，不是党监督警察，而是警察监督党。现在，当斯大林策划一个既反对党，又反对警察的新的清洗时，不能不挑拨起老警察人员和老的党的机关工作者之间的团结，结果将保安部部长伊格纳捷夫塞给了斯大林，斯大林接受了这个新的警察头子，深信能把他按自己的"模式"加以改造。但是，他错了。伊格纳捷夫是一个真正的斯大林分子、两面派，因而伊格纳捷夫成为策划反对斯大林阴谋的理想工具。

现在我们所叙述的这方面问题，除了官方材料之外，间接材料也起着重要作用。

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①，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期间

①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305页。

（1952年10月），“阴谋家——医生们”就被逮捕了，哥穆尔卡“这场戏”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这一年的11月，在捷克斯洛伐克审判了贝利亚的走卒们（斯兰斯基案件），在梯比利斯加强审讯了贝利亚分子。

伊格纳捷夫关于审讯医生们的第一批通报说明：斯大林企图反对的不仅是贝利亚一个人和他的契卡人员，而是反对整个政治局。

赫鲁晓夫回忆录的评论家爱德华·克兰克肖说的完全正确，他说：“最后的清洗是斯大林旨在反对他最亲密的战友，首先反对的是贝利亚”。①

这一切迫使贝利亚决定向斯大林提出要他辞去所有职务的要求。

但是，在提出要求，特别是实现这一决定的过程中，曾存在着严重的障碍，不消除这些障碍，是不能牵动斯大林的，这就是以波斯克列贝舍夫将军为首的《内部办公室》，以伏拉西克将军为首的他个人的警卫人员，以及以柯西金为首的克里姆林宫的司令部。

贝利亚非常了解，只有通过这些忠实于他的奴仆们的肉体，才能使斯大林变成政治尸体。

还有两个问题：即在什么地方向斯大林建议要他辞职，在克里姆林宫，在莫斯科郊外他的别墅里，还是在黑海沿岸的别墅(后来，对赫鲁晓夫就是这样进行的)。其次，在中央主席团成员中，谁参加这个“代表团”到

①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306页。

斯大林那儿去。

大家都知道：有谁不能向斯大林提出这种要求？有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他们不去是由于个人的关系或者胆怯。主席团新成员一般不能考虑——如果有人泄露了整个计划，那是非常危险的。剩下的只有赫鲁晓夫称之为新政治局掌权的“内部集团”，参加新政治局的，除斯大林之外，只有秘密的“四人团”成员参加。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加上“四人团”的走卒伊格纳捷夫。由于命运的嘲弄，只有他们才被允许能到斯大林那儿去。

阿利卢耶娃的回忆证实了赫鲁晓夫的材料，“在‘最后的时刻’常来的客人有贝利亚、马林科夫、布尔加宁、米高扬，有时赫鲁晓夫也来。莫洛托夫自从1948年妻子被捕后，实际上已有职无权，甚至连我父亲病危的日子也没有叫他来。”①

向斯大林宣布要他辞职的最安全的地点，当然是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在格鲁吉亚的黑海沿岸。但是，在“明格列尔事件”之后，斯大林有点害怕自己的同乡，并且再也不去那里休假了。阿利卢耶娃回忆说：“最后几年，他的生活非常孤僻。1951年秋天去南方，是他最后一次外出旅行”②。这样，南方就被排除了，剩下的就是克里姆林宫和莫斯科郊外的别墅，从外表上看，克

① 《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192页。

② 《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190页。

里姆林宫很令人敬畏，因为它是党和国家的官府，所有公开的法令都从这里发布。如果斯大林拒绝呈请辞职的要求，那么他一按电钮，不但在克里姆林宫，而且在莫斯科，甚至在全国都会发出警报，因为这里有专门的联络线。因此在克里姆林宫也被排除了。只有在莫斯科郊区斯大林别墅孔策沃。

只要“内部办公室”还在活动，孔策沃别墅也是危险的。剥夺了斯大林的这个办公室，那时他就掌握在你的手心里——这就是贝利亚的计划。应当去掉斯大林的私人医生、私人警卫员首长、个人办公室的首长、他在克里姆林宫的代表——卫戍区司令员。除掉这些人只能由斯大林本人进行。

我们没有直接证明材料，但是，毫无疑问，正是贝利亚把在波斯克列贝舍夫那里所保管的斯大林的秘密文件掩藏起来了，关于这一点赫鲁晓夫曾说过。①也许，贝利亚从波斯克列贝舍夫那里拿去了比赫鲁晓夫谈到的斯大林的经济手稿更为机密的材料，否则斯大林下述这段话就无法理解：“我抓到了波斯克列贝舍夫泄露秘密材料。没有别人能干得出来。泄露机密文件的是波斯克列贝舍夫。是他泄露了秘密。”②斯大林立刻撤了波斯克列贝舍夫的职，但是，没有来得及枪毙他。

斯大林的怒火比较容易地发泄在伏拉西克将军身

①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292—293页。

②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292页。

上。伏拉西克做为一个职业契卡人员，完全掌握在贝利亚手中。由于贝利亚的缘故，伏拉西克才得以在斯大林身旁工作这么多年。但是，想利用伏拉西克反对斯大林无论如何是不行的。这样，贝利亚又挑拨斯大林逮捕了伏拉西克。阿利卢耶娃曾写道：

"应当说，在最后的时日，甚至连父亲最亲信的人都已经失宠了，1952年冬季，一直忠于他的伏拉西克被投进了监狱，那时为父亲工作二十年的私人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也被革职啦"①。

"1952年冬季"，这就意味着是在1952年12月，因为1952年10月波斯克列贝舍夫还参加了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并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再补充一点，波斯克列贝舍夫、伏拉西克以及他们的助手们被解除了职务，其位置由"内部核心"（四人团）通过伊格纳捷夫推举上来的人占据了。

这种说法是有着充分的依据的，即斯大林的私人医生维诺格拉道夫和克里姆林宫医疗管理局的首长叶果洛夫也是根据贝利亚的计划被逮捕的。大概，根据同一计划又撤销了能够接近斯大林的苏联卫生部部长斯米尔诺夫的职务（他的职位由一个党内谁也不知道的、但是贝利亚很了解的医生特列齐亚科夫所代替）。

共产国际活动家弗兰兹·鲍盖农根据克里姆林宫医生们被逮捕的鲜明的踪迹提出这样的猜测：逮捕斯大林

① 《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192页。

的私人医生意味着，这是以马林科夫为首的斯大林的战友反对斯大林的阴谋，他们想通过医生接近斯大林的机会决定斯大林的命运①。

今天，已经可以明显地确认，维诺格拉道夫院士小组的医生们（斯大林的宫廷医生）是由于贝利亚的密探齐玛舒克医生的告密而被捕的。但是，斯大林把这次逮捕变为反对贝利亚本人，根据科涅夫将军的告密，宣布这些医生是“过去的英国间谍”（贝利亚也是！）②

女管家瓦莲琴娜·瓦西利耶芙娜谈过斯大林对逮捕医生们的反应。在逮捕斯大林的私人医生之后，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在斯大林住处的午餐桌上立刻谈起来。阿利卢耶娃写道：

“在他生命最后一个冬天发生了‘医生谋杀案’。瓦莲琴娜·瓦西利耶芙娜后来告诉我：父亲对这一系列的事件深为苦恼。她听见过吃午饭时是怎样研究这一案件的。她是伺候餐桌上菜的人。他听父亲说：他不相信这些医生做了‘坏事’，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可是有齐玛舒克医生的揭发为‘证’。所有在座的人，象往常遇见这种情况一样，一句话也不说，保持沉默”。③

阿利卢耶娃认为，瓦莲琴娜·瓦西利耶芙娜一向偏袒她的父亲，但又说：“还是应该听听她讲的许多事情，

---

① 《莱因信使》周刊1953年1月23日。

②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二卷，第305页。

③ 《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192页。

人们从她讲的事情中可以提出一些健康的因素，因为她在父亲家中度过了最后的十八个年头，而我是很少在他身旁的。”①

斯大林自己能容忍贝利亚反对他的阴谋吗？

他不但容忍了，而且正是在战后，斯大林非常担心他。赫鲁晓夫这样说：“战后，贝利亚成为政治局委员，斯大林开始担心他各方面的影响，甚至开始惧怕他。那时，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当贝利亚整个的杀人机器被打开之后，一切都清楚了。斯大林达到目的所需要的实际办法都在贝利亚手中，斯大林意识到：如果贝利亚能够杀掉他用手指指出的某一个人，那么，贝利亚也能干掉他自己所选择的任何一个人。斯大林害怕了，因为他就是贝利亚所选中的第一个对象。②

我们所知道的历史上的一切暴君都是多疑的、胆小的，永远担心自己处在危险之中，从而自己制定了保证个人安全的复杂的规定，使出各种诡计，来检验周围的人对他的忠诚。那些被称为“迫害狂”的人，实际上是反对阴谋家的先发制人的真正武器。在这方面，斯大林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们。

首先他剥夺了暗藏的阴谋家们迫害暴君所喜欢利用的时间——夜晚。斯大林是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夜晚不睡觉的暴君，他召集一群同事在自己的别墅内工作和消

---

① 《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192页。

②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335页。

遣。早晨四、五点钟才睡觉，中午十一、二点起床，整个国家的党和政府的庞大机器也要适应他的工作制度。

斯大林也是一位唯一不住在正式官府——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整个国家认为，斯大林住在克里姆林宫参政院大楼内的三间一套住宅里，象亨利·巴比塞所描写的那样。而实际上他住在莫斯科郊区与世隔绝的、四周围以高墙的城堡内。

是啊，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暴君象斯大林这样受到波斯克列贝舍夫和伏拉西克的安全保护。同时也没有一个侍从象斯大林的侍从们这样忠于他的君主（因此，他能让没有文化的炊事员当上将军，私人警卫员最后竟然当上部长——如阿巴库莫夫、麦尔库洛夫、科鲁格洛夫）。

谒见斯大林的制度不仅是部长们，而且政治局委员也感到是一种凌辱，每一个到斯大林那里去的人不管是什么官衔和等级，都要经过斯大林的私人警卫的搜查。

华沙条约司令部参谋长什捷缅科回忆说："到克里姆林宫要经过巴罗维斯基大门，绕过苏联最高苏维埃大楼，转过一个所谓"角落"，那里就是斯大林的住宅和办公室。通过波斯克列贝舍夫的办公室进入斯大林个人警卫员的一个不大的房间，最后才到达斯大林那里。①

斯大林的私人警卫员有一次对莫洛托夫是那样严格。那天，莫洛托夫从伦敦访问归来，从飞机场径直闯

① 什捷缅科，《战争年代的总司令部》，苏联军事出版社，1968年出版，第117页。

进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住处汇报。警卫员在克里姆林宫发现莫洛托夫带着手枪，非常不客气地把他赶了出去。莫洛托夫非常埋怨斯大林，而斯大林却支持了自己的警卫员。①

斯大林别墅的保卫制度同样如此严格。一位苏联作家描写赫鲁晓夫到别墅谒见斯大林的一段经过说：

"在莫斯科的西北部，……在郊外，沿着森林那边展现着一大片新长出的茂密的森林。他走上不高的山坡，又走向凹地。波状的丘陵起伏着，有一条长着灌木丛的道路一直通向孔策沃，平坦的柏油路面几乎是经常没有人行走，路旁立着黄红色的路标，指出："此处禁止通行"。这是渥伦斯科耶别墅。在这荒无人迹的高墙后边隐藏着一栋两层白绿色楼房——就是斯大林的别墅。在一个二月的夜晚，开进来一辆黑色汽车，里边坐着扎格拉金。半小时后，有人把他引到了会客室并告诉他：不要离开此地。然后，第一个出现的是两个年轻的人，扎格拉金虽然既不知道他们的姓，也不知道他们的名，但也上前和他们见了面。

"准备好了，主席同志？——其中一个问道，并很快地扫了扎格拉金一眼……不一会儿汽车停在带有小窗的入口院门前，从便门里走出两个军官。他们用手电筒照亮了一个小房间和扎格拉金的脸孔，长时间地念着他

① 维·亚历山大罗夫《克里姆林宫》，伦敦，1963年出版，第322页。

的证明。“吉姆”汽车开进院门，又绕过一堵高墙，月光射在一条狭窄的林中走道上，又来一个向左急转弯，立即扬起一股带雪的旋风，乘坐的人向后震动了一下，其中一个陪同的人生气地嘟哝道：

“我无论如何也习惯不了这种糟糕的转弯，是谁想出来这种急转弯的鬼点子？”

第二个人冷笑说：

“你知道这是谁的命令？”他小声地、以信任的声调补充说：“你知道为什么这里需要转弯吗？别墅的入口处都是经过研究的，怎样使它更合适？所以需要转弯。”

汽车停在门前停车处，窗子上一点亮光也看不见，但这并没有引起扎格拉金陪同人员的不安，他们知道：光亮透不过厚厚的窗帘。在汽车入口处来了两个军官，他们也是长时间地、仔细地查看文件，终于打开了走廊的大门。

“斯大林同志在饭厅等你，跟我来！”一个红脸膛的将军一只手指着门，然后走在前面……通过一条小走廊，他们在两扇高大的门前停下了。扎格拉金轻轻地抓着门的扶手，感到屋里充满了没有一丝动静的沉静。没有外部一点声音，没有一丝风声，没有任何笑声透过这里”。①

---

① 西佐夫《艰苦的岁月》，《十月》杂志，1964年第4期，第101—102页。

赫鲁晓夫说过，贝利亚参加了斯大林的“服务员”和保卫人员的挑选工作。贝利亚曾让一些格鲁吉亚人包围斯大林。为此，斯大林注意到了这一点并责怪贝利亚只相信格鲁吉亚人，俄罗斯人对他不见得不忠实。贝利亚不得不把保卫人员更换了。但是，贝利亚对斯大林的保卫人员的影响十分之大。赫鲁晓夫发现：贝利亚把格鲁吉亚人赶走之后，继续监视着斯大林的侍从们。贝利亚在契卡机关工作多年，他熟悉所有的契卡人员，他们都讨好贝利亚，而贝利亚正好利用他们干自己的事。因此，斯大林甚至连俄罗斯人的侍从也不能相信，包括“宫廷警卫”在内。①

但是，在波斯克列贝舍夫做“内部办公室”的头头，伏拉西克做斯大林的警卫时，贝利亚想利用斯大林的警卫员干自己的事还不那么容易。可是，由于斯大林中了挑拨之计，他毁灭了自己的“内部办公室”。对他来说，这是由于他的一种自杀行为所造成。

可以想象，“四人团”为什么如此重视让波斯克列贝舍夫的职位由一位能够使斯大林与世隔绝而自己又得不到消息的人来代替。（这些阴谋家有许多被强制的执行者）代替波斯克列贝舍夫职位的是比他年长的弗拉基米尔·纳乌莫维奇·契尔奴哈，他是西伯利亚人，1918年入党，卫国战争的积极参加者，波斯克列贝舍夫与他一起在乌弗开始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生涯，1925年又将

①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336页。

他拉进“斯大林的秘书处”。契尔奴哈虽然很忠顺，但他是“办公室小职员”出身的一般的机关工作人员。他似乎起不到新的波斯克列贝舍夫的作用，但斯大林身旁再没有别人啦，也许因此斯大林决定在中央机关内部寻找一个新的助手。对斯大林“办公室”的新首长，要求他除了具有意志坚决的品质之外，还要具备忠诚、对党的侦察工作职权范围内的全面知识、军事纪律和基本理论。这样的人很快就找到了：苏共党的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弗拉基米尔·尼基弗罗维奇·马林，他是与最高层有关系的一位候选人。最低限度，根据他过去的工作，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几个成员都了解他，如：安德里亚诺夫、波诺马林科、伊格纳捷夫、马林科夫和贝利亚。

马林是马林科夫的人，在“大清洗”之后来到党的机关。战争初期，马林科夫让他当上了白俄罗斯中央书记，战争期间他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军衔是将军，之后他被任命为最高司令部所属游击运动中央司令部的副司令（司令部首长是波诺马林科。也许，马林在任这一职务期间，因为汇报游击战而与斯大林发生过联系。同时，毫无疑问，根据马林的职务特点，他与贝利亚也有密切的联系。战后，他和波诺马林科一起被未来的保安部部长伊格纳捷夫任命为白俄罗斯中央书记。1948年，波诺马林科被任命为苏共中央书记时，马林要求到中央直属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他于1949年提前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同年，在消灭日丹诺夫分子

时，马林科夫把经过考察的人派往列宁格勒：安德里亚诺夫任列宁格勒州党委会第一书记；马林任列宁格勒市党委会第一书记，1952年末马林从这个职位上又爬到了波斯克列贝舍夫的宝座。也许，没有这个可怕的宠臣的名声，马林的权力也已经够大的了，如果他能起到指定他应起的作用——详细地向马林科夫汇报斯大林的每一项安排和活动，并且在独立工作条件下不僭越王位，他也够聪明的了。

1953年1月13日，斯大林发表了关于克里姆林宫医生被捕的著名文章，因而对独裁者的阴谋的任何猜疑也就全都消散了。

第十一章

斯 大 林 之 死

1953年1月13日对斯大林来说是生命攸关的一天。这一天，他公布了关于国家保安机关揭露“恐怖分子医生小组”用毒药害死苏联积极活动家的“塔斯社大事记”，这个材料的公布正好结束了斯大林的生命。

为了弄清这件事是如何发生、为什么发生的，我们应当问一下自己：“医生案件”为什么对斯大林这么需要。斯大林以他非常明显的而又不是他常有的疏忽大意回答了这一问题：在1月13日这同一天还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伪装的教授与医生是卑鄙的特务与凶手》。文章虽未署名，但根据语言和风格的特点，根据提出论证的方式，很清楚，文章的作者就是斯大林。

在“大事记”中提到的“凶手—医生”是为两个外国间谍组织工作的，一个是美国间谍组织（教授—医生瓦西，科干，费尔德曼，格林施坦，埃琴盖尔，玛伊奥洛夫），另一个是英国间谍组织（维诺格拉道夫院士，教授—医生科干，伊果洛夫）。除维诺格拉道夫和伊果

洛夫之外，所有被逮捕的医生都是犹太人。他们都是克里姆林宫医院的医生，是政治局委员、政府官员和军队高级将领的宫廷医生。第一个小组的犹太人全是通过“国际犹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组织”被网罗到美国侦察机关工作的，它以慈善组织的面貌出现，而维诺格拉道夫小组成员是英国侦察机关的老间谍。

《大事记》提到医生承认他们用毒药害死了中央委员会书记日丹诺夫和谢尔巴科夫，并想害死伏罗希洛夫、戈瓦洛夫、科涅夫元帅、什捷缅科将军和海军上将列夫琴科。瓦西教授似乎向法庭供认说，他曾从该组织那里得到过犹太反动资产阶级复国主义者的指示，“根绝苏联的领导干部”（但是，我们发现最重要的元帅朱可夫和布尔加宁以及党内重要活动家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没有在准备消灭名单之内）。

如果斯大林仅限于公布这个“大事记”，那么可以认为，这只是反犹太人主义的一次周期性爆发，而“医生案件”完全是“犹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事件”的翻版。但是，斯大林过早地（为什么这样不谨慎从事）用社论（1月13日）宣布了政治局委员们的宫廷医生案件是政治局内部的事。

斯大林一向具有丰富的犯罪幻想，但在“医生案件”上反映出他那令人吃惊的缺陷。他只不过是从档案中把布哈林、李可夫、雅戈达案件以及一起受审的克里姆林宫“医生—暗害分子”集团（教授普列特涅夫、医

学博士列文、马克西莫夫和卡扎科夫）搬出来，去掉旧人名，换上新人名，使控告合乎当时要求，并悄悄地塞给了政治局。

尤其是斯大林又重新拿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下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政治哲学，说什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人民的敌人”，揪出来的越多，“社会主义”就越有成绩。他第一次逼迫医生们承认杀人的手段（普列特涅夫、列文、马克西莫夫和卡扎科夫承认：他们是根据外国间谍组织、过去的政治局委员李可夫、布哈林、内务部的首长雅戈达的指令，用有害的药物治死了政治局委员古比雪夫、中央委员明仁斯基和“无产阶级”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

斯大林在反对政治局的仇恨上，眼睛瞎到如此地步，或者说智力上如此衰朽，以至于看不见，他是在用旧白线缝缀新的黑衫。

“有些人作出如下结论：现在已经没有暗害、间谍的危险……但是，这样考虑和判断的只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站在反马克思主义立场，主张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人。他们不知道，我们的成绩不会熄灭，只有使斗争更加尖锐。我们越是向前发展，与人民敌人的斗争就越加严酷。”①

谁是这些匿名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呢？当然，不是集体农庄庄员，甚至也不是“医生—杀人犯”，而是

① 《真理报》1953年1月13日。

苏维埃国家的成员和国家保安部门的领导者， 他 们 象"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布哈林、李可夫和雅戈达一样，很容易就能死于大清洗的子弹之下……

但是，斯大林自己直接指出了"人民敌人"是哪些人：一，"我们某些苏维埃机构及其领导人 失 去 了 警惕，作事马虎"；二，保安机关没有及时揭露医生当中的有暗害行为的恐怖组织。

斯大林没有想到，把被控告的克里姆林宫的医生投进监牢，这仍然是可怜地重复过去的把戏。他认为他们的"暗害行为"，几乎是规律性的。

"历史上已有这种实例，卑鄙的凶手在医生的假面具下进行暗害活动。充当医生的列文、普列特涅夫根据苏联敌人的命令害死了伟大的俄罗斯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苏维埃国家的卓越活动家 古 比 雪 夫 和 明 仁 斯基"。

列文那时是斯大林的私人医生，象现在的维诺格拉道夫一样。两人都是根据为外国间谍组织服务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人民敌人"的指示和命令，要害死斯大林的。斯大林之所以能活着，完全由于他个人的警惕性。而内务部（雅戈达）从来没有及时揭露过医生当中的有暗害行为的恐怖组织。

这为什么呢？

因为雅戈达自己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和"人民敌人"，而贝利亚为什么不揭露呢？——斯大林现在想

弄清楚这一问题。

斯大林以威胁性的警告结束了自己的文章，他说：“苏联人民以极大的愤怒给罪恶的杀人匪徒及其外国主子以打击，她象粉碎恶棍一样消灭了为美元和英镑而出卖自己，充当可卑的走狗的人们。至于这些走狗一杀人犯的鼓动者，他们会深信，为了向他们说出有份量的语言，人民将不会忘记对他们的惩罚，并将找到惩罚的道路”。①

这是叶若夫时期的语言，当时斯大林找到“罚惩”列文和普列特涅夫的“鼓动者”的办法，枪决了政治局半数的委员和百分之七十的中央委员。

贝利亚与马林科夫，赫鲁晓夫与布尔加宁，更不用说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和安德列耶夫，他们非常了解这个语言和自己注定灭亡的命运，如果斯大林还继续掌握几个月的权力的话。关于这一点在苏共中央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谈到过。

“回忆‘医生谋杀案件’，实际上除了女医生季马舒克的声明之外，没有什么事件可言，最大的可能，也许是有人唆使或命令她（正好她不是国家保安机关的正式工作人员）给斯大林写信……医生们被逮捕后不久——我们政治局委员们看到了一份记录，上边有医生们认罪的供词……这样，事件就出来了，谁也无法在审讯的基础上证实这一事实的真相。……在斯大林死后，我

① 《真理报》1953年1月13日。

们才研究这一事件，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一事件自始至终都是捏造的，而且这一可耻的事件是斯大林制造的。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把这一事件进行到底（他已设想好了结局）。”①

斯大林设想的结局是怎样的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明确而坚决的："显然，斯大林企图打倒老政治局的所有委员，并妄图在将来消灭他们。”②

三十年之后，政治局从档案中拿出了列宁的“遗嘱”，列宁建议免除斯大林总书记的职务，因为“他滥用职权”。

“对斯大林这种不良的品德……政治局认为，在他生命的最后年代达到不能容忍的地步。”③

当政治局委员们确信，斯大林想消灭他们时，他的性格变得“特别令人不能容忍”，他们决定向斯大林下最后通谍，不仅要他解放医生，而且要撤除他的一切职务，做到这一点只能是掌握实权的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他们可以依靠军队（朱可夫、扎哈罗夫、莫斯卡连科、索科洛夫斯基、叶列缅科）和警察（伊格纳捷夫）的支持。他们摧毁了“内部办公室”，从

① 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秘密会议上的报告，第44页。

② 同上，第58页。

③ 苏共中央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秘密会议上的报告，第8页。

而有可能下最后通谍。毫无疑问，最主要的阴谋策划者是贝利亚。

我们暂时回转到斯大林与贝利亚的相互关系问题上。上边已经引证了赫鲁晓夫的说法，即斯大林惧怕贝利亚，甚至怕他搞阴谋。同时我们也看到，“明格列尔事件”就是反对贝利亚的。以后，我们又看到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斯兰斯基事件和波兰的哥穆尔卡事件，其背景也是反对贝利亚的。最后，“医生案件”首先就是反对贝利亚的案件。在这些情况下，令人奇怪的是，斯大林为什么没有对政治局的老委员们这样做呢？象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其他一些人，斯大林完全拒绝他们到他的住处去访问，而贝利亚只要想去，可以在白天、黑夜任何时候见到斯大林。斯大林已故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在世时，贝利亚经常到他家去。正是她提醒自己的丈夫，贝利亚是个坏蛋。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曾写道：“在我们亲人的圈子里，有着对他一致的憎恶并怀着一种莫名的恐怖。据父亲告诉我，妈妈早在1929年就‘大闹过一场，说她要求一定不许这个人进我们的家门’。这是我长大后父亲对我说的，而且解释道：我问她：贝利亚到底有什么不对头？拿出事实来！你没有能说服我，我没有看到事实！可是她一个劲地喊：我不知道你还要什么样的事实！我看他就是个坏蛋！我不能和他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那时我对她说：‘去你的吧！他是我的同志。他是一个优秀的契卡人

员，他用先发制人的办法帮助我制止了格鲁吉亚的明格列尔人的叛乱。我信任他，我需要事实！’”①

下述这些事实迫使斯大林改变了对贝利亚的看法，阿利卢耶娃回忆说：“父亲的话失败了。有一天夜晚，我住在贝利亚妻子那里，一大早，突然父亲来了电话，他用粗鲁的语言狂怒地骂我：现在立刻回家，我不信任贝利亚！”②

“对这一切，贝利亚已经看到并感觉到：他非常清楚，他的命运经常处于危险之中。”③

斯大林虽然改变了对贝利亚的看法，但他不能摆脱他，因而表面上他什么也没有表露过。斯大林不仅是一个很出色的秘密活动家，而且是一个巧妙的演员，首先对他选出的牺牲品给以信任，之后，又突然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打击——这就是他在对内对外政策上犯罪艺术的最主要的办法。

斯大林努力想出一些奇特的办法来，以便掩盖他所策划出的打击。但是，显然这方面他没有成功。也许，参加孔策沃酒宴“结成兄弟”是他发明创造的才气涸竭的某些补充。在孔策沃别墅，斯大林一再强调要贝利亚做提议干杯的人。要知道，根据高加索习惯，贝利亚既然现在是提议干杯的人，他就能指挥斯大林，甚至是在

---

① 《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18页。

② 《仅仅一年》，第327页。

③ 同上，第325页。

他家里。

阿利卢耶娃曾描绘过这样一次豪华的宴会，她说："在索契和孔策沃别墅最后几年的饭桌座位上，曾经是坐满了醉汉，我看见过几次，但很快就离开了。父亲喝的不多，但是他看到，按照俄国通常的习惯，人们喝的烂醉，吃的很饱时，他非常满意，人们很快地散去了。有一天父亲也喝了很多酒，他表现出很幸福的样子，并且和已经站不住的卫生部部长一起唱起民歌来了。人们好容易使部长安静下来，要他坐到汽车上，驱车回家了。通常是宴会完了时保卫人员进来，每一个'贴身'警卫拖走喝醉了的'自己所保卫的人'。这些寻开心的领袖们用粗鲁的玩笑话取乐，波斯克列贝舍夫和米高扬经常是牺牲品，而贝利亚只是鼓动父亲去攻击别人。在椅子上突然放上一个西红柿，当一个人坐上去时，大家哄堂大笑。或用勺往酒杯里撒一些盐，在普通酒内掺一些伏特加烈酒。父亲一般只是坐着，抽着烟斗，看着，他自己什么也不做。米高扬和被父亲称为'总管'的波斯克列贝舍夫是甘心顺从的。'总管'经常是在什么地方打了滚，又在浴室呕吐之后，还没有清醒就被送回家去的。贝利亚回家时也是这副模样，虽然没有人给贝利亚椅子上放西红柿，父亲称贝利亚为'检察官'。"①

"父亲酒喝的不多，但是，他看到别人喝的很多时非常满意——特别是对波斯克列贝舍夫和贝利亚，好象

① 《仅仅一年》，第333—334页。

有意要证实一下'清醒者慎言，酒醉者失言'这句俄罗斯谚语灵不灵似的"。也许，斯大林有一个狡猾的打算：喝醉酒的人可以说出任何一些邪话来，只要什么时候愿意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利用它。但是，贝利亚无论他喝的多么醉，"也从来没有一个人把西红柿放在他的椅子上"，"有时父亲也取笑一下贝利亚。他老是重复着那一个笑话，针对的是'检察官'，但引不起任何人的笑来……这个笑话是非常阴惨的，一般谁也笑不起来。"①在这个不笑的场合，的确贝利亚比斯大林显得更可怕。

在这个喝得醉醺醺的"高水平"的酒宴上可以决定百万人的生死问题，不仅反映这些领袖们的道德面貌，而且反映斯大林用什么方法统治他们，暴露斯大林和他们在思想上的密切关系。他们之间的豪饮，实际上是斯大林个人为反对他们所进行的日常的侦察，但他非常狡猾地隐瞒了这一点。"没想到他自己欺骗了自己。直到最后的时日里他都监视着，有谁想狡猾地欺骗他，这已成为他的一种狂症。"②

斯大林没有想到，不是旁人而正是他自己欺骗了自己，不是在别的什么时候，而是在他平日举行的和最后一次酒宴上。

斯大林喜欢自己的每次发言都建筑在意识形态基础

① 《仅仅一年》，第333—334页。

② 同上，第340页。

上，如果有合适的引文他就引用著作中的新的教条，如果没有引文，他就引证列宁的话。这个意识形态的基础必须是建筑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上。但是，列宁和马克思一样，在解释历史过程和人们的行为时，用阶级和阶级斗争解释只是指的阶级社会，而社会主义认为是无阶级的社会（1936年斯大林自己也这样解释过），所以，它的任何社会政治现象都不能建筑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但是，又怎样解释苏联社会充斥着害人者、破坏者和杀人犯，每年将近有一千万人被投进监狱呢？在上边提到的1月13日这篇文章中，斯大林以自己完全解除武装的纯朴的语言回答说："在苏联已消灭了剥削阶级……但是，还存在着带有资产阶级观点的人和资产阶级道德——这些活生生的人"（原话如此）。他们隐藏着人民的敌人，在没有阶级的社会里联合成为一个阶级，同斯大林进行殊死的斗争。

斯大林这些论点都是在《真理报》整个一、二月份开展的意识形态运动的基础上提出的。

1月18日的《真理报》进一步根据斯大林在叶若夫时代所论述的阶级与"人民敌人"的学说，号召俄罗斯在各方面揭露"人民敌人"，而在各民族共和国内则要揭露"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

在1月21日运动高潮时期，公布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由于协助政府揭露医生—杀人犯案件有功，而决定奖励利吉亚·费道谢耶夫娜·季玛舒克医

生以列宁勋章。”这是公开向地方的季玛舒克们的号召——更多地写出揭发材料，争取获得勋章！

1月22日《真理报》又公布了中央书记处书记米哈伊洛夫为纪念列宁逝世29周年而做的报告，斯大林知道，这个报告委任谁去做合适，米哈伊洛夫不但几乎是逐字逐句地重复了1月13日发表的文章，而且还补充了几句斯大林在叶若夫时代所讲的尖锐的语言。

1月24日《真理报》由于地方选举苏维埃代表而顽强地号召人们提高警惕，团结在斯大林周围。

1月31日《真理报》登载了一篇社论《以高度政治警惕性教育劳动人民》，文章说："在最近几年，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内进行了审判案，在苏联对一伙真正的特务和杀人犯进行了揭露"，号召全国人民坚决揭露"暗藏的人民敌人"。报纸上还援引了乌克兰各部领导机关揭露"阶级异己分子"和在立陶宛揭露立陶宛"世界主义者"和"犹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事例。

2月6日《真理报》又发表一篇长文，是关于国家保安部机关在苏联各个地区逮捕特务的。这篇文章登载了被盗窃的秘密文件（是关于波斯克列贝舍夫的！）为什么必然落人"敌人"和"叛徒"之手。

2月11日季玛舒克给《真理报》编辑部写了一封信，感谢许多人的来信、来电对她的祝贺，祝贺她揭露"苏维埃人民的敌人"而立了功。

2 月20日《真理报》描绘了一幅季玛舒克的“心理”肖像，她获得了法国让·达克类似的称号，文章有一个简单的标题：“利吉亚·季玛舒克的信件”，《真理报》想回答下述问题：一个普通的医生是如何判断具有世界声望的一些院士和教授们的医疗业务和方法的？“在病者床前有两个穿着白长衫的医生，有一个学者具有很高的名望和职衔，另一个没有职衔，但具有二十年医务工作经验。他们手中都拿着同样的化验单，他俩看到的都是同样的病症，但是一个妇女看到带有职衔的这个人做出了错误的诊断，由于错误的诊断就采用了错误的医疗方法，因而致死。他为什么这样做呢？为什么造成医疗错误？这个具有职衔的人似乎很有学问和经验，怎能造成这样大错？更何况他又放弃任何可以纠正它的做法。这意味着是谁在你面前？为了解答这一问题，不是一、二个小时就可以做到的，而是需要许多小时的紧张的思考工作，需要有丰富的知识和充分的信心，更主要的是：要成为熟悉本行工作的爱国者，这样你才能明白一切。是的，在她面前，不是一个医生，而是一伙苏联的敌人，凶恶的、狡猾的伪装得很好的敌人。斗争开始了，斗争十分艰巨。要知道，他们，这些带职衔的人们占据很高的地位，他们在四周安排了‘自己人’，但是，这个女人象与祖国的敌人进行斗争的人们一样，不是为生存，而是用死亡去斗争”。

在这位“爱国者”的告密的基础上，斯大林制造了

"医生案件"。但是，季玛舒克仅仅告发了一个医生——维诺格拉道夫院士。象我们上边已经说过的那样，这份告密材料，贝利亚可以利用它使斯大林失去一位善良而又忠顺的私人医生。在策划斯大林未来所患的病症方面，维诺格拉道夫院士是一个多余的人，正是由于他的忠顺和善良，对贝利亚来说，他是一个"有害的"人。贝利亚决定在斯大林身旁安排自己的医生，但是，他没有得逞——斯大林不允许在自己身边安排任何医生，而是使用家庭的小药房为"个人服务"。当然，贝利亚打算的不是这个，他所安排的一切，都使斯大林处于完全没有医务保护的状态之下。

在《真理报》反对"杀人凶手"最激烈的时候，发生了两起企图使之自然死亡的杀人案，但是，现在清楚了，一个是斯大林制造的，一个是贝利亚制造的。

2月17日《消息报》登出：负责斯大林安全的克里姆林宫卫戍区司令高申金将军"过早"地死去了，这位将军是从斯大林的警卫员直接提升到这个岗位上的。这个人比较年轻，身体非常健康，盲目地忠顺于斯大林，并感觉到自己是不依赖于贝利亚，对贝利亚的能力估计不足，因而"过早"地死去。但是，斯大林所制造的谋杀是组织的非常自然，甚至是很隆重地，以便使人们觉得："此人是死于战斗岗位上"。下边谈谈列夫·梅赫利斯这个人：

在形成斯大林暴君的历史过程中，在意识形态方

面，梅赫利斯象叶若夫和贝利亚在警察方面那样重要。梅赫利斯是政治局委员当中唯一的一个可以说这句话的人："我给斯大林铺设了一条通往权力的道路，通过列宁时代的所有老近卫军，是我使他成为党的伟大领袖和各学科的泰斗。"从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真理报》中能找出许多材料，从中可以看到：《真理报》主编梅赫利斯为达目的如何发展这方面成就的。深为感激他的斯大林为了报答这个红色教授学院过去的学生，把梅赫利斯提升为《真理报》副主编，之后成为主编。"大清洗"之后，斯大林又把他拉进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负责调配党和政府高级干部的机关）。战争期间，斯大林又任命他在国防部当自己的副手和红军总政治部部长，官衔是上将（赫鲁晓夫是政治局委员，还只是一个准将）。战后，斯大林又把他提升为国家监督部部长，中央委员（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现在，在"犹太反动资产阶级复国主义者事件"之后和新的"医生谋杀案件"之后，斯大林记起梅赫利斯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缺陷"——他是犹太人。出于排斥犹太人的一般思想逻辑提醒他：如果他是犹太人，那么他就是犹太反动资产阶级的复国主义者，如果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就能给这些犹太人医生们下达命令（他不仅是病患者，而且是这些人的掩护者），杀死自己过去的对手和过去担任红军总政治部首长的学生、红色教授学院同餐桌的战友——谢尔巴科夫。还在"医生谋杀案"等待审

判时期，斯大林就把梅赫利斯派往萨拉托夫做“重要出差”。在那里不声不响地就把他逮捕了，并把他转移到莫斯科列弗尔托夫斯基监狱的医院，他交待了斯大林所需要的材料，并于1953年2月13日死去了。①

在政治局许多委员、元帅、部长们的参加下，在红场上举行了梅赫利斯的隆重葬礼，但斯大林没有参加。大概，斯大林决定采取两面派手段，最低限度，他不能借口有病不参加，因为2月17日他刚接见了印度大使梅农，并和他谈了长时间的话。根据梅农的谈话，斯大林虽然是七十三岁高龄，但看上去他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在谈话期间，斯大林在记事本上画了几只狼，他所表达的思想，不仅是“外交词令”。当他为自己的画作注解时，他发现：农夫表现得很聪明，杀死了这几只恶狼！当然，斯大林想的不是对面这个人，也不是斯大林仇恨的尼赫鲁团长，而是政治局的这几只“恶狼”。①

与此同时，《真理报》在国内所开展的运动从政治与心理气氛上达到了白热化。《真理报》2月8日、9日、11日、12日、16日、18日、19日、20日、22日、23日、26日、27日所发表的文章和通讯，都是关于“杀人犯”、“间谍”、“暗害者”、“人民敌人”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真理报》的政治社论没有一篇

---

① 维·亚历山大罗夫《克里姆林宫》，伦敦，1963年出版，第325页。

① 梅农《飞奔的三驾马车》，伦敦，1963年版，第29页。

不涉及到“警惕性”和“人民敌人”问题。根据叶若夫时代的准确的做法，这是《真理报》有目的地、系统地开展反间谍教育活动。

2月28日晚上，《真理报》很迟地出版了3月1日的报纸，上边发表有中央关于“三·八”妇女节的决议，但是，谈节日谈的很少，而更多的仍是讲“间谍”、“杀人犯”、“暗藏的人民敌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

从第二天起发生了一种无法解释的怪事：《真理报》突然停止发表关于“人民敌人”的任何材料。尤其是，“人民敌人”这几个字完全不提了，甚至在社论和评论中也不提了。从3月2日《真理报》的重要社论“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和3月3日的社论“掀起宣传高潮的重要条件”，没有一个字提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人民敌人”、“间谍”和“杀人犯”。

反对“人民敌人”的运动取消了，当然，并不是《真理报》编辑部取消了这一运动，而是上边决定的。是谁取消的呢？是斯大林吗？当然，不是斯大林。取消这一运动的是自1953年3月1日起守卫在斯大林身旁的人，这些“守卫者”是“四人团”当中的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从1953年2月28日夜晚到3月1日完成了政变，借故斯大林生病，“临时”放下一切权力，他们避开苏共中央主席团，立刻分争权限；斯大林在政治局中的其他继承人——没有参加政变的老的

法定继承人，落到第二位的角色。“四人团”发表了“政府公报”，公报最后结束时说：“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意识到‘斯大林身患重病’这一事实的重要意义，他多少需要长时间地不参加领导工作。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在领导党和国家的工作方面，要严肃地考虑与斯大林离开国家和党的领导工作有关的一切情况。”①

此时，斯大林已经死了，但死得很慢，确实是由于采取“有害的医疗”方法而死的，这是斯大林自己念叨出的灾祸。

正巧，在第二次“政府公报”中反映出另一种谎言。公报说，斯大林由于中风，于3月2日夜晚出现脑溢血现象，那时他正在莫斯科自己的住宅内。实际上，正象后来所说的那样，事情发生在莫斯科孔策沃别墅内。如果一切经过都是很正常的，斯大林的学生们的良心都是纯洁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隐瞒他死去的真实地点？如果不是想证实自己不在现场，为什么还要以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的名义草率地瞒过党和人民？

第一个从赫鲁晓夫那里知道斯大林不是死在莫斯科的是过去的纽约市市长、战争期间美国驻莫斯科的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赫鲁晓夫告诉他，“四人团”在斯大林死时是如何守卫的。

下边就是哈里曼说的一段话：

“所谓‘医生阴谋’，几个医生被指控为阴谋暗害

① 《真理报》，1953年3月4日。

某些共产党领导人，显然是斯大林为了开始新的大清洗而炮制的。某些外国的俄罗斯问题观察家们暗示：斯大林周围的人，由于害怕在新的大规模的恐怖中丧失自己的生命，因而干掉了老头子。我一直在寻找对这一问题的答案。在不久前我与赫鲁晓夫的一次谈话中，赫鲁晓夫谈到关于斯大林死的问题，之后，由于我的要求，他决定公开发表这次谈话。

“赫鲁晓夫告诉我：斯大林在晚年是一个多疑的、独裁的、没有同情心的人。他谁也不信任，对我们他也不信任。他不让我们插手工作，其实这些工作他很早就力所不能及了。我们的处境很困难。一个星期六夜晚，他邀请我们到他郊外的别墅参加晚宴。斯大林的情绪很好，这是一个很愉快的晚上，我们很愉快地度过了。然后我们就各自回家。星期天他一般都要给我们打电话，要我们去参加讨论。但是，这个星期天他没有来电话，使我们感到惊奇。星期一他也没有进城。星期一夜晚，他的私人警卫队首长打来电话说：斯大林病了。我们大家——贝利亚、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和我，立刻驱车到别墅去看望他。他已失去了知觉，他的一只胳膊和一条腿已经瘫痪，舌头发硬。我们陪了他三天，但他仍没有恢复知觉。过一会儿他恢复了知觉，那时我们正在他房间里。助理护士用勺喂了他几口茶，他握着我们的手，还尽量在和我们开玩笑。他笑着用他那健壮的手指着床上挂的那幅画，上边画着一个山羊羔，一个小姑娘正

用勺喂它。而现在他用手势所说的话是，他象这个小山羊羔一样软弱无力。

"'过了没有多久，他就死啦。我哭了，因为首先我们是他的学生，对他负有一切责任'。

"我问赫鲁晓夫，斯大林是否已选好了自己的继承人？赫鲁晓夫直截了当地回答说：'他谁也没有选，他认为他将永远活下去。'"①

从这个谈话中我们可以知道一些重要事情：

1、斯大林不是死在莫斯科，而是在他自己的别墅（后来，从阿利卢耶娃那里，我们才知道是在孔策沃别墅）。

2、斯大林的最后访问者是：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他们于1953年2月28日在斯大林的酒宴上度过了整个的夜晚。

3、只是在3月2日星期一，斯大林的警卫才通知"四人团"，斯大林已经病了。他们到斯大林那里，并守卫在他床前三天，很安然地等待他死去。

4、根本没有提到请医生。

后来，赫鲁晓夫向各种人一再重复这种说法。在赫鲁晓夫回忆时又有所夸大。斯大林病的日期又移到2月28日，但实际还要早些。显然，有谁提醒赫鲁晓夫，应当提到医生问题，虽然是第二天病的。

① 艾夫里尔·哈里曼《同俄国的和平共处》，纽约1959年版，第102—103页。

这个故事的最后措词是：

“1953年2月（即2月28日），斯大林病了，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和我于星期六夜晚在斯大林的近郊别墅……和往常一样，晚饭一直吃到早晨五、六点钟左右。饭后斯大林已经喝得相当醉了，但兴致很高，看不出他身体有丝毫患病的迹象。……幸福的晚宴结束得这样好，我们各自回家啦……第二天是星期天，原来是休息日，我认为斯大林肯定会召见我们。但是，他没有来电话。突然，电话铃响了，这是马林科夫，他说：‘你听着，警卫人员刚从斯大林别墅打来电话，他们认为斯大林出了什么事。我们最好一起去，我已通知了贝利亚和布尔加宁，你最好立刻动身’……我赶紧穿好衣服，驱车前往斯大林住处……十五分钟后就到了那里。我们大家到齐，在进斯大林卧室之前，先去见了一下值班官员。他们解释了一下担心的理由，说：‘斯大林同志几乎一向都是在11点钟唤人送一些茶和吃的东西给他，但是今天晚上他没有唤人’，因此，他们派马特雷奥娜·彼得罗夫娜去看看他。她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仆，已为斯大林工作多年。她不很聪明伶俐，但对斯大林是诚实和忠心耿耿的。她回来告诉警卫员们说，斯大林同志躺在他平常睡觉的那间大房间的地板上。显然，斯大林是从床上跌下来的，警卫员把斯大林从地板上抱起来，把他放在隔壁小餐室的沙发上。

“我们知道了这一切之后，大家觉得，既然斯大林

处在这种不便见人的状态，让他知道我们在场是不适宜的。于是我们就分手回家了。”①

这就意味着：

1，2月28日，“四人团”和斯大林在一起大吃大喝；

2，他们离开斯大林时，是3月1日早晨；

3，同一天晚上，斯大林得了重病（从床上跌下来，自己动不了，不吃不喝，不和“仆人”说话，显然是失去了说话的能力）；

4，3月1日通知“四人团”到生病的斯大林那里去，但是，他们并没有去叫医生，医生们拒绝看病人，他们就分头乘车回家了。

赫鲁晓夫继续说：“深夜，马林科夫第二次打电话说，斯大林同志的警卫员又打来电话：斯大林已经很不正常了……

“我们再一次派马特雷奥娜·彼得罗夫娜去看看斯大林的情况，她说，斯大林睡得很熟，但不是一般情况。我们决定最好去看看，并交待马林科夫，要他通知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他们在前一夜没有和我们在一起，还要通知医生们。”②

终于叫来了医生。

把斯大林抬到那个光线好一些的大房间，医生们和斯大林分开了。医生给我们说：‘这种病不能延长多少

①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340—342页。

② 同上。

时间，结果是要死的。’”赫鲁晓夫回忆说。

这些医生都是谁呢？谁也不认识他们。我们进一步看到的是，连阿利卢耶娃·斯维特兰娜也不认识他们是谁，她只认识在正常条件下应当立即到生病的斯大林身边来的人，那就是：医疗管理局局长叶果洛夫和跟他在一起的维诺格拉道夫，而斯大林的酒友苏联卫生部部长斯米尔诺夫，正当斯大林生病时，反而没有露面，换上了一个谁也不认识的特列齐亚柯夫。

赫鲁晓夫象戏弄斯大林一样，嘴里喃喃地说："为了使斯大林恢复元气，我们尽到了一切责任"，他说完之后，马特雷奥娜·彼得罗夫娜通知关于斯大林的情况，他们甚至没有走近斯大林身边，没有叫这些医生，就分头回家了。只有在斯大林处于没有希望的情况下，只有在给他脱衣服时，才叫医生（如果一般他们是医生的话）。

赫鲁晓夫继续说："唯一希望斯大林死的人是贝利亚，贝利亚公开嘲弄斯大林。"①

但是，赫鲁晓夫对另一个重要问题承认说："我和布尔加宁比其他人坦率……我问他：你知道吗？如果斯大林死了，将会形成什么样的局面？你知道，贝利亚想要什么职务？

"什么职务？

"他想当国家保安部部长，如果他当上了，那咱们

①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343页。

大家都要完了……为了不发生这件事，我们要绝对地不许他这样做。

“布尔加宁说，他同意我的看法，我们开始议论今后应当怎样做。我说，我把这一切告诉马林科夫，我认为他会同意我们的意见的。”①

如果说，赫鲁晓夫是很真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要真诚两倍：为了瓜分斯大林的政治遗产，还在斯大林临死的床前就开始了斗争，第一个牺牲者就被指定为贝利亚。但是，国家保安部部长的职务，他还是拿到了手。他轻而易举地拿到了这个职务，同时又弄到了内务部部长职务。

我们再转回来谈上述所讲的斯大林开始患病的时间。

老实说，当斯大林发病时是星期六，2 月 28 日这天，只有“四人团”来看望他。3 月 1 日星期天，“四人团”已离开了斯大林（赫鲁晓夫说，这两天是斯大林开始患病的日期），究竟是《政府公报》所说的 3 月 2 日夜里（公报上捏造了斯大林发生事情的地点，当然，时间也可以捏造）还是赫鲁晓夫给哈里曼所说的 3 月 2 日晚上呢？

一共提出了四个时间，很难确信哪一个时间是正确的，我倾向于 2 月28日这一天。因为，正象上述所讲的，3 月 1 日政权已落到“四人团”手中（客观证明材

①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344页。

料是：3月1—2日，《真理报》突然停止了反对“人民敌人”的运动）。但是，这些阴谋家隐瞒了非常重要的事（不只是隐瞒了人民，特别是隐瞒了党和军队），即：为了争取时间，无阻力地、顺利地完成政变，他们安排了斯大林的一切。既然阴谋家们要伪造无可指责的假象，那末，在斯大林患病的第二天、第三天、他们就把斯大林的子女和两个选中的政治局委员（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叫到死者床前，而向人民宣布的时间是第四天、第五天，斯大林的死已是确定无疑了。

现在，我们再谈谈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的回忆。她认为：斯大林不是死在莫斯科，而是孔策沃别墅。她和瓦西利被叫到死者面前时是3月2日，当时斯大林已经完全没有知觉了。她写道：“我从来不认识的、初次为他治病的医生们：在他周围忙得不可开交。他们把蚂蝗放在他的颈上和脑后，作心电图，透视肺部。一个护士不断地给他注射，一个医生不停地把病情记在本子上。一切都照该做的那样做着。人人都在忙于试图拯救一个再也不能挽回的生命”①。在这些医生当中阿利卢耶娃只认识一个女医生，她说：“忽然间，我发现好象认识一位年轻的女医生，可是，我在什么地方见过她呢？……我们点点头，什么也没有说”（回忆起这个女医生是非常重要的）。②

① 《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6—7页。

② 同上，第7页。

阿利卢耶娃对斯大林的观察是，当他恢复知觉时，完全不象赫鲁晓夫所说的那样。赫鲁晓夫说，他们到了斯大林那里，不一会儿，斯大林恢复了知觉，“那时，他开始和我们每一个人握手。”①

而阿利卢耶娃说：“濒死的痛苦十分怕人。大家眼看着这种苦楚把他闷死了。有这么一瞬间，……他忽然睁开眼睛，目光扫过站在他周围的每一个人。那目光十分可怕，显示出好象是疯狂，也许是愤怒……然而，一种无法理解的和可怕的情景出现了，至今我也不明白，但也不能忘记，他突然举起左手（是那只能动弹的手），好象指向上空某处（而赫鲁晓夫两次都重复说他指向那幅画着山羊和女孩的画），也好象威胁着我们每一个人。那手势是无法理解的，但是充满威胁，没有人说得出他指的是什么和指向谁……”②看来，这并不象赫鲁晓夫所描绘的那样，斯大林与战友告别时那样富有诗意，而是一种“愤怒的”、“威胁性”的告别。

但是，赫鲁晓夫和阿利卢耶娃对贝利亚的观察可以说基本上是吻合的。

阿利卢耶娃写道：“只有一个人行为举动几乎有失体统，那就是贝利亚。他激动万分，他那张本来就使人厌恶的脸，此刻因强烈膨胀起来的欲望而变得歪扭不堪。他有着强烈的欲望：他图虚荣、残暴、狡猾，他需

---

①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343页。

② 《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9—10页。

要权力、权力……在这责任重大的时刻，他竭力控制着自己不要狡猾过头，也不至于不到火候！……他走近病榻，久久地注意着病人的脸。我父亲有时睁开眼睛，但显然处于没有知觉状态……这时贝利亚一动不动地凝视着知觉模糊的眼睛，……当一切即将结束之际，贝利亚就第一个跳到过厅上。这时大厅一片寂静，人们默默地停立在死者临终的榻前，此时传来他那带着不加掩饰的胜利者的高嗓门：'赫鲁斯塔廖夫，来车！'贝利亚这号人在花言巧语的侍臣中是一个杰出的现代标本，在他身上体现了东方式的奸诈阴险，谄媚逢迎和口是心非，甚至连我父亲通常不易受骗的人，也被他所蒙蔽……有许多事情，我毫不怀疑是他狡猾地捉弄了我的父亲……人们怕他怕得要死。他们知道当我父亲弥留之际，在俄罗斯再没有人比这个可怕的人握有更大的权力和力量。"①

确实如此，斯大林死后，政权实际上落到贝利亚手中。现在斯大林已失去知觉，控制斯大林死活的权力，同样也掌握在贝利亚手中。赫鲁晓夫和阿利卢耶娃根据他们的观察，异口同声地说：贝利亚当然希望斯大林死，当斯大林快死时，贝利亚是那样地得意。现在我们再转到这一令人迷惑的问题——对斯大林，他们是否采用了斯大林为被捕的克里姆林宫医生们所使用的方法——作出错误的诊断，吃了禁忌的药。

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明人，他耳闻目睹斯大林

① 《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7—8页。

的死，断然确定：斯大林是被毒死的，斯大林被杀害了！这就是斯大林的儿子——中将瓦西利·斯大林。

从斯大林女儿那儿可以看出，她很早就开始对父亲的学说以及她周围所进行的苏维埃的现实持批评态度。但是，她没写过，她研究什么政治问题，或者她和父亲交谈过什么政治题目。为了忠实地保持高加索父权制的传统，看来斯大林没有和女儿谈过政治，因为在高加索和女人谈政治被认为是不成体统的，何况在最后的两三年内女儿很少到父亲那里去。

而儿子的情况则完全是另外一样。瓦西利·斯大林在战争一开始，就从空军学校毕业了。整个战争期间，他都是在前线度过的。他驾驶过战斗机，指挥过一个师和军团。战后，他在德国指挥过空军联合部队。后来，他被任命为莫斯科空军部队指挥员，参加过所有传统形式的莫斯科空军阅兵式。每逢节日的红场上，都是瓦西利·斯大林亲自指挥。当然，难道说除了拿破仑之外，二十五、六岁的军官不能当将军吗（他已象拿破仑一样了）？但是，瓦西利也同样被认为是例外，因为他是斯大林的儿子。斯大林的元帅们为了讨好自己的"上级"，在斯大林儿子面前奴颜卑膝，并以官衔和奖章大肆嘉奖他。但是，不管怎么说，瓦西利虽然爱喝酒，可是在战争期间谁也比不上他勇敢、无畏的精神，这位喷气式空军战斗机的驾驶员并没有让恐惧缠住自己。他的父亲斯大林在青年时期同样也是一个勇敢无畏的人，有一天他

发现儿子为他赴汤蹈火。由于他表现得忠心耿耿，因此，他就把瓦西利·斯大林中将从莫斯科军区空军司令员的岗位上撤了下来，是斯大林自己亲手把他撤掉的，象后来撤掉波斯克列贝舍夫和伏拉西克将军一样。

阿利卢耶娃看见撤掉瓦西利职务的原因完全是另一回事。她说："撤掉他在莫斯科军区的职务是1952年父亲亲自决定的。1952年五一节是个阴天，风很大，所以空军司令部下令禁止空军列队飞过红场。可是，瓦西利却擅自下令让空军飞过红场。结果糟得很，不仅不能保持队形，而且差一点撞在历史博物馆的塔尖上……着陆时有几架飞机坠毁……这是骇人听闻的违抗上级命令行为，……因此，父亲亲自签署了撤销瓦西利莫斯科军区空军司令员职务的命令。……"①

也许，阿利卢耶娃回忆有误。最低限度，根据《真理报》报导：1952年五一节在莫斯科是一个晴朗的天气，空军列队飞行是很整齐的，报上的照片证明，清楚、整齐的空军列队飞过了红场。《真理报》上写道："莫斯科在五月金色的清晨，从春日阳光的朝霞中醒来……有组织地进行隆重的检阅仪式。战斗的苏联空军出现了，象在红场上各军种体现的整齐、划一的行动一样。在喷气式战斗机的护航下，多数发动机的领航机，在闪光的阳光下飞过，这支空军近卫军列队仪式是由瓦西利·斯

---

① 《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197—198页。

大林中将指挥的。”①

如果有几架飞机坠毁，那也不是由于天气和瓦西利的原因，因为，看来，他自己乘坐的那架飞机还是正常的。也不涉及别的事情。五月一日进行阅兵式，而瓦西利被撤职是在夏天，似乎与阅兵式没有关系。瓦西利不象他父亲，显然，他是一个性情开朗、作风粗犷的人。他喜欢社交，在“基层”感到比在“上层”愉快，和父亲的区别是：他是一个热情的、好客的、善良的、开朗的、快乐的、好喝酒的、讨好女人、忠于朋友的格鲁吉亚人。因此，对贝利亚来说，策划一件反对瓦西利“生活上的事件”，那是太容易了。撤掉瓦西利的职务，对“阴谋家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他知道了反对他父亲的阴谋，他就会利用空军实力来反对他们。此外，瓦西利终究不是一个少尉，而是一个中将，在会见斯大林时，不仅可以和他谈及飞机问题，而且可以谈及政治和自己的困难问题、自己的猜疑、自己的忘恩负义的同事等等。“看看吧，孩子，你要注意，你在和谁打交道”。如果斯大林有时向某人透露一点隐秘：他对政治局中战友们的想法，那么，首先知道的就是全心全意忠实于他的这个儿子。父子之间的关系是正常的，瓦西利被撤职后，显然，他根据父亲的建议，进了总司令部的研究院。

瓦西利·斯大林和他的妹妹，关于父亲患中风一事

① 《真理报》1952年5月2日。

如上所述是在第二天、第三天才知道的，那时父亲已经不能说话了。在这种情况下，死者已经不能诉苦了。

但是，幽灵具有一种巨大的神秘性，好象有一种玄妙的力量，也许就是女儿内心的一种感情，指使阿利卢耶娃正是在1953年3月1日这一个星期天给将要死去的父亲打电话：

“我想三月一日星期天再去看他（到她父亲那里），但是，没有打通电话。”①

当然，是“打不通电话”！斯大林的所有电话线都掌握在贝利亚手中，所有电话线都被切断了，关于这一点阿利卢耶娃的证明具有历史意义。她继续写道：“1953年3月2日早晨，我被从科学院课堂上叫出来，要我去孔策沃……1953年3月2日，我哥哥瓦西利也被叫到父亲身边，他也在那挤满了人群的大厅里坐了几个小时。……他在服务人员的房间里，又喝酒、又大闹，破口大骂医生，大喊有人‘杀害了父亲’或正在‘杀害父亲’……”②

也许，阿利卢耶娃容易认为：哥哥的大吵大闹是由于喝醉酒的原因。但是，在举行葬礼的日子里，他完全没有喝酒，扶着父亲的棺木，站在莫洛托夫身旁，他又重复那句话“父亲被害死了”。阿利卢耶娃继续说：“父亲之死使他极为震动。他怕得要命，因为他确信父

① 《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195页。

② 同上，第195—196页。

亲是被‘毒死’或‘害死’的，他看到一个世界要毁灭了，失去这样的世界，他就不可能生存下去。……大丧期间，瓦西利的状态是可怕的，他的表现同样也是可怕的，他责怪所有的人，他埋怨政府、医生和一切能够埋怨的人，说医治有错误……他觉得自己是继承王位的太子。”①

瓦西利确信：他父亲是被害的，因此，他坚持地、多次地向每一个要听他说话的人重复那一句话，也许，瓦西利希望军队能袒护自己的“最高政权”，他这种确信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喝醉酒的人的瞎说。他知道很多事情，他知道这些阴谋家们“制造了斯大林的病”，他也知道他父亲已想好的咒语。这位勇敢的年轻将军知道父亲死的秘密，他可以打出军队的旗帜，甚至可以组织新的政变，反对篡夺父亲权力的人。因此，根据他的意志生活的日子就不多了。开始，尽量挽救他往好的方面转变。国防部部长布尔加宁召见他，并建议他到一个省军区去。但是，他拒绝了，希望留在莫斯科。后来他被降职、逮捕，并被送进以酷刑著称的现在的弗拉吉米尔监狱。这事发生在斯大林死后不满两个月的时间——1953年4月28日这天。他坐了七年监狱，最后死在1962年3月的喀山流放中。他的妹妹还认为他是死于酒精中毒，但是世界上还有更残酷的病症——那就是政治。他就是死于这种病症。

① 《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198页。

我们再看看官方材料是怎么说的。1953年3月4日，以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的名义发表的“政府公报”上说：

“3月2日夜晚，斯大林同志在莫斯科自己的住处暴发了脑溢血，斯大林同志失去了知觉，右手和脚瘫痪，并失去说话能力。”

关于斯大林身患中风这个消息是在第四天才广播的，因为斯大林真正患“中风”的是3月1日夜晚（参看赫鲁晓夫的上述说法）。看来，政府公报对于斯大林患病问题，这些阴谋家们没有和医生们商量，否则斯大林不可能先失去知觉，而后又说话。为斯大林治病的是由八位医生——医学院院士和教授组成的委员会。领导这个委员会的是苏联卫生部新部长特列齐亚柯夫和克里姆林宫医疗管理局新来的首长。公报说：“治疗斯大林病的过程是在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的经常观察下进行的”，也就是说，“有害治疗”这个问题被排除了。

3月5日和6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斯大林患病过程的消息，这些消息显然是利用了最好的医学教课书和大量令人费解的医学名词，有的还译成俄文。从表面上来看，斯大林患病过程以及断然采取的医疗办法，甚至使患者有时出现某些好转，但使人感觉到，斯大林的死已是定局了。

因此，3月5日，即斯大林死去这天的消息是在3月6日发表的，它说：

"11时半的时候，斯大林同志又一次严重虚脱，采用一系列相应的医疗办法也难以控制。但是，尽管总的病情是严重的，心脏跳动又有些好转"。一句话，虽然断然采取的医疗办法没有使斯大林死亡，但病情也到了致命的地步。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了。当时，这些"继承人"们奔忙到令人惊奇的地步：他们建立了一个由七人组成、由特列齐亚柯夫和库皮尔内领导、由专家教授参加的新的医疗委员会，在中央直接领导下，为斯大林的病进行正确的诊断，正确的治疗。委员会作出了权威性的结论："病理分析的结果完全证实了为斯大林同志治病的教授—医生们所做出的诊断是正确的。进一步的病理分析查明了斯大林同志自发生脑溢血开始，他的病就无法挽救了。因此，所采取的一切医疗措施都无法使其好转，也不能防止注定的后果。"①

这不是医生们，而是贝利亚及其同伙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预先取到的证明。他们深知：不仅是瓦西利·斯大林一个人认为是"他们谋杀了斯大林"的。但是，只要他们需要这种证明，他们就可以干。从1953年2月28日夜到3月1日的反斯大林的宫廷政变，和1801年3月11日至12日夜里所发生的反对和谋杀巴维尔一世的宫廷政变很相似。

那时是宫廷内部集团反对残暴的沙皇，而现在是斯

① 《消息报》，1953年3月7日。

大林集团反对斯大林。最终他们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宫廷阴谋家们发动政变是为了从暴君手中拯救俄罗斯，而斯大林分子是为了保住自己的脑袋。

反对巴维尔一世的阴谋家们，大部分人都倾向保留沙皇的生命，如果他能在自愿放弃宝座的宣言上签字的话（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巴维尔一世的儿子——亚历山大才同意了这次政变）；显然，反对斯大林的大部分阴谋家们，只要斯大林自愿辞去所有职务，他们也同样会保留他的生命。但是，贝利亚所想的是：在他们所策划的条件下，最好斯大林是死的。他可以引用他的前辈、反对巴维尔的阴谋组织者、彼得堡军事总督巴连伯爵在阴谋政变那天夜间给他的同伙们说的一句话："先生们，别忘记，不打碎鸡蛋，岂能摊成鸡蛋饼"，以此证明他无罪。

甚至在斯大林死后与巴维尔死后关于新世纪的公告都是相似的。古代俄罗斯国家自然继承王位的传统公式是：儿子按父母的遗言来管理国家。但是，在1801年3月12日的宣言中，亚历山大一世强调：要根据法令和去世的统治者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心愿"来管理国家。反对斯大林的阴谋家们在斯大林死后的最初的决议中就摈弃了他：藐视他的名字，决定管理国家将遵循"我党制定出的政策"，而不是遵循刚刚死去的"父亲、导师和领袖"的"英明指示"。因此，继承人预先防止了可能发生的"涣散和混乱"（其实，没有什么，很平静，什么

可怕的事也没有发生）。下边就是苏共中央代表大会全体会议、苏联部长会议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1953年3月7日所做的决议中相对应的地方：

“中央、部长会议和最高苏维埃在党和国家处于困难的时刻认为，党与政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证不间断地正确的领导……首先要求……不准许发生任何涣散和混乱现象，以便绝对地保证我党和政府所制定的对内对外政策的顺利执行。”

因此，在这份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关于继承王位问题的法律文件中，一句也没有谈到斯大林，没有提到按斯大林方式管理国家，而是提出要按“我们的君主”——党当年领导的那样去领导。

如果比较一下，巴连伯爵最后想的是：沙皇年幼，将由他掌管俄国；但是，亚历山大一世却革了他的职。推翻了斯大林之后，贝利亚想的是：借用“小沙皇”马林科夫的名字，把斯大林的俄国改变为贝利亚的俄罗斯。但是，其他人更狡猾使他见了阎王，因为他们所遵循的哲学也是“最好的敌人就是死的敌人”。

为了弄清任何一件历史事件的真情，不仅参加者的谈论是重要的，而且事实本身更为重要。历史上从来没有象在转折时期那样充满了谎言，而政治活动家们也从来没有象为了夺得政权那样厚颜无耻地撒谎。布尔什维克在这方面获得了首位的光荣，全世界都传遍了，阴谋家们如何紧紧抓住斯大林的生命不放，他们不仅在中

央全会的决议上小心地避开了他的名字，而且公开地给予他们所发动的政变以法律上的承认。1953年3月6日，斯大林的中央主席团25个委员，11个候补委员被这个主席团的少数派“四人团”解散了，又恢复了斯大林在1952年10月已经消灭了的、而且借故“医生谋杀案”想从肉体上完全消灭掉的老的政治局。

这些阴谋家们要完成这次政变还缺乏勇气，他们也很害怕公开宣布，因为他们想到：如果杀死了神，而不是假神，如果向人民宣布了他的罪行（象在三年后的第二十次党代会上所做的那样），军队一定会起来反抗，责骂自已的“最高领导”。“四人团”解散了中央委员会的书记处，赶走了斯大林在消灭老政治局时所依靠的对象——波诺马林科、勃列日涅夫、伊格纳捷夫、阿里斯托夫、皮戈夫。但是，阴谋反对斯大林的组织者、过去保安部的老部长留下了。又立即赶走了斯大林所依靠的军事小集团，撤了瓦西列夫斯基国防部部长的职务（为了装装样子，把他留做副部长，实际上已任命了失宠的元帅朱可夫为副部长）；调换了莫斯科军区司令员阿尔捷缅夫上将和莫斯科市的司令员西尼洛夫中将的职务。赶走和逮捕了以柳明副部长为首的国家保安部领导机关的全体成员（柳明直接参与了“医生谋杀案”的策划）。

在国内各大中心城市，凡是由斯大林个人的傀儡操纵的地方都进行了清理：在列宁格勒，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安德里亚诺夫不见了；在

基辅，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乌克兰中央第一书记米尔尼科夫不见了；在明斯克，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白俄罗斯中央第一书记帕多利切夫也不见了。

党和政府中的重要职位并没有落到那些被认为是斯大林的法定继承人手里（如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而是落到了阴谋家手里：马林科夫担任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贝利亚被任命为第一副主席和苏联内务部部长（内务部和国家保安部合并为一个部，称内务部），布尔加宁被任命为国防部部长（军事部和海军军事部合并为一个部），赫鲁晓夫成了苏共中央第一常务书记。为了造成法定的历史继承性，这些阴谋家们非常需要政治局的老委员们的名字，如列宁的同事、斯大林的战友们的名字。因此，他们也任命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但是，这完全是一种假相。“第一副主席”永远是第一位，贝利亚占据这一职务，在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的排列顺序上，贝利亚的名字紧紧地列在马林科夫之后。做为小道具的伏罗希洛夫被任命为真正小道具式的职务——“主席”，即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主席。

为了在党和国家面前再一次证明：斯大林是自然死亡，政治局全体为他的死而痛哭，并且举行了超过帝王的葬礼。赫鲁晓夫被任命为治丧委员会主席，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致悼词（前两者是两面派，后者是真心诚意的）。斯大林象法老王一样被埋葬在红场上

的坟墓内。

斯大林的女儿亲自看见了，在斯大林逝世那天，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流下了眼泪。对此我表示疑异。流泪不一定是由于痛苦，有时乐极也会生悲。

第十二章

政 变 前 后

如果说真的存在着反对斯大林的阴谋，那么应当认为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无论是从上层寡头政治所形成的条件，还是从客观政变的结果看）——问题是，政变本身是如何发动的？这仍然是克里姆林宫的绝密之一。很清楚，就象1801年发生的对巴维尔一世的谋杀一样，俄罗斯全国人民知道这件事，是在1905年革命之后，为时已历一百多年。这说明沙皇王室对继承权所发生的兴趣，不是以某个沙皇个人为转移的。

布尔什维克继续了地下秘密活动的制度，在还没有完全消灭斯大林主义分子之前，还不能允许接触“斯大林事件”的档案，因此，我仅根据苏联和西方的一些资料（从共产圈内部得到的材料）不得不提出疑问：“斯大林究竟是怎样死的”。

“二十大”之后，他们向全党公布了中央的秘密信，1956年初，报刊上发表了揭露斯大林的一系列文章。苏共和其他国家共产党员开始以写信和质问的形式

指责苏共党中央，“如果斯大林是个坏蛋，那么你们干什么去了；要知道，他没有你们，能做出什么事情？”党中央决定在一定时机加以说明。于是，苏共中央1956年6月30日做出的关于“克服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决议。在这一决议中，苏共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承认：中央反对斯大林的领导人（四人团）并没有坐以待毙，他们组织了对抗斯大林的力量。

第二十次党代会和苏共中央的全部政策，在斯大林死后，鲜明地证明了：在党中央内部有一个早已形成的列宁主义的领导核心。[①]这个领导核心并不包括斯大林本人，特别清楚的是，它的形成就是为反对斯大林的。因此，事实上他们已承认这是反对斯大林的阴谋，而关于它的手段是秘而不宣的（只是在斯大林逝世十年之后，赫鲁晓夫才略微揭开了它的内幕）。我们先分析一下西方报刊的说法：

第一种是依利雅·爱伦堡的说法。他当时是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喉舌，委任他这一任务，说明克里姆林宫想达到这样的目的：通过1956年6月30日中央关于克服“个人迷信”的决议，要人们了解：当时斯大林制造了“医生谋杀案”，中央领导人并没有束手就擒。爱伦堡将自己的看法告诉了法国的哲学家和作家让·保罗·萨尔图尔。这种说法在法国报刊上公布之后，世界各国的报刊都相继发表了这一消息。

---

① 《真理报》1956年6月2日。

把爱伦堡的说法简要叙述如下：

1953年3月1日召开了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卡冈诺维奇做了报告，要求斯大林：（1）成立客观的研究“医生案件”的特别委员会；（2）要求斯大林取消关于流放到苏联边远地区的所有犹太人的决定（建立新的“犹太人居住区”）。

除了贝利亚之外（？！），老政治局的所有委员一致支持卡冈诺维奇的意见。这一不寻常的、从未出现过的一致意见，向斯大林说明：他与这些预谋的案件有关系。斯大林失去了自制力，他不仅大发雷霆，并以镇压暴动者最残酷的手段进行威胁。但是，阴谋预见者——卡冈诺维奇代表政治局所做出的威胁性要求是同样对付的方法。他们也知道：如果仍然是斯大林掌权，不会使他们自由地走出克里姆林宫。因此，他们在预谋之前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米高扬曾将这一措施向狂暴的斯大林宣布了：“如果在半小时之内，我们不能自由离开此地，那么军队就要占领克里姆林宫”。宣布之后，贝利亚也离开了斯大林。贝利亚的背叛行为终于使斯大林失去了常态，加之卡冈诺维奇当着斯大林的面，将自己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的证件撕的粉碎，扔到斯大林脸上，斯大林没有来得及叫克里姆林宫的警卫，他大为震惊，立即失去了知觉。3月2日早晨六点钟给斯大林请来了医生。①

① 《世界报》1956年9月1日。

斯大林之后的党中央委员会让爱伦堡放这“一炮”，想达到一箭三雕的目的：首先，当斯大林要建立新的“犹太人居住区”时，他们并没有袖手旁观；第二，斯大林之死并不是他们没有过错；第三，贝利亚象平日一样和斯大林站在一起，但当贝利亚看到军队和他们在一起时，又转向了他们这边。这里我们发现，正如赫鲁晓夫后来所说的那样，爱伦堡也说：在斯大林患中风之后的第二天才叫医生来的。

一年之后，在1957年，克里姆林宫唆使苏共中央主席团过去的委员和苏共中央书记，后来曾做过驻荷兰大使的波诺马林科，在国外制造舆论。波诺马林科虽然只不过证明了爱伦堡的说法，但因为他是官方人士，是苏共中央委员，世界舆论就抓住了这一重大的轰动一时的消息。

这个消息的真相就是：在1953年2月末，斯大林召开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宣布了“医生阴谋”案件的供词——他们如何毒死党内著名活动家以及他们如何准备进一步行动的。同时，斯大林在苏共中央主席团内批准了关于流放所有犹太人到中亚细亚的政府法令草案。莫洛托夫与卡冈诺维奇指出：这种流放犹太人的法令将在世界上造成极坏的影响。斯大林勃然大怒，并谴责不同意他的方案的人。卡冈诺维奇再次发言，并且尖锐地、不妥协地、公开地撕碎了自己的党证（苏共中央主席团证件），当着斯大林的面，扔在桌子上。卡冈诺维奇最

后说："斯大林玷污了我们的国家！"大家都支持卡冈诺维奇与莫洛托夫。愤怒的斯大林突然失去知觉倒下了——他休克了。贝利亚非常惊慌并开始喊叫："暴君死了——我们自由啦！"但是，斯大林突然又睁开了眼睛，贝利亚好象立即跪下并请求斯大林宽恕（贝利亚所表演的这一场戏，已列人苏联许多蛊惑人心的传闻之中）。

向我们透露波诺马林科说法的这位作者问道："斯大林是自然死亡呢，还是象传说一再肯定的那样，他的继承人策划了反对他的阴谋？"①

据爱伦堡的话说，斯大林自己深信：政治局委员要谋害他。非常奇怪的是，就以后所发生的事实而论，简直是令人费解，斯大林自己对想象的阴谋家和真正的阴谋家也搞乱了。爱伦堡说："'十九大'之后，很清楚，斯大林产生了一种迫害狂，他准备进行一次巨大的、流血的清洗，想从肉体上消灭第十九次党代会产生的中央委员会。他在谈话中透露过：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要杀掉他。"②

斯大林这样的想法完全和他日常的行动以及对战友的态度是一致的。象我们看到的那样，斯大林公开谴责他们，说他们背叛了。

苏共"二十二大"之后，又重新提出了斯大林死的

① 维·亚历山大罗夫《克里姆林宫》第326页。

② 同上。

问题（不仅是赫鲁晓夫，而且其他苏共中央主席团新的委员在会议上也说过），难道说犯了这么多罪过的暴君，真的是自然死亡吗？

从已揭露的斯大林一系列奇怪的行为中（根据名单，不加审讯地大批屠杀老布尔什维克，甚至包括他们的妻子，直到杀害基洛夫的新的细节），可以看出，他的行为伤害了整个的党，在党内引起了愤怒。对这样的恶徒为什么不杀掉呢？

1963年赫鲁晓夫公开地说，人们愤怒的是斯大林为什么不早在十年之前就死去。他说："人们的说法是对的"。

正好在斯大林死后十年，从"二十二大"开始猛烈地宣传反对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敢于谈及斯大林死亡的某些细节问题。他是在波兰共产党活动家面前讲的。当时听众很多，也许赫鲁晓夫有意这样做，他所讲的某些新的细节被发表在《巴黎竞赛画报》杂志上，德国《明镜周刊》杂志（1963年第32期）后来又加上评论文章予以转载。

《明镜周刊》经过分析认为："一系列证据说明：斯大林无论如何也不象当时官方消息告诉我们的那样——是自然死亡。"

据赫鲁晓夫的说法，当时的事情是这样的：斯大林绝不是死在克里姆林宫的住宅内，而是死在离莫斯科84公里以外的，名为奥尔洛夫伯爵的旧别墅里（这就是孔策

扶别墅）。这里完全和外界隔绝，因为斯大林是一个“个人恐怖的俘虏”。3月2日晚上，斯大林的警卫人员很快地把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莫洛托夫叫来了（据我们所知，莫洛托夫不在他们当中，但是有布尔加宁）。警卫人员通知说：“斯大林已有好几个小时不省人事了”。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由于三个住处之间电话联系的复杂性，其中一处住着斯大林，只能由斯大林利用电器设备自己开门。因为一个警卫人员也不知道斯大林在那个房间，不得不把门一扇一扇地都打开。警卫人员发现斯大林在里边，不省人事地躺在地板上，还穿着大元帅服。第一个反映的是贝利亚，他说：“暴君死啦！死啦！死啦！”他胜利地喊叫着。此时，斯大林又睁大了眼睛，不！他还活着。马林科夫、赫鲁晓夫、莫洛托夫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剩下经常身带毒药针的贝利亚单独一个人站在好报复的主子面前，过了五个小时之后，才叫来医生（也许由于路上大雪的缘故）。

这就是赫鲁晓夫、波兰人、法国杂志上的说法。很重要的是，不久前（1963年3月8日），赫鲁晓夫接见苏联知识分子代表时，毫不含混地说：贝利亚对斯大林的死不仅是不隐瞒自己内心的喜悦，而且希望斯大林早死。如果对斯大林的死只有贝利亚那么感兴趣，为什么把贝利亚单独一个人留在孤立无援的重病的斯大林身旁，而且还带着有毒药的针？

我们在这两章里分析了关于斯大林最后时刻的五种

说法：（1）爱伦堡1956年的说法；（2）渡诺马林科1957年的说法；（3）哈里曼1959年的说法；（4）《巴黎竞赛画报》杂志1963年5月的说法；（5）《赫鲁晓夫回忆录》1970年的说法。还有第六种说法，即被恢复了名誉的老布尔什维克们的说法，这种说法是在目前不宜说明的特殊环境下得到的，因此，引证这种说法，正象前边的说法一样，我不好去证实它。

一些还活着的、被恢复了名誉的老布尔什维克们亲自参加了研究斯大林罪行的委员会（这些说法的某些作者对其中的某些人通过莫斯科和高加索了解得很清楚），他们首先发生兴趣的是：斯大林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死去的？

当然，老布尔什维克们的说法同样也会受到赫鲁晓夫的影响，赫鲁晓夫想从道义上在他们面前恢复自己的名誉：清除斯大林的倡议者是赫鲁晓夫，而贝利亚只能干些龌龊的事。

但是，分析斯大林之死，除去与“医生案件”有关的以外，我不想引用这种说法（“医生案件”这一部分已由客观证实了，请看下章），为什么呢？原因有两点：第一点，从外部想确定它真正发生的原因是不可能的；第二点，根据老布尔什维克的说法，某些地方有些受到赫鲁晓夫宣传的影响，从而他的说法似乎是完全真实的。（这一说法是我在1970年听到的，但它是和“二十二大”与赫鲁晓夫下台之间的时期有关。下述事实更加

证明它的真实性：1972年把我这一说法告诉了一位很了解苏共中央内部事务的人——科学技术委员会执行局主席罗曼诺夫，这也是他告诉我的，只是在细节上有些出入。我们得到这一消息是通过各种来源，在不同时间得到的。）

根据这一说法，2月28日——3月1日事件的发展，正象赫鲁晓夫所叙述的那样："四人团"会见了斯大林，他们友好地、愉快地进行夜宴，但会见完全不是斯大林提议的，而是马林科夫提议的，以需要事先听取斯大林对3月2日的部长会议的指示为借口。一周之前，斯大林命令苏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团，要求他们在三月中旬审理"医生案件"，并将"罪行结论"的抄件交给了他们。抄件上有苏联检察总长的签名。这份文件就是贝利亚的走狗、检察总长萨法诺夫为斯大林谈话所作的解释，它消除了对斯大林真实意图的一切怀疑。那么就是说，战时美国人不仅可以在克里姆林宫内的医疗管理机构，甚至可以在党中央（洛佐夫斯基）和保安部（阿巴库莫夫）内部建立自己的通讯点。英国人战前也是这样做的，而在战争时期又扩大了通讯网，从克里姆林宫内部争取了中央委员库茨涅佐夫、波普科夫、罗吉昂诺夫。至于军队除了二流指挥官（瓦西列夫斯基、戈沃罗夫、什捷缅科、科涅夫）注定被害之外，没有什么可说的。但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只有这些受委曲的司令员们，象朱可夫、伏罗希洛夫、尤马谢夫、波格达诺夫，

也许对这能有兴趣。对日丹诺夫和谢尔巴科夫被害发生兴趣的问题已经公开了。但是，大家都知道，贝利亚和马林科夫从来没有很好地跟他们相处过，如果斯大林真的杀害了日丹诺夫，那么他是借贝利亚之手杀害的，就象杀害基洛夫是假借雅戈达之手一样。

一句话，事情很清楚，“医生案件”，并不是事情的完结，就象在1937年许多政治局委员将要人头落地一样。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细致地研究了这一抄件，并根据赫鲁晓夫的建议，他们决定集体讨论。他们在莫斯科郊区森林中，以打猎为名讨论了这一问题（这四个大人物，从未谈过这个问题），他们决定：鉴于斯大林的健康状况，已不能再参加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建议他解除一切职务。但是，要知道，斯大林为了争取时间，他可以签署任何文件，然后，再消灭这些倡议者。赫鲁晓夫好象求助于贝利亚，他说，“怎么办？”

“拉甫连季·巴甫洛维奇！你在这方面是位专家，而我们是一窍不通，如果让斯大林活着，但又不让他干预党和国家事务，你说该怎么办？”

贝利亚明白了这一暗示，并明确地回答说：“把斯大林关起来，比让他自由更危险。如果不和他划清界限，就是他死后也会长时间地干预党与国家的事务”。然而，贝利亚任何具体建议也没有提出。

当马林科夫建议，迫使斯大林在广播和电视中宣布

辞职声明，然后把他放在索洛威茨岛上，与世隔绝时，贝利亚坚决反对说："放在那里，中国人出于同情，要解救他的；美国人出于好奇，会象在战争中德国人解放墨索里尼一样"。

但是，马林科夫的建议受到了鼓励。贝利亚说，他与契卡人员只能保证看守死的斯大林。赫鲁晓夫也这样想，但他想听听贝利亚的想法。

贝利亚的忠诚是毋庸置疑，因为，他自己的头颅也处在危险之中。马林科夫没有犹豫不决，他同意贝利亚与赫鲁晓夫的主张。之后，贝利亚被委以制定"清除斯大林"的计划，给这计划起一暗号叫"莫扎特"——借用普希金的诗剧《莫扎特与萨尔耶里》中的名字（从而约定好，并将使用毒药）。①

几天之后，贝利亚邀请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来到自己的别墅，听他刚从国外带来的古典音乐唱片，其中包括莫扎特的。当他们又一次在森林中散步时，贝利亚又给他们播放了两张莫扎特的唱片，他建议制定两个细致的计划："小计划"和"最理想的计划"。

"清除斯大林"的"小计划"规定，不要四人以外的人参加，选择斯大林约"四人团"到孔策沃进行夜宴

---

①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巧合，赫鲁晓夫从不引经据典，但在一次反对斯大林的讲话中，正好引用了普希金著作中一句名言："凶慝者不会是天才的化身"。

时执行，应给斯大林以致命打击，使他不要立即死去，但也不能再活了。斯大林死时，在他面前应有见证人，其中包括有他的孩子和医生。

“最理想的计划”规定在斯大林别墅进行爆炸。当时他正在睡觉（当然是白天），需要弄到伪装成食品的炸药，不仅炸毁斯大林住的地方，而且炸毁它周围的建筑，同时要消灭一切可以证明的多余之物。

“四人团”必须保证“小计划”取得成功，而“最理想的计划”则由贝利亚一个人负责。在这两个计划中都有先发制人的措施：以各种借口从莫斯科赶走那些明显倾向斯大林的支持者，特别是那些负责通信联络和情报的人（如联络部、广播与电视、塔斯社、《真理报》和《消息报》编辑部）以及国防部的某些著名领导人，包括国家安全部、内务部、克里姆林宫的卫戍司令部领导人。此时，“四人团”对最有希望的支持者（朱可夫元帅等人），应召唤到莫斯科。封闭一切通往斯大林别墅、克里姆林宫的住处和办公室的联络线路，在指定的时间内开始切断普通的和国家专用的电话线。斯大林别墅中的所有汽车、保卫人员、服务人员都在指定的时间内被控制住，通往别墅的所有道路，不管是陆地的还是空中的，对所有的人都封锁起来，包括中央主席团成员在内，“四人团”例外。

“四人团”的职责分工明确：贝利亚负责计划的“应变部分”，马林科夫负责动员党政机关人员，赫鲁

晓夫负责首都和交通，布尔加宁负责掌握军队动向。在行动之初，“四人团”宣布斯大林“身患重病”，然后掌管全部权力，直到他“完全恢复健康”，阴谋家们使自己的一切行动都合法化。

在这个说法中，最奇怪的应当是，“四人团”立刻确定了两个行动计划，并决定从“小计划”开始；一旦失败，马上采取已策划好的“最理想的计划”。如果阴谋得逞，这也是斯大林本人教给他们的（即“百发百中地打击敌人”）。

一切准备完毕之后，于1953年2月28日夜晚，“四人团”同斯大林在孔策沃别墅会见，谈了一些琐事，喝了大量的酒。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走的较早，但是，他们并没有回自己的家，而是到克里姆林宫去了。贝利亚象往常一样，借口要和斯大林商谈他个人的事。现在，在舞台上又出现了一个新人物——一种说法是一个男人，贝利亚的副官，另一种说法是一个女人，贝利亚的助手——告诉斯大林说：发现了与“医生案件”有关的反对赫鲁晓夫的骇人听闻的材料，贝利亚叫自己的助手取出一夹子文件。当贝利亚还没有来得及在斯大林面前打开文件夹时，这个女人用一种挥发性液体，大概是麻醉剂，溅在斯大林的脸上，斯大林立刻失去了知觉，她在他身上注射了带慢性毒药的药水。当次日为斯大林“看病”时，这个女人又作为一个医生出现了，她又一次给斯大林注射了同样药量的针剂，以致让斯大

林不是立即死亡，而是慢慢地自然死亡。

这是“老布尔什维克们”的说法，它使人想起，阿利卢耶娃在书中提到，站在已死去的斯大林病榻旁，有一个神秘的女医生，“年轻的医生们只是目瞪口呆地望着周围发生的一切……忽然间，我发现好象认识一位年轻的女医生，可是，我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呢？我们点点头，什么也没有说。”①

我想，弄清楚在贝利亚身边这个女医生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最有意思的是，阿利卢耶娃在斯大林死之前曾在什么地方见过她，在斯大林死之后是否又见过她？

更有趣的是索尔仁尼琴提出下述意见，与分析这一说法有关系。他说：“有一种迹象，在斯大林死时，贝利亚是惊慌失措的，也许正是经过他的手，杀害了斯大林。”②

斯大林时期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两个成员和一个作家所说的看法，有三点是无法使人改变的：

第一，斯大林死时只有政治局的四个人在场——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

第二，只是在第二天才给斯大林请医生；

第三，对斯大林的死只有贝利亚一个人兴高采烈。

由此，从逻辑上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

一，虽然斯大林的病症十分严重（失去知觉），在

① 《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7页。

② 《古拉格群岛》，第一卷，第166页。

“四人团”还不敢确定斯大林必然要死之前，却故意不给他叫医生；

二，既然安排叫医生一事由贝利亚一人负责，很显然，叫来的人必然是执行他的意志，使斯大林死得更快的人。

看来，这些医生和克里姆林宫的医疗管理局没有任何关系，最低限度，阿利卢耶娃对他们一个也不认识，而赫鲁晓夫说，他只认识其中一个，是卢克姆斯基教授。不是所有叫来的医生都给斯大林做检查，而是让他们坐在隔壁房间里，象阿利卢耶娃所说的那样，讨论如何为斯大林医治问题，由另一个医生宣布斯大林的病历和病症，除贝利亚之外，谁也不认识这个人。

还可以从两个方面假设斯大林发病的原因：

第一，在向斯大林宣布对“医生案件”将诉诸武力时，斯大林受到了打击；

第二，贝利亚给斯大林放上了慢性发作的毒药。

简而言之，斯大林的死亡，是由于政治局的打击，还是由于贝利亚的毒药呢？对于这两种说法（爱伦堡的和波诺马林科的），在“二十二大”（1961年）之前一直认为：斯大林的死因是由于受到打击后而过分激动所造成，没有谋杀的迹象；只是在“二十二大”之后，才出现了关于斯大林死因的新说法——使用毒药（如上所述）或者采取其他谋杀手段（如下所述）。

关于斯大林被谋杀的可能性，是因为斯大林有东方

暴君所固有的复杂心理，他最害怕毒杀。斯大林对政治局任何一个委员都认为是潜藏着的放毒者。当赫鲁晓夫和同事们坐在桌子旁边时，他总爱说些奇闻逸事。他说，斯大林以各种明显的借口开始强迫他们每一个人把所有端上来的菜都尝一尝，大家尝过之后，他才开始喝酒吃菜。但只有贝利亚一个人不先尝味，他只吃一些青菜，而且是自己带来的。①这对贝利亚来说，并不是真实的（据赫鲁晓夫前边的说法，斯大林能预料到贝利亚的一切卑鄙手段）。看来，赫鲁晓夫这样说是为了证明贝利亚比斯大林本人更为狡猾。

既然斯大林最害怕谋杀，他就表现的十分谨慎小心。他特别注意防护自己的小碉堡——别墅，不仅在食物中，而且在空中都千方百计地防止有人放毒。"送到斯大林餐桌上的都是专门供应的，从养鱼池、野鸡、羊羔养殖场运来的，专门酿酒厂制造的格鲁吉亚葡萄酒、新鲜水果都是用飞机从南方运来的。他根本不知道，经常端到他餐桌上的东西，需要花费国家多少钱……《基地》存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使专门医生把所有从御缮房中端来的菜饭都要经过化验，检查是否有毒，面包、肉和水果都要经过专门检验措施，包装纸上还盖有防毒化验的责任图章和签字：'未发现毒物'。在我们的克里姆林宫住宅里嘉可夫医生有时拿着试管并检验所有房间的空气"。②

①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321页。

② 阿利卢耶娃《仅仅一年》，第335—336页。

但是，如果贝利亚想谋害斯大林，这些预先采取的措施根本不起任何作用，更何况"内部办公室"的波斯克列贝舍夫已经没有了，伏拉西克将军，以及斯大林的医生都没有了，斯大林之所以还活着，那只是由于贝利亚的恩赐。

"斯大林问题"对贝利亚来说，原则上已经解决了。对他更重要的是另一个问题——得到莫洛托夫分子中立友好的关系和"契卡"成员们的积极支持。赫鲁晓夫不否认：贝利亚善于挑选那些受斯大林气的人。他说："贝利亚善于笼络人心。那些在斯大林面前遭难的人，他可以利用来进行阴谋诡计。"①

反对斯大林的政变过程与结局证明："网罗那些失宠于斯大林的人"，这种手法获得了出色的成功。斯大林在垂危之机，身旁竟无一人，不管是"老近卫军"——莫洛托夫分子、那个最忠实的"掌握武器的人"——波斯克列贝舍夫还是负责生活的宫廷警卫伏拉西克、他的儿子瓦西利，甚至连他的私人医生维诺格拉道夫也不在身边。在他死时一直守灵和治丧的是贝利亚及其三个同伙：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他们不但背叛了斯大林，背叛了贝利亚，也背叛了他们自己。

他们为什么和怎样背叛了斯大林——关于这一点有两个特别重要的官方证明材料，其中之一（来自米高扬）是恩维尔·霍查说的。

①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95页。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霍查和莫斯科的关系最好，直到苏联共产党召开“二十二大”之前。一般说来，他唯一的缺点是：他是一个坚定的斯大林主义分子，而在莫斯科，这类人早已没有了。在赫鲁晓夫时代，由于对斯大林不断地批评，促使他考虑到：斯大林这些继承人的批评是否存心不良，他们是否采取了罪恶手段，想以颠倒日期的办法掩盖其罪行？在苏联共产党和东欧共产党人中间强烈地想弄清真实情况的时候，霍查得出这样一个可怕的结论：“苏联的领导人都是些阴谋家，他们厚颜无耻地公开说（象米高扬那样说的），为了杀掉斯大林，他们秘密地策划阴谋”。这是霍查在1964年3月24日讲话中说的。①

既然真相大白了，毛泽东也以霍查的话来指责莫斯科。莫斯科对这一问题不能不回答，不能不说明，为什么这些斯大林分子杀害了斯大林。只是在1964年7月19日迎接以亚诺什·卡达尔为首的匈牙利党政代表团大会上，赫鲁晓夫才回答了这一问题，（选择的日期和代表团成员都不是偶然的。卡达尔曾根据斯大林的命令被逮捕过，经受过非人的审讯，他之所以能活下来，就是由于斯大林死了）。这个讲话通过直接广播传达到全国，并通过国际广播传达到整个东欧。赫鲁晓夫在听众面前承认了苏联的独裁者是强制致死的，他说：

“斯大林枪杀了自己人，枪杀了革命的老战士，为

① 康奎斯特，《大恐怖》，伦敦，1971年出版，第172页。

此，我们声讨他的专横……谁要是想改变国内领导，并想为斯大林所犯下的罪行辩护，那他是徒劳的。谁也不能开脱他的罪责……黑狗怎么洗也变不了白颜色（掌声……）。在人类历史上曾有许多暴君非常残酷，但是，他们都是死于刀斧之下，正象他们自己用刀斧掌握政权一样。"[①] 关于暴君的上述这段话在《真理报》和《消息报》发表时删掉了，但是，欧洲和苏联上百万的人都已经听到了。关于借助刀斧掌权和死于刀斧之下的暴君这段话是指向斯大林的，并且是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人、政府、军队、警察、全国以及全世界人民面前讲的。

斯大林死之谜不在于他是否是被害的，而在于是怎样发生的。在两者必择其一的情况下，应当让谁死——是斯大林还是政治局全体成员——政治局委员们选择了前者。

---

① 莫斯科广播电台，1964年7月1日、19日，欧洲中部时间11点55分，《自由》电台记录广播。

第十三章

贝利亚的末日

消灭犯罪痕迹，装出与事无关和不在现场的样子，是每个凶手的本能。凶手的文化素养越高，做起这类事来也越高明。但是，只有握有绝对权力的凶手才能编造出自己绝对无辜的谎言。为消灭罪迹，他们往往搞一系列新的谋杀：证人、执行者、死者的近亲挚友都会永远失踪。只有斯大林和他的学生们在组织对个人、集团、阶级甚至整个民族进行政治谋杀时，才破天荒地把谋杀变成一门特殊的犯罪艺术，事先就制造好了谋杀与自己无关的假象。

斯大林逝世后，贝利亚立即对那些“知道的东西太多了”的人下了手。除了贝利亚的同谋者，还包括：1，两个医生委员会——斯大林的“治疗委员会”，证明医疗“无误”的委员会；2，孔策沃别墅斯大林的警卫人员和服务人员。

斯大林死后，两个委员会的多数医生都去向不明。其中一位参加过解剖斯大林遗体的医生——鲁沙柯夫教

授“突然死亡”。负责斯大林医疗工作的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管理局被撤销，局长库别林被逮捕。领导两个委员会的苏联保健部长特列齐亚柯夫被撤职。与库别林同时被捕的还有委员会的两位医生，他们都被送到沃尔库塔。库别林被任命为集中营医院的主治医生。①

数年后才给他们恢复名誉。这表明，不仅贝利亚一人，“四人团”都想消灭罪迹。

贝利亚对孔策沃别墅斯大林的警卫人员和“仆人”，也采取了断然措施：他们不仅是斯大林身边所发生的一切事件的见证人，他们显然还向斯大林的儿子瓦西利讲了贝利亚的“医生”怎样治死了他的父亲。

如象1953年3月4日的“政府公告”所说，斯大林是“在党中央和政府的经常照护下”正常死亡的，那末孔策沃就不会发生那些曾被斯大林的女儿描述过的“奇怪事件”。不过，她也没有讲明发生这些事件的原因是什么。

“父亲一死，奇怪的事就在孔策沃发生了。这个家的主人去世的第二天，——葬礼还未举行，贝利亚就把这所别墅的全体服务人员和警卫人员集到一处，吩咐他们立即把父亲的遗物全部运走（不知运往何处）；所有的人都得离开这个地方。谁也不能和贝利亚争辩。他们惘然若失，一点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含着眼泪收拾起各种物品、书籍家具和餐具，把它装上卡车。东西都

① 威特林，《政委》，第387页。

被运走了，大概是送往某个仓库去了……那些忠心耿耿地在这里工作过十年、十五年的人们都被推出大门，被赶走了，赶到不知去向的地方。警卫部队的军官们被调往其他城市。其中有两个人在这些日子里开枪自杀。人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不明白他们犯了什么罪，为什么和他们过不去”。①

贝利亚也可以象斯大林那样回答说，他们“知道的东西太多了”，因此要把他们分散到遥远的城镇，在那里悄悄地、不经审讯地干掉他们。懂得这一点的人，不等镇压，就先自杀了。

最后，还有一批见证人，即贝利亚的同谋者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这些人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但他们毕竟是极重要机构的代表。马林科夫代表国家官僚集团，赫鲁晓夫代表党机构，布尔加宁代表军队。贝利亚准备象对待所有尊敬自己的强盗那样对待这些人：平均分赃——权力。在斯大林“医疗”期间，他们都是次要角色。斯大林死后，他们从贝利亚手中得到了合法的党政权力，但在克里姆林宫的排列顺序中保留一项未公开的条件：贝利亚同意担任可支配第一把手的第二把手。

在发生政变时（莫斯科当时被贝利亚的警察部队包围并占领），贝利亚很容易取得斯大林的一个职位：或政府首脑，或党中央首脑，甚至把两者同时拿到手。赫鲁

① 《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21—22页。

晓夫说，贝利亚在四十年代、五十年代（斯大林死后）两次玩弄阴谋，想当党和国家的首脑。① 如果说他放弃了这种念头，可能纯粹出于心理上的考虑：在斯大林这个格鲁吉亚人做了二十年的苏联暴君之后，另一个格鲁吉亚人要占据他的位置就必须做斯大林第二。对这种前景，贝利亚也畏葸不前。

另一个较为重要的原因是，贝利亚是职业契卡，在人民的心目中，他不是斯大林的奴仆，而是主动的同谋者，甚至是斯大林犯罪行为的挑唆者。如果贝利亚能公开声明："我生了他，又杀死了他"，那么很难预测事情将会怎样发展。我们有充分根据认为，他曾打算这样做，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准备象赫鲁晓夫那样采取行动。

贝利亚不仅是一个警察，而且是比他的同事高明得多的政治家。他知道斯大林之死结束了整个时代，今天要想成为伟大人物并成功地进行统治，只有反对斯大林。的确，用刺刀能够取得国家，但用刺刀却不容易治理国家。我认为，"刹慢车下坡"可能是贝利亚的政治纲领。

当然，仅仅根据苏联官方反对贝利亚的材料，或仅仅知道贝利亚是近二十年来国家最高的严刑拷问者，就很难想象他怎么会变成一个与他本人完全相反的人。在政治上变化无常，并不奇怪。列宁早就预言过他的学生

①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二卷，第95页。

们可能发生蜕变："历史上有过各种各样的质变；信念、忠诚和其他优秀的精神品质，在政治上完全是不关紧要的东西。"① 事情果真是这样，正如墨索里尼所说，"布尔什维主义蜕变成了斯拉夫法西斯主义。"

列宁死后，党曾提出一个口号："列宁虽然逝世了，但要坚持列宁的道路。"这个口号提得好。因为列宁废除了"军事共产主义"，推行新经济政策；维护苏维埃制度，限制国家政治保安局的权力；在艺术领域允许不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建立创作协会；允许同私人出版社发生联系；与"无产阶级文化派"做过斗争，曾同"路标转换派"勾勾搭搭，许诺过恢复一切自由和权利（见《党纲》）。后来，他离开了人世。全国人民都同意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现在可否向人民说，"斯大林虽然逝世了，但要坚持斯大林的道路"呢？根据秘密警察送来的源源不断的情报材料，贝利亚比政治局任何一个委员都更了解人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人民如释重负，普遍希望变革。贝利亚十分清楚，只有利用这种情绪才能取得成功。

贝利亚决心领导这场变革运动，但他不是出于对人民的热爱，也不是出自对斯大林的憎恨，更不是出自对所犯全部罪行的懊悔，而是出自在新条件下的一种政治考虑和私利。热月政变分子杀害罗伯斯庇尔，根本无意把断头台送进博物馆，但是当他们看到人民得知恐怖的

① 《列宁全集》，第33卷，第253页。

主宰者已去世时是如何欢喜若狂，就决定利用这种机会，领导了争取人道主义的运动。当贝利亚站在生命垂危的导师身旁时，或许还没有想到改变斯大林的统治，但人民群众在暴君死后表现出来的沉默、令人生畏的喜悦，使他茅塞顿开：需要利用这个历史上罕有的机会，刽子手也可领导人民进行反对头号暴君的运动。三年后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1956年）上所做的事，贝利亚现在就想动手。他真地干起来了。1953年4月4日，他释放了“危害分子医生”，甚至还谴责起斯大林与贝利亚的警察机构制造假案和严刑逼供的行为。

人们错误地把非斯大林化和反对“个人崇拜”同赫鲁晓夫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联系在一起。其实，反对“个人崇拜”的提法是在斯大林去世三个月后第一次出现的，那时贝利亚实际上已成为全国的统治者。1953年6月10日，《真理报》发表一篇不署名的文章，题目是《共产党是苏联人民的领导力量》（无疑是根据中央主席团的决定发表的）。文章写道：“早已被党谴责的关于群众、阶级、政党作用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残余、个人崇拜的成分，直至今天还见于我们的宣传工作和某些书刊上。”文章指出，“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力量在于它的集体制”，“我们党的政策实质，在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的演说中已有所阐述”。

贝利亚的这个隐晦的反斯大林纲领，无疑得到了马林科夫的赞同。然而，赫鲁晓夫反对这个纲领，因为它

将提高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声望，不利于他的沽名钓誉的计划。赫鲁晓夫这时还没有自己的纲领，他对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结成新的“三套马车”感到不满。

苏联作家尼·西佐夫曾写道：“斯大林死后，一切都还没有走上轨道。马林科夫做了国家首脑，辅佐他的有莫洛托夫和贝利亚。全国和全党对他们有各种看法。人们知道，莫洛托夫是党的一位老资格活动家，他冷漠无情，怀疑心重，有一种慢吞吞的官僚主义作风，人们对他并不放心。至于马林科夫，有人说他是一个出色的组织者，可是扎格拉金（小说中影射赫鲁晓夫的人物——作者注）说：

‘胡说！除了公文和勋章，他什么也没有见过，简直一窍不通！’

可以说所有的人，至少绝大多数人不喜欢贝利亚。他那微黄的四方脸，夹鼻眼镜后面那双眯得细长、射出冷酷目光的双眼，不禁令人望而生畏。可是对于这一切，人们甚至不敢窃窃私语。人们在心灵深处不时涌现一种想法：需要这样吗？党和国家的权力需要掌握在他们手中吗？”①

赫鲁晓夫也和斯大林的所有门徒一样，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什么纲领，斯大林的纲领也好，反斯大林的纲领也好，重要的是政权，是从“那些人手中”夺回“党

① 《十月》1964年第4期，第109页。

和国家的政柄”，把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我们知道，赫鲁晓夫后来实现了这一目的，因为他的同事都没有想到他能胜任这种任务。

党似乎重演了同样的历史：列宁在世时，一致选举斯大林担任“总书记”，大家认为他“是一个不爱讲话的人”，没什么才华，因而都想利用他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在推选赫鲁晓夫任第一书记时，人们大概也是这样想的：他是个庄稼汉、笨蛋、党的一枚螺丝钉，可以象二十年来斯大林使用过他那样，让他为我们服务。不料这个“笨蛋”，却是一个大怪物。他实现了斯大林想实现而未能实现的愿望：用马林科夫和马林科夫分子的手肃清了贝利亚和贝利亚分子；用莫洛托夫和莫洛托夫分子的手肃清了马林科夫和马林科夫分子；又用“被提拔上来的人”——勃列日涅夫之手搞掉了莫洛托夫和莫洛托夫分子。这个被人们叫做“小傻瓜的伊万诺什卡”，竟统治这个伟大的国家达十年之久，真是个足智多谋的庄稼汉！

现在言归正传，谈一谈贝利亚和“个人崇拜”。我们从党的生活中已找到有力证据，说明最早推行“非斯大林化”方针的是贝利亚。三月的悼念活动刚刚结束，斯大林的名字就逐渐从报刊上消失。《斯大林选集》不再出版，最后一卷是第十三卷。已交付印制的下两卷（第十四、十五卷）已停印，后来干脆把版毁掉了。如果说四月、五月的《真理报》社论还出现过斯大林的名字，

那末后来整整一个月（从五月底至六月二十九日），斯大林的话只被引用过一次。可是贝利亚被捕后，仅在一周之内，斯大林的话就被引用过十二次，而且都加上了最高级形容词。在一篇未署名的文章中，一位热心的研究者就这一点写道：

“贝利亚可能比他的中央主席团的同事更清楚和更富有远见，他清楚整个制度（斯大林的制度——作者注）注定要失败，所以最好的出路是掌握主动权，推翻这种制度。即使如此，我们也有充分根据说，在1953年，贝利亚一个人还不能搞起非斯大林化运动……根据种种迹象可以推断，马林科夫是党内比较温和的自由主义派，赫鲁晓夫当时还反对搞非斯大林化。”①

众所周知的一些事可做证明：1，贝利亚下台后，赫鲁晓夫的地位得到加强（9月赫鲁晓夫任第一书记），相反，马林科夫的地位被削弱了；2，《真理报》确定了“崇拜斯大林”的新方针。在反对贝利亚的非斯大林化方针以及马林科夫在经济中优先发展轻工业的自由化方针中，《真理报》总编辑谢皮洛夫成了赫鲁晓夫的同盟者。（1953年8月，马林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提出“急剧提高”消费品工业的纲领，因而在全国提高了声望。赫鲁晓夫对此惊恐万分。）

根据非斯大林化的纲领，贝利亚开始修改臭名昭著

---

① 《贝利亚案件的新材料》，1972年1月27日，《自由》电台电讯稿。

的“斯大林民族政策”。

外界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医生案件”上，而各加盟共和国和各自治共和国里发生的几十起“民族主义案件”都被人们忽略了。这些案件都是按照三十年代的模式制造出来的：在苏联各民族共和国都有一批残暴的匪徒“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他们阴谋使各加盟共和国脱离“兄弟般的大家庭”。全体俄罗斯人不断遭到愚弄（在二十年代），现在“老大哥”又拾起帝国的大棒向弱小民族挥舞。斯大林不过是给尼古拉一世的乌瓦罗夫伯爵大臣的三位一体制度赋予了现代内容：布尔什维克的专制制度、马克思主义的神学和官方的人民性。因此，各非俄罗斯民族的全部历史都由伊洛瓦依斯基①改写了，而犹太人的“小兄弟”权利也未被承认，斯大林指定西伯利亚某一腹地做为“犹太人居住区”。大国沙文主义者的傲慢态度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波贝多诺斯采夫②和普利什凯维奇③的遗骸该搬进列宁和斯大林的陵墓了。

在贝利亚领导下，苏维埃帝国的宪兵很容易和格鲁吉亚的沙文主义者和睦相处（根据贝利亚的指示，切禅

① 季·伊·伊洛瓦依斯基（1832—1920），俄国帝制派反动历史学家。——译注

② 康·彼·波贝多诺斯采夫（1827—1907），俄国反动政客。——译注

③ 弗·米·普利什凯维奇（1870—1920），俄国反动分子，大地主，君国主义者。——译注

人、印古什人、巴尔卡尔人、卡腊查耶夫人被驱逐出境，切禅山区和厄尔布鲁士山区被并入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贝利亚心里一清二楚，苏维埃帝国的弱点不在于它被虚构的帝国主义包围，而在于它处在被它征服的俄罗斯边境地区各族人民以及东欧各仆从国人民的双重包围之中。贝利亚想恢复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由本地居民的代表组成党和国家的机构，使用民族语言办理公务。1953年6月12日根据贝利亚的报告，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决定，旨在实现上述目的。决定中说，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

1，要求所有党政机关从根本上改善各民族共和国的情况，结束对苏维埃民族政策的歪曲；

2，组织培训和大量提拔本地民族干部担任领导职务；改变不从本地人中提拔干部的作法；超编和不懂地方语言的干部由苏共中央另行分配；

3，在各民族共和国使用本民族语言、地方语言办理公务。①

事情不限于这些决议。各民族共和国都开始废除"第二书记制"。斯大林是这种制度的创始人，其内容可概括为：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由"本地人"担任，第二书记由莫斯科直接委派的俄罗斯人担任。这些人既不通晓本地人民的语言，也不知道本地人民的历史

① 《地下出版物文献资料》，《自由》电台出版，第1042期，第8页。

和文化，其实他们也无需知道。他们是莫斯科派来反对“分立主义”的耳目。只有地地道道的唐吉呵德式的地方第一书记才自以为是第一书记（例如，土库曼的巴巴耶夫、阿塞拜疆的穆斯塔法耶夫、达格斯坦的达尼亚洛夫、格鲁吉亚的姆日阿瓦纳泽。中央因此解除了他们的职务）。其实，“第二”才是“第一”，名义上的“第一书记”，不过是“民族装饰品”而已。这种情况无人不知，也都习以为常了。在各民族共和国里，过去和现在有一些职务只能由俄罗斯人或已俄罗斯化了的人担任，例如军区司令、警备司令、边防军司令、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内务部长、铁路和民航局长、共和国邮电部长、共和国一级大企业经理、中央各主要部的部长，等等。

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各部第一副部长（如果部长是非俄罗斯人）也必须由俄罗斯人担任。在被沙皇俄国征服的地区（高加索、土库曼、波罗的海沿岸），重新树起了沙皇将军——征服者的纪念碑（二十年代已拆毁），而那些民族历史上的英雄人物都一律被斥为“反动分子”和外国“间谍”（例如，伟大的伊玛木·切契尼和达格斯坦那·沙米尔，为维护弱小的祖国的自由，曾同大俄罗斯持续战斗了二十五年）。

贝利亚十分清楚，大概也说服了其他人，为维护党的利益，需要废除这种荒诞的大国主义政策，党政机关应当采取使用本民族干部的方针。首先从乌克兰和白俄罗

斯实行起，那里连中央第一书记也是俄罗斯人：在乌克兰，乌克兰人基里钦科接替了麦尔尼科夫；在白俄罗斯，白俄罗斯人齐米亚宁接替了帕托利切夫；在拉脱维亚，拉脱维亚人克鲁明什接替了中央第二书记叶尔绍夫。

6月26日，贝利亚被捕，其他加盟共和国还未轮到更换领导人。他的罪行之一是把赌注押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身上，并列举了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拉脱维亚的事例。

斯大林的民族政策在边境地区没有什么改变，依然如故，甚至今天的情况比过去还糟。斯大林时期，两个加盟共和国（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的中央第二书记不是俄罗斯人，现在青一色全换上了俄罗斯人。俄国沙皇和他们派到俄国边疆地区的总督们直言不讳地承认，他们是大国主义者，可是他们没有推行同化非俄罗斯民族的政策。自称"国际主义者"的政治局委员们，却推行一种有计划地灭绝种族的政策，要消灭苏联各民族的民族特性。

地下出版物刊登过一篇流传很广的题为《十七个拉脱维亚共产党员的信》，它讲述了列宁宣布的民族自决权的实际状况。

"列宁主义在我们国家成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保护伞……我们确信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是苏共领导奉行的方针，而强迫同化苏联境内各少数民族已成为一项最为迫切和极为重要的国内任务……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对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爱沙尼亚人以及苏联其他少数民族，开始实行强迫同化政策，尽管这种作法与马列主义原则背道而驰……在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机关工作的人员中，拉脱维亚人仅占百分之四十二；在党的市和区的委员会中，仅占百分之四十七。在里加市委各部部长中竟无一人是拉脱维亚人；在三十一个指导员中，仅有两个拉脱维亚人……在基层组织书记中，拉脱维亚人仅占百分之十七……1953年（列宁逝世后唯一的一次）公开承认我们国家粗暴地歪曲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① 上述决议虽然没有宣布废除，但已完全束之高阁……不仅如此，各民族共和国更加坚决、彻底地推行起强迫同化少数民族的纲领。”②

写信人在谈到怎样推行这一纲领时，说：

“首要的、基本的任务是，从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向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尽可能大量地移居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苏共中央不信任各民族共和国的中央委员会……这些职务（中央第二书记和中央干部部长）留给中央派来的俄罗斯人担任……为保证数量庞大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来这里工作，建立了各种机关和一批与发展经济毫不相干的大企业……结果，1970年拉脱维亚人在拉脱维亚占百分之五十七，在首都里加占百分之四十。在内务部近一千五

① 1953年6月1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

② 《十七个拉脱维亚共产党员的信》，第4页。

百人中，拉脱维亚人大约有三百人……半数以上（百分之五十一）的商业人员不懂拉脱维亚语。在领导层中，拉脱维亚人仅占百分之二十九。百分之六十五的医生不懂拉脱维亚语，因而常常误诊。”①

下面谈一谈怎样推行俄罗斯化：

“共和国约三分之二的电台和电视台使用俄语播音……半数期刊用俄语出版……**在共和国、市、区以及多数地方组织和所有企业都使用俄语办公**。开会时使用俄语。有许多单位绝大多数职工是拉脱维亚人，但哪怕只有一个俄罗斯人要求会议使用俄语，也得满足他的要求；如不接受，就会被指责为民族主义……在拉脱维亚（库尔杰麦、杰姆加列、维杰多等农村地区除外），专供拉脱维亚儿童开放的儿童设施和学校已寥寥无几。高等学校的很多课程用俄语讲授。竭力宣扬拉脱维亚男女青年与俄罗斯人通婚。在食堂、咖啡馆、餐厅，很少出售本民族的饭菜……对文学遗产采取两种态度：俄罗斯古典作家的作品大量出版，相反，拉脱维亚作家的作品很少印制……里加有六个行政区，竟没有一个区取本地名称。里加有以列宁、基洛夫、斯维尔德洛夫、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里、高尔基以及沙皇总督的名字命名的街道，但是阿斯巴吉雅斯（拉脱维亚最著名的女诗人）林荫路、瓦利杰玛拉（拉脱维亚教育家）大街都改了名。在里加不仅保存列宁住过的房子，还保留着俄国

① 《十七个拉脱维亚共产党员的信》，第4—6页。

皇帝、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征服者彼得大帝住过的房子……无论哪一个拉脱维亚剧院、歌舞团、乐队、合唱团，如果上演的剧目或节目中没有俄罗斯戏剧或歌曲，就不会被批准演出……”

拉脱维亚的共产党员们还讲到他们的父兄在为建立列宁政权的斗争中所起过的作用：

“众所周知，在十月革命时期，拉脱维亚的射手发挥了很出色的作用。在最危险的日子里列宁曾委托他们保卫克里姆林宫和他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红军中有两个拉脱维亚师和一个空军特务团，他们进行了英勇战斗。可是现在，拉脱维亚部队都被改编，甚至有意不让拉脱维亚青年到驻守在拉脱维亚境内的俄罗斯人部队中服役，他们都被送往远离拉脱维亚的苏联其他地区。”①

拉脱维亚人所谈的本国情况很有代表性，其他各民族共和国的情况概皆如此。在“各民族人民友谊”的伪善旗帜下推行大国沙文主义的粗暴露骨的黩武政策，致使各民族的共产党员也难以忍受了。他们开始反对这种政策，但他们的行为，“被认为是反党、反列宁主义，他们不仅被解除职务，而且被剥夺自由，被送进劳动营或监狱，甚至永远失踪。”②

这两个问题——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生活的非斯大

① 《十七个拉脱维亚共产党员的信》，第7—8页。

② 《十七个拉脱维亚共产党员的信》，第11页。

林化和具有特殊意义的民族政策，就是贝利亚拟制定的新纲领的两大支柱。

党和人民对贝利亚的纲领还一无所知。可是这时，赫鲁晓夫对贝利亚搞起了阴谋。

“主席团开始讨论贝利亚提出的有关乌克兰政府机构中民族成分问题的备忘录。贝利亚的意见是，本地（即非俄罗斯族人）干部应当在本共和国里担任领导职务……接着，备忘录又提到了波罗的海各国和白俄罗斯，强调在这两个地方都要提拔本地人担任共和国领导。我们通过了决议，规定各共和国第一书记的职位均须由本地人担任，不由俄罗斯人担任。贝利亚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立场是正确的。但是他采取这种立场，有他自己的反党目的。他说，要改变俄罗斯人在非俄罗斯共和国领导中占优势的情况。谁都知道，这是符合党的路线的。起初，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贝利亚的目的是想加剧俄罗斯人和非俄罗斯人之间、莫斯科中央领导和各共和国地方领导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时，我把马林科夫拉到一旁：‘听我说，马林科夫同志，难道你不明白，这样做的结果会怎样吗？我们是要倒霉的。贝利亚在磨刀了。’马林科夫说：‘是啊，那怎么办呢？’，“是抵制他的时候了。我们绝不能让他得逞’。”①

其实，我们都记得，从斯大林将要逝世时起，赫鲁晓夫就阴谋反对贝利亚了（见第十一章）。我们知道，

---

①《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356—357页。

赫鲁晓夫曾指责贝利亚说，斯大林逝世时他喜形于色，可是赫鲁晓夫本人显然也难以掩饰内心的高兴，尽管他的喜悦还没有达到顶点。他过去怕斯大林，现在更怕贝利亚。

现在赫鲁晓夫把他旺盛的精力和天生滑头的非凡才能都用去达到一个目的——把贝利亚同斯大林联在一起（这样做就可以使他失去最初的和最后的同盟者马林科夫）。他把斯大林死后的局面描绘得十分黯淡。

“当斯大林死的时候，他留给我们的是忧虑和恐惧。贝利亚比其他任何人更希望这种忧虑和恐惧在我们中间长期存在下去。很长时间以来，我就不信任贝利亚。我曾多次设法说服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我认为贝利亚在执行对外政策方面是个冒险主义分子。我知道他正在巩固自己的阵地，把他的亲信安插到重要的岗位上去。”①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相信赫鲁晓夫。他与贝利亚合谋反对过斯大林，现在，在生命垂危的斯大林的病榻旁，又搞起了反对贝利亚的阴谋。最初他只和“四人团”成员一起策划反对贝利亚的阴谋，后来才吸收政治局其他委员参加。一切都做得得心应手。苏联公民看到1953年7月10日的《真理报》，真是又惊又喜。

“苏共中央最近召开了全会。全会听取并讨论了马林科夫同志代表中央主席团所做的关于贝利亚反党叛国

① 《赫鲁晓夫回忆录》中“最后遗言”第二卷，第193页。

罪行的报告。鉴于贝利亚的目的是颠覆苏维埃国家、为外国资本效劳并居心险恶地企图把苏联内务部凌驾于政府和苏联共产党之上，兹决定把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敌人贝利亚开除苏共中央委员会，开除苏联共产党。”

贝利亚没有出席这次中央全会，也没有出席12月举行的法庭审判。法庭对他的审判只不过是苏联常玩弄的一种把戏而已。过去贝利亚多次这样审判过别人，而区别仅在于现在的主角已不是活人，是一具死尸。

赫鲁晓夫曾多次对自己的外国客人，特别是对共产党干部讲过贝利亚是怎样被捕和怎样被处决的。他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中，对直接从肉体上消灭贝利亚的凶手虽有过不同的说法，但情节基本一致。

据其中一种说法，贝利亚的末日是这样：赫鲁晓夫首先说服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继而说服中央主席团其他委员。他说，如果不立即搞掉贝利亚，他就要搞掉主席团全体委员。也许每个人都这样想，不过都害怕说出来。赫鲁晓夫并不怕，困难的问题是怎样组织这次搞掉贝利亚的行动。根本不可能在中央主席团会议或在中央全会上自由地讨论对他的指控。担心贝利亚听到风声，会立即搞政变，杀掉所有的对手。只有使用一切卑鄙家常用的传统武器了：搞欺骗，设陷阱和圈套。在这方面，贝利亚是个老狐狸，所以需要骗得更巧妙，陷阱设得更隐蔽。因此商定，把搞贝利亚的行动安排在苏军夏季演习开始的时候。莫斯科军区举行演习时，要有几个西伯

利亚师参加（为了以防万一，防止莫斯科的各师里有贝利亚的支持者）。在部长会议的会议上，国防部长、副部长们和总参谋长需要报告演习计划，因而邀请了许多军官出席会议。和往常一样，会议日程提前送给了部长会议的成员，其中还包括各种决定的草案、应邀报告人和专家名单。总之，一切都按惯例安排就绪，大家都到会了。政府委员聚集在部长会议的会议厅里，应召前来的人，包括军人，都在接待室等候，讨论到有关问题时将被叫进去。会议首先讨论日程。以朱可夫元帅和莫斯科军区城防司令莫斯卡连科为首的一批军人走进了会议厅。马林科夫宣布中央主席团和部长会议联席会议开始，接着对朱可夫说：

“苏联元帅同志，我以苏联政府的名义命令您逮捕人民的敌人拉甫连季·巴甫洛维奇·贝利亚！”

军人们逮捕了贝利亚并把他押到隔壁房间。中央主席团开始讨论他的未来命运问题。

赫鲁晓夫介绍说，我们面临一个令人伤脑筋的二者必择其一的局面：把贝利亚关押起来进行正常的侦讯，还是立即处决他，再按法律程序做出死刑判决书。采取第一种办法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整个契卡机构、契卡军队都支持贝利亚，他们很容易使他获得自由。采取第二种办法立即处决贝利亚，我们没有法律根据。经过全面权衡，我们得出结论：需要立即处决贝利亚，因为没有人会为死人贝利亚起来造反。有一次赫鲁晓夫说，执行

判决的（就在隔壁房间）是莫斯卡连科将军，另一次说是米高扬，第三次甚至说是他本人。赫鲁晓夫强调说，我们后来对贝利亚案件所做的进一步调查充分证明，处决他是正确的。

威特林在他关于贝利亚的专题研究中写道：

“很难断定，他是被莫斯卡连科或赫鲁晓夫枪决的，或象传说那样，是米高扬或莫洛托夫在三名将军协助下把他掐死的。也很难断定，他是6月27日在去大剧院途中被捕的（除他以外，主席团全体委员都出席观看了歌剧《十二月党人》——作者注），或是在他参加波兰大使馆招待会之后被捕的，或是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被捕的……因为赫鲁晓夫关于贝利亚之死散布了几种说法，而且每种说法都不一样，所以很难相信其中的任何一种说法。”①

一般都认为贝利亚是6月27日被捕的，其根据是贝利亚没有出席观看上述歌剧。那天《消息报》所报道的出席观看歌剧的政府委员名单中没有贝利亚的名字，但是在它发表的一篇题为《党和人民坚不可摧的团结》的政治文章中，却把贝利亚列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这篇文章通篇反对非斯大林化和贝利亚的民族问题纲领，重又提到“列宁、斯大林关于共产主义的科学”的词句，以及必须“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世界主义”，“党在过去和现在一直提醒苏联人民不要高枕无

① 威特林，《政委》，第395页。

忧和漫不经心，教育共产党员和全体劳动人民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性，在同国内外敌人斗争中要具有不调和精神和坚定性”，等等。这是反对贝利亚的斯大林式论文。

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文章仍提到贝利亚是领导人。《消息报》编辑部不会不知道在发表这篇文章的前一天，即1953年6月26日，贝利亚已经被捕。苏联检察院后来正式发表过这件事。①

对贝利亚和他的六名助手——也是一些老契卡人员的审判，安排在1953年12月18—23日。判决书说，贝利亚从1919年直至被捕之日充当外国间谍（在阿塞拜疆当过平等党的间谍；在格鲁吉亚当过孟什维克的间谍；在苏联又充当英国间谍）。判决书接着写道，贝利亚想把苏联内务部置于党和国家之上，以便夺取政权，“复辟资本主义和恢复资产阶级的统治”；贝利亚反对“提高人民的福利”，“为制造粮食危机而暗中破坏党的重大措施”，“被告贝利亚及其同伙残酷镇压人民群众”，“贝利亚及其同伙采取各种手段唆使各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的残余活跃起来”，“法庭查明：贝利亚、麦尔库洛夫、杰卡诺佐夫、科布洛夫、高格里泽、米什克和弗拉吉密尔斯基利用自己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内务部机关的职位，犯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罪行，其目的是要消灭忠于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正直干部”。

① 《真理报》1953年12月17日。

被告对全部罪行供认不讳。12月23日全体被告被判处死刑，并于当日处决。

没有偏见的观察家不难发现，判决书除了事实外还有许多谎言。说贝利亚及其契卡同伙（无论他们的前任还是他们的后继者）是人民的敌人，这是事实，但说他们想把政治警察置于党和政府之上，则属谎言。他们毫无必要这样做，因为政治警察居于党和政府之上已达二十年之久。说这个法庭在12月审判了一批契卡分子，这是事实，但说贝利亚也出庭受审，纯粹是撒谎。消息极其灵通而又身受贝利亚迫害的阿利卢耶娃只字未提审讯贝利亚的事，而且从她的话中可以断定，贝利亚在被捕后立即被处决了。

“贝利亚于1953年6月被捕后立即被处决了，过了一些时间，政府散发了关于他的‘罪行’的长篇秘密文件。在党的会议上宣读这些文件时用了三个多小时。此外，指控贝利亚是为帝国主义效劳的‘国际间谍’，但中央秘密文件的多半部分讲了许多贝利亚的‘道德败坏行为’。党的侦察人员津津有味地四处收集这个已不令人生畏的敌人的丑闻艳史。在党的所有会议上，对这个被贬黜的‘领袖’的寻情作爱的细节说得绘声绘色。令人不解的是，中央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些事与政治完全无关，与党内斗争也完全无关。党的文件对此未做任何解释和说明，也许因为中央的伪君子们发现自己有同样的隐私。1953年以后，贝利亚的妻子和儿子被赶出莫斯

科，送往乌拉尔”。①

关于共产党的极可靠的文献资料也证明，在法庭判决前，贝利亚已经死掉。据《波兰大百科全书》记载，贝利亚于1953年7月被处决。②

斯大林曾说“疏忽大意是我们的一种愚蠢病症”。他自己由于低估了贝利亚的卑鄙伎俩而成了这种病症的牺牲品；贝利亚由于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卑鄙伎俩，同样死于这种病症。

---

① 斯·阿利卢耶娃《仅仅一年》，第357—358页。

② 威特林，《政委》，第395页。

